

复徐向前等电^[1]

(1936年11月18日)

如使东面地区为毛炳文过早占去，红军回旋余地狭小不利。我们意见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以一部控制古浪险要，远距毛炳文。同时，加紧军事训练，恢复体力，检查政治工作，教育每个指战员会做群众工作，与人民发生良好关系，严整政治纪律，建立会计给养制度，使尔后和远方同志见面时焕然一新。

肃州^[2]到安西有八天坏路，人烟稀少，安西亦荒僻，将来只能去一部。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周恩来复徐向前、陈昌浩并告朱德、张国焘电的主要内容。

[2] 肃州，指酒泉。

致朱德、张国焘电^[1]

(1936年11月18日)

四军萌城抗战^[2]甚为得力，请鼓励其继续抓紧阻止该敌，以利一方面军与三十二军之突击。现胡军已露疲惫，兵力又颇分散，一战而胜前途大佳。只有战胜胡军才便开展局面，才是策应河西的好办法。

[1] 这是毛泽东致朱德、张国焘电的主要内容。

[2] 萌城抗战，指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三十一军11月17日在宁夏盐池县萌城地区设伏，击溃胡宗南部第一师第二旅，毙伤敌600余人的一次作战。

朱瑞支队的作战部署^[1]

(1936年11月18日)

彭：

朱瑞^[2]支队附电台，以经豫旺堡以西取间道急行军进同心城、豫旺堡城之间，相机袭击胡宗南^[3]指挥部（王家团庄），或扰乱周孔两师^[4]后尾为宜。惟须注意马鸿宾^[5]部。

毛

十八日八时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的电报。

[2] 朱瑞，当时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他临时率第一方面军特务团与第一军团教导营在今宁夏同心县豫旺堡附近地区活动。

[3]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司令兼第一师师长。

[4] 周孔两师，指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四十三师和第九十七师，师长分别为周祥初和孔令恂。

[5] 马鸿宾，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四纵队司令兼第三十五师师长。

决战动员令

(1936年11月18日)

一、二、四方面军各兵团军事政治首长钧鉴：

从明日起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各首长务须以最坚决的决心，最负责的忠实与最吃苦耐心的意志去执行。而且要谆谆告诉下级首长转告于全体战斗员，每人都照着你们的决心，忠忱与意志，服从命令，英勇作战，克服任何的困难，并准备连续的战斗。因为当前的这一个战斗，关系于苏维埃，关系于中国，都是非常之大的，而敌人的弱点我们的优点又都是很多的。我们一定要不怕疲劳，要勇敢冲锋，多捉俘虏，多缴枪炮，粉碎这一进攻，开展新的局面，以三个方面军会合于西北苏区的胜利作第一个赠献给全苏区的人民的礼物。

红军胜利万岁！

苏维埃胜利万岁！

抗日民族战争万岁！

毛泽东 张国焘 彭德怀 任弼时

朱 德 周恩来 贺 龙

先打丁德隆后打周祥初孔令恂^[1]

(1936年11月19日)

彭：

我军先打其右路丁师^[2]。对周孔^[3]似宜让其北进数十里，然后坚决扼阻之，以便我军消灭丁师后，向其周孔之侧后打去。又二方面军主力宜跟进为预备队，其一部则坚决扼阻王军^[4]。如何，请依情况决定。

毛
十九日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的电报。

[2] 丁师，指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七十八师，师长丁德隆。

[3] 周孔，指周祥初、孔令恂，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四十三师师长和第九十七师师长。

[4] 王军，指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六纵队司令王以哲指挥的东北军一部。

胡宗南部的行动及我军部署

(1936年11月20日)

彭^[1]:

甲、敌现陷在困难中，遵蒋^[2]令由保宁堡改向定盐^[3]，解决给养，控制战略要屯，其主力进路必经红柳沟^[4]，但丁师^[5]有经山城堡^[6]、青岗峡向定边之可能。

乙、我以集结四个军从其右侧后打去最好，四军则从正面吸引之。

丙、打时以首先消灭其一个师取得确定胜利后，再打第二仗为原则。

丁、敌以为我一、二方面军向环县逃，目前企图胡^[7]敌完全不

[1]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红军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第一方面军司令员。

[2] 蒋，指蒋介石。

[3] 定盐，指陕西定边和宁夏盐池。

[4] 红柳沟，村名，位于陕西定边西南。

[5] 丁师，指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七十八师，师长丁德隆。

[6] 山城堡，村名，位于甘肃环县北部。

[7]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司令兼第一师师长。

知，但敌增师至山城堡后则必发觉，务望注意。

戊、曲子红大三科^[1]及定、盐二十九军归你统一指挥。

毛泽东

二十日五时

[1] 指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第三科，亦称红军大学附属步兵学校，对外又称中央教导师，当时驻甘肃环县曲子镇。



毛泽东等在陕北的合影。

致红军战士与苏区人民电*

(1936年11月20日)

(甲) 蒋介石此次大举向苏区进攻，不但不许红军抗日，反要消灭红军，消灭苏区人民，命令胡宗南各军向盐池、定边、环县猛攻，并要向陕北苏区前进。

(乙) 我一、二、四方面军会合之后，士气大振，坚决拥护中央与军委之路线，消灭进攻敌人，扩大统一战线，实行抗日救国，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定、盐南边之山城堡打了第一个胜仗，消灭胡宗南之一个旅。

(丙) 这个胜仗是粉碎蒋介石全部进攻的开始，我全体红军战士要更加团结起来，忍苦耐劳，服从命令，勇敢作战。我全苏区人民要帮助红军作战输送粮食，转运伤兵，搬运战利品。白军来时，用坚壁清野对付之。为保卫抗日根据地而战，为扩大抗日根据地而战，为消灭全部进攻之敌人而战。

红军万岁！

苏维埃万岁！

抗日救国之民族革命战争万岁！

十一月二十日

打丁德隆胜利后立即打周祥初^[1]

(1936年11月21日)

昨日止敌情大体明白，第一旅及孔令恂^[2]在大水坑一带，周祥初^[3]在攀家沟、保宁堡一带，昨日一部向山城堡，主力二十一日当向山城堡以北距离三、四十里地区前进。丁德隆^[4]在山城堡一带。第二旅似在豫旺^[5]整理，胡^[6]军部到豫旺。我本日打丁师，除周师下午或能赶到外，余均须第三天方能赶到，到亦疲劳不堪矣。我打丁师胜利后，须立即整顿队势打周师。

毛

二十一日三时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的电报。当时彭德怀任总指挥兼政治委员。

[2] 孔令恂，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九十七师师长。

[3] 周祥初，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四十三师师长。

[4] 丁德隆，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七十八师师长。

[5] 豫旺，旧县名，县治在今宁夏同心县下马关。

[6]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司令兼第一师师长。



面对国民党军的“围剿”，毛泽东、彭德怀等指挥红军沉着应战，1936年11月取得山城堡战役的胜利。图为回师陕北后的彭德怀。

红军领袖贺绥远守军抗日胜利

(1936年11月21日)

绥远傅存怀将军台鉴：

足下孤军抗日，迭获胜利，日伪军不能越雷池一步，消息传来，全国欢腾，足下之英勇抗战，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为中国军人争一口气，非特足以媲美十九路军，且令□□重兵，专以残杀本国同胞为其唯一事业者，羞愧至死！近闻少数卖国汉奸意欲假手于某有力者，假抗日之名，实际上控制足下之爱国行为，吾人深信足下必能以对民族之大义感化万安，不仅使汉奸卖国贼无所售其计，且转而□□抗日力量之团结也。红军抗日援绥且早决心，无□少数汉奸卖国贼竟仍高唱其抗日必先剿共之□调，驱使□国□□实行进攻红军，以求削弱国防力量，而迎日本帝国主义根绝中国抗日运动之要求，抗日人民红军誓以其全力与若辈无耻之徒相同□，庶几民族解放之大□□，而我全国人民与血性军人所高举着不致堕落，永增光辉，吾人深信吾人现所努力□停止内战抗日救国之行动，必能对于足下之抗日义举遥为声援敬以一瓣心香祝将军之胜利。并希以此竟传达贵军全体将士。

毛泽东 朱德叩

二十一日

坚决阻敌第一旅占领盐池^[1]

(1936年11月22日)

彭，并告宋、宋，谢、甘^[2]：

胡^[3]令四十三师向萌城、甜水堡增援，而第一旅昨日已至青山街，离盐池不远。二十八军及骑兵团全部应立即转至青山街，小部由正面，主力由侧后，坚决阻止第一旅，不使盐池落入敌手，以待主力之到达。谢甘所部除小部警戒安边外，主力应立即集结盐池守城。

毛

二十二日十七时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等的电报。

[2] 宋、宋，指宋时轮、宋任穷，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二十八军军长和政治委员。谢、甘，指谢嵩、甘渭汉，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二十九军军长和政治委员。

[3]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司令兼第一师师长。

迫蒋停止剿共是目前中心关键^[1]

(1936年11月22日)

小开^[2]:

甲、南京两电、上海两电均收到。目前此事无从谈起。恩来事忙，暂难出去。

乙、我只能在保全红军全部组织力量、划定抗日防线的基础上与之谈判。

丙、从各方面造成停止进攻红军的运动，先酝酿，然后发动，一处发动，到处响应，以此迫蒋停止“剿共”，此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详容另告。

东 天
十一月二十二日亥

[1] 这是毛泽东、洛甫（张闻天）给潘汉年的电报。

[2] 小开，即潘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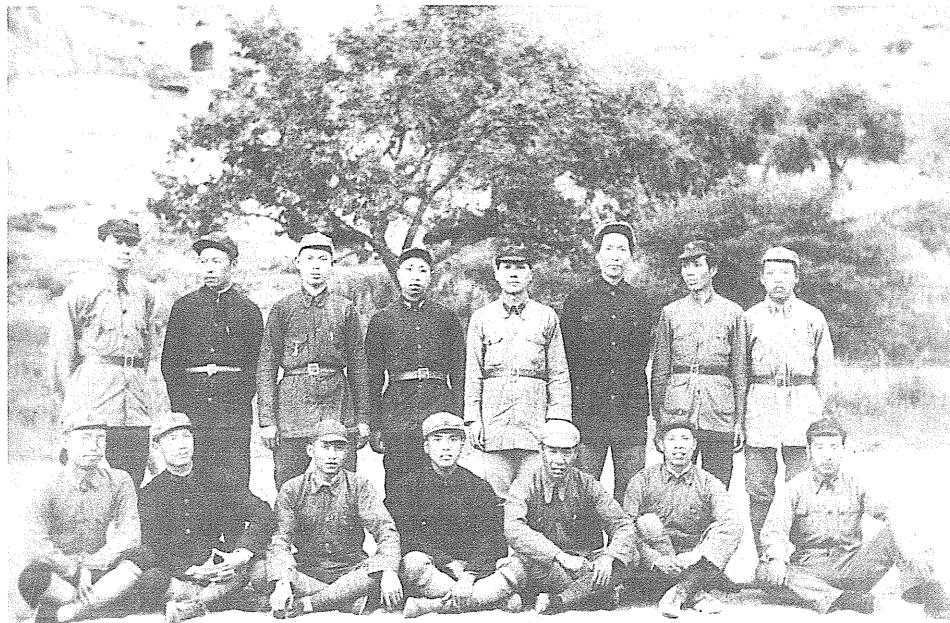
在中国文艺协会^[1]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1936年11月22日)

中国苏维埃成立已很久，已做了许多伟大惊人的事业，但在文艺创作方面，我们干得很少。今天这个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这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过去我们是有很多同志爱好文艺，但我们没有组织起来，没有专门计划的研究，进行工农大众的文艺创作，就是说过去我们都是干武的。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因为现在中国有两条战线，一条是抗日战线，一条是内战。要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争取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首先我们就要停止内战。但现在有人不愿停止内战，反而来进攻抗日主力的人民红军，要消灭抗日的领导者和核心的苏维埃，要消灭一切抗日力量，抗日的文艺也要消灭。所以我们要抗日首先就要停止内战。怎样才能停止内战呢？我们要文武两方面都来。要从文的方面去说服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从文的方面去宣传教育全国民众团结抗日。如果文的方面说服不了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那我们就要用武的去迫他停止内战。你

[1] 中国文艺协会，是由丁玲、成仿吾、李伯钊等34人倡议，于1936年11月22日在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正式成立的。在成立大会上，由毛泽东提议、全体会员通过定名为“中国文艺协会”。组织协会是为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目标下，共同推动新的文艺工作，结成统一战线中新的战斗力量。

们文学家也要到前线上去鼓励战士，打败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所以在促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运动中，不管在文艺协会都有很重大的任务。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这是你们伟大的光荣任务。



1936年，毛泽东在保安和红四军部分负责干部合影。

组成南北纵队打击敌军^[1]

(1936年11月22日)

彭：

似宜由你亲率一方面军昨日作战未使用之一个师及四方面军之两个军全部组成北纵队，今夜或明晨即向青山街转移，配合二十八、二十九军消灭第一旅及马全良^[2]部。若周孔^[3]再向山城堡进，则以一方面军主力，由二方面军贺任^[4]指挥组成南纵队，消灭其一个师有把握。或你消灭驱逐第一旅后，可从青山街向萌城、甜水堡周孔之后路打去，使周孔进退维谷。萌城一带地形条件，我全部集中事实上难于使用，且在丁师^[5]惨败后周孔前进当更谨慎，若乘敌从山城堡转移时，主力从一翼侧击才能出敌不意，或可打一、二个胜

[1] 这是山城堡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关于发展胜利、继续歼敌给红军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的电报。

[2] 马全良，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防守区马鸿逵部新编第七师第二十旅旅长。

[3] 周孔，指周祥初、孔令恂，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四十三师师长和第九十七师师长。

[4] 贺任，指贺龙、任弼时，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和政治委员。

[5] 丁师，指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七十八师，师长丁德隆。

仗，且使敌知无大望。尔后敌若转入守势，我北纵队可向金灵^[1]以东活动之，使整个局势变化。如何，请解决。

毛
二十二日

[1] 金，指金积，旧县名，1960年撤销，辖区裁入宁夏吴忠、青铜峡二市。灵，指宁夏灵武。

捉住敌军矛盾彻底击破胡宗南^[1]

(1936年11月23日)

朱、张、彭、贺、任^[2]:

现时敌军中发展着四种矛盾：第一种是抗日与“剿共”之间的矛盾；第二种是蒋军与东北军之间的矛盾；第三种是上级的严令进攻与下级的对红军恐惧的矛盾，此种矛盾现在极大发展着；第四种是官长与士兵间的矛盾，此种矛盾以近日的物质困难与疲劳而加深。我们的任务是捉住这些矛盾，更加团结一致，统一指挥，忍受与克服一切困难，不失每一个有利时机，灵活调动部队，准备连续战斗，坚决地各个击破进攻之敌，首先是彻底地击破胡宗南^[3]。

毛
二十三日十二时

[1] 这是毛泽东给朱德和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红军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等的电报。

[2] 贺、任，指贺龙、任弼时，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和政治委员。

[3]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司令兼第一师师长。

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

(1936年11月23日)

远方来电正讨论帮助你们，但坚决反对退入新疆。你们作战方法应集中最大兵力，包围敌之较弱一部而消灭之，另以一部兵力钳制敌之余部。如此方能从敌取得补充，方能予敌以重创，根本消灭其战斗力，方能使敌知所警戒。应该力避如过去一样的消耗战，提倡集中兵力包围消灭其一部的消灭战，如此方能解决问题。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致徐向前、陈昌浩电的主要内容。

与其击溃敌许多团， 不如干净消灭敌一个团^[1]

(1936年11月25日)

徐、陈：

- 一、告指战员书^[2]及二十五日部署电^[3]收到，甚慰。
- 二、毛炳文^[4]东撤利于你们发展。在你们打破马^[5]敌之后，主力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和政治委员陈昌浩的电报。

[2] 指1936年11月22日红军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副主席徐向前和西路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发布的告西路军指战员书。文中说，在西北创造巩固的抗日根据地的光荣历史责任已落在西路军全体指战员肩上，全体指战员要坚决战胜敌人，正确运用统一战线，为完成光荣的历史任务而艰苦奋斗。

[3] 指1936年11月25日8时徐向前、陈昌浩给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张国焘的电报。电报说，西路军虽有许多困难，但还有寻机歼敌之把握。为创造根据地，策应河东主力，接通远方，决定在凉州、永昌、甘州间寻机歼敌，以五军两个团位于东乐，两团出肃州，指挥部及直属队必要时位于山丹，尔后适时在四十里铺、永昌之间或永昌附近集中第九、第三十军寻机歼敌。并要求接济越快越好。

[4] 毛炳文，当时任国民党军兰州绥靖公署第一路第三纵队（第三十七军）司令。

[5] 马，指马步芳，当时任国民党军兰州绥靖公署第一路第五纵队司令兼第二防守区司令、第一〇〇师师长。

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

三、远方^[1]接济，三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

四、关于作战方面：

(一) 集中两个主力军于一个有利阵地打马部，不管敌是两三个团还是五六个团，概用此法。

(二) 敌少，则主力从两翼包围，并以有力一部迂回至敌后。

(三) 敌多，则以一部钳制其一翼，以主力包围其一翼。

(四) 不论敌多敌少，正面不使用主力。

(五) 两翼包围时，不可平分兵力，应置最大兵力于一翼。

(六) 凡打两团以上之敌，二兄均宜亲自指挥，亲自看地形，亲授干部以机宜。惟须十分注意荫蔽，一切高级干部均应教育他们荫蔽，避免无益牺牲。

(七) 估计不能胜利之仗不打。

(八) 总之，不打则已，打则必须有所缴获。与其击溃敌许多团，不如干净消灭敌一个团。望酌行之。

泽东

二十五日二十四时

[1] 远方，指苏联。

国内国际及红军的情况^[1]

(1936年11月28日)

蒋介石还站在中间地位，对日仍力求妥协，但比过去强硬了许多，对我力求缩小苏区打击红军，但已觉得困难，许其部下二陈^[2]与我谈判。潘汉年去南京两次，距离甚远，一时不易成就。我之政策，一方面从人民、从反蒋军阀、从国民党内部造成运动；一方面红军消灭蒋军，双管齐下，迫蒋妥协。苏区与红军任务坚持打蒋，不稍放松。

[1] 这是毛泽东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2] 二陈，指陈果夫、陈立夫。

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

(1936年11月28日)

我的意见，把全部一万八千人集中于四五十里内，进则集中地进，退则集中地退，打则集中地打，不打则已，打则必包围消灭一部。如此打两三次，有问题就解决了，教育训练也方便些，只要粮食不缺，似以此法为好，望酌行之。

[1] 这是毛泽东致红军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和政治委员陈昌浩电的主要内容。

对胡军勿作仇敌，应尽力争取^[1]

(1936年11月30日)

我们完全同意张的建议，希望立即采取如下具体办法：（一）首先释放一部分俘虏，勿骂其长官。（二）用诚恳和气与尊重彼方态度，分别写信致胡宗南、孔令恂、周祥初。（三）派人到豫旺见胡。（四）用毛、朱、张、周及各方面军各军团各军首长名义，发表告胡军官佐士兵书，简单明了说明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志愿。

[1] 这是毛泽东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该电报通报胡宗南败后其内部充满联俄容共、一致抗日空气，张学良建议“对胡军勿作仇敌，应尽力争取”。

致彭德怀、任弼时电^[1]

(1936年11月30日)

敌进则坚决消灭之，数日内胡军仍有进攻可能。如敌改取守势，我军全军在此地区休息训练一个月，包括三个方面军政治上团结、体力休养、部队改编、制度统一、军事训练、政治训练、地方工作训练、党的路线解释、政治形势与红军任务解释、各种干部会议等项。

[1] 这是毛泽东致彭德怀、任弼时电的主要内容。

读西洛可夫^[1]、爱森堡^[2]等著
李达^[3]、雷仲坚译《辩证法唯物论教
程》（中译本第三版）一书的批注
(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绪论 哲学的党派性

二 哲学是党派的科学

.....

机械论是服从盲目的自然，是理论与实践分

在当作认识论看的辩证法的伊里奇的学说中，理论与实践不可分离地被结合起来，去征服盲目的必然，这是唯一的任务。“理论的思想

[1] 西洛可夫，现译希罗科夫。苏联哲学家。

[2] 爱森堡，现译艾森贝格。苏联哲学家。

[3] 李达（1890—1966），湖南零陵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主要译著有《马克思经济学说》《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等；主要著作有《社会学大纲》《经济学大纲》《〈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主编《唯物辩证法大纲》等。

离，是认识论上的（认识）与实践的统一——这就是认识论上的统一”^[1]——伊里奇把自己关于黑格尔辩证法的评注的中心思想之一，这样明白的力说了。[第13页]

自流主义与
革命主义的斗争

伯伦斯泰因^[2]，用他自己所创造的资本主义之平和的进化的发展的理论，来对抗辩证法的飞跃说、革命说。

对于唯物论辩证法的修正，是向着唯物辩证法最重要的方面——能动性、革命性——实行的。这种修正正是打破理论的活动与实践的活动的统一之尝试，而这两者的统一在唯物辩证法上，正是“内部的而且不可分的”被结合着。伯伦斯泰因不去提高普罗列达里亚^[3]斗争中的能动性与热情，反而鼓吹变革资本主义的现实之不可能。

普列哈诺夫^[4]……虽然暴露了伯伦斯泰因的观念论，却没有冲倒修正派在辩证法问题上曲解马克思主义的那个根基。特别是他并不曾顾虑到修正派放弃了“辩证法上决定的东西”——对立

[1] 参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新的译文是：“理论观念（认识）和实践的统一——要注意这点——这个统一正是在认识论中。”（《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36页）。

[2] 伯伦斯泰因，在其他处又译柏伦斯泰因，伯因斯坦等，现译伯恩施坦。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3] 普罗列达里亚，意即“无产阶级”。

[4] 普列哈诺夫（1856—1918），在其他处又译蒲列哈诺夫等，现译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

辩证法的本质即对立的统一法则。

的统一。伯伦斯泰因及其一党，建立阶级协调论代替对立的统一的法则。……最后，对于辩证法的本质之无理解表现得最厉害的地方，是普列哈诺夫和其他少数派在一九一四年帝国主义战争时代，公然喊出“防御祖国”的布尔乔亚^[1]的口号。……[第 14~15 页]

三 为党派的哲学而实行的、 伊里奇与少数派^[2]的斗争

.....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够具体的更好的推动各阶级的势力。

少数派的实践观，是机会主义的把实践迎合于现实，这种实践观，产出和现实完全不同的现实的反映，完全不同的理论。少数派……终于从现实的具体形象中排除了给现实以具体的东西，即排除了特定阶级的革命行动。伊里奇估计着我们怎样进行并向什么方向进行，才能够具体的更好的推动各阶级的势力。但少数派却不这样，他们只记述现成的东西，并没有指摘在普罗列达里亚与农民的积极的革命任务之上，能够发生什么事。

[1] 布尔乔亚，意即“资产阶级”。

[2] 少数派，现译为孟什维克。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布鲁塞尔和伦敦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生分裂。选举中的少数派被称为孟什维克，即俄语меньшевик（意即少数派）的音译。

“他们不指明普罗列达里亚在一定的瞬间应当怎样去‘推动革命的发展’……只是记述过程的一般，关于我们对于现实的具体任务却不曾提起。我们看看新火花派^[1]说明自己思想的方法，使我们想起马克思对于与辩证法的观念无关的旧唯物论的批判。马克思说：哲学者们，只是各色各样的说明了世界；但紧要的事情，是变革世界，新火花派的人们，虽曾努力记述并说明在他们眼前发生着的斗争的过程，却完全不能定出关于这个斗争的正确口号，他们杂乱的进行，而指导却是拙劣；他们忽视了党——能动的意识着指导的作用即变革的物质条件，并站在前卫阶级先锋的党——在历史上所能做的并且必须做的工作，因此把唯物史观降低了”^[2]。（伊里奇）[第25~26页]

马克思的革命理论，经过少数派的手，从一九〇五年俄国现实基础上实现出来的那种具体条件被割离了。一方面原理变为空虚的一般的

[1] 新火花派，即新火星派。指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从第五十二号《火星报》起把持该报编辑部的孟什维克分子。党内将他们称为“新火星派”，以与列宁主办布尔什维克的《火星报》时的“旧火星派”相区别。

[2] 参见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5页）

以离开一般联结的个个散乱事实为满足，现在正有此种人。

命题——公式化；另一方面，离开了原理的新事实的记载，提供了迂回的经验论。就是提供了只记载在一般联结之外的个个散乱的事实就觉得满足的那种理论。

……伊里奇依照辩证唯物论的原则，不从一般的命题出发，而从客观的现实的运动出发，从客观的现实的一切方面的考察出发，从各种阶级的地位与任务的分析出发。……

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都犯过此错误，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

说透了李立三主义与军事冒险主义及保守主义。

主观的非唯物论的立场更加是那样，它们偶然的从现实把事实分离出来，往往表面的机械的十分注意

十六
十六

列寧被日軍擊落後在中國被救

實，個個方面的一般基礎，這正是具體的現實，即一定的社會。如果不從具體的現
實出發，而從極抽象的理階的命題出發，在這種情形便喪失一切基礎——因為有這
個基礎，各種事實就不能不以一定方式上被統一起來。在一般的基礎喪失時，聯結
就變成人工的任意的產物。各樣事實被放棄了。伊里奇說：「在社會現象的
領域中。最流行的方法，最無益的方法，莫過於分離個個小事實利玩弄實例。爲要
在事實上奠定基礎，就必須無例外的把捉與所考察的問題有關係的事實的總體，而
不是個個事實。否則就會任意的選擇並搜集事實，就會無視整個歷史現象之客觀
的相互依存的關係，爲了注重無意義的事情，而採取「主觀的」處理方法」。

他們修正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顯着的特殊性，就越發是強有力的被覺察了。一九一
四年，勞動運動分爲兩個陣營，跟着就是第二國際運動的崩壞——伊里奇在帝國主
義戰爭時代論及的那個崩壞的發生，就是少數派完全與辯證唯物論分手的時代的事
情。

稿

論 論 哲學的實踐性

二九

十分注意

例如被日本帝国主义支配的半封建的中国社会

就必须无例外的把捉与中国苏维埃战争有关系的事实的总体，即革命战争的特点，而不是打中心城市与堡垒主义等个个独立的事实，这种事实总体就是联结个个事实、个个方面的一般基础。

使它互相统一。在这种情形建立了孤立的解释那个事实的基础。这叫做折衷主义。在折衷主义之下，丧失一般的基础及个别事件间的联结。联结个别事实，各个方面的一般基础，这正是具体的现实，即一定的社会。如果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极抽象的理论的命题出发，在这种情形便丧失一切基础——因为有这个基础，各种事实才不能不在特定方式上被统一起来。在一般的基础丧失时，联结就变成人工的任意的产物，重要的各种事实被放弃了。伊里奇说：“在社会现象的领域中，最流行的方法，最无益的方法，莫过于分离个个小事实和玩弄实例。为要在事实上奠定基础，就必须无例外的把捉与所考察的问题有关系的事实的总体，而不是个别的事实。否则就会任意的选择并搜集事实，就会无视整个历史现象之客观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为了注重无意义的事情，而采取‘主观的’处理方法。”^[1][第27~29页]

[1] 参见列宁《统计学和社会学》。列宁的原话不是一段话，这段引文在摘录和翻译上都与列宁的原话有出入。

抗日战争与
反蒋战争并不是
不能相容的

——孙鸣九^[1]说

……少数派与其他类似者为辩护自己的背叛而树立的防卫祖国的有名的口号，在诡辩中使保护祖国的运动与国际主义结合起来。国际主义与保护祖国运动并不是不能相容的——第二国际阵营中发出了这种话。……[第30~31页]

第一章 唯物论与观念论

一 唯物论及观念论的本质及根源

实践使人
们确信物
质是客观
的实在

中国是否
存在

……
人类在劳动过程中，作用于自然，并且直接变化自然，使物质受人类的影响，在这种情形，人类深信物质是客观的存在着。

苏联劳动阶级当着建设社会主义、使国内工业化、电气化、改造农民阶层、并且与豪农^[2]实行阶级斗争时，他们不疑惑苏联离开他们的意识独立的客观的存在。他们深信在日常的实践上，

[1] 孙鸣九（1909—2000），原名孙铭久，亦即孙铭九等。辽宁新民人，西安事变时任东北军爱国将领张学良的卫队第二营（手枪营）营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回到南京，扣押了张学良，并调遣军队开进陕西，威逼西安。这以后，东北军内部在如何营救张学良和是否应允中央军开进西安等问题上，发生分裂。孙铭九等人主战，认为为了营救张学良，应对南京中央军作战，反蒋战争与抗日战争并不矛盾。

[2] 豪农，即富农。

苏联现实的存在着，普罗列达里亚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现实的存在着。[第 49 页]

五 康德及马克思主义之新康德主义的修正

殖民地资产
阶级类似此种
情形

……德国布尔乔亚的发达之比较落后，以及他们之依存于封建制度，规定了他们对于布尔乔亚革命的态度之二重性。德国布尔乔亚，一方面梦想革命，梦想废除封建的桎梏；他方面害怕革命，投靠于封建领主，而与他们妥协。[第 121 页]

六 新康德主义

……那么，社会生活受什么所支配呢？正是对于这问题的回答，表现着里喀尔特^[1]的观念论哲学的特性。在社会中，价值支配着。这个价值，并不是人类在其实践的活动中用作估评种种事件及现象那样的规准。里喀尔特说，这个价值是主观的并且相对的，他依存于各个人的意识。支配社会的价值，不依存于各个人，在这种意义

[1] 里喀尔特（1863—1936），现译李凯尔特。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新康德主义巴登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

上，它是“客观的”。里喀尔特随后行着极端混乱的论述，表现出他不能给与价值的定义。……

[第 139 ~ 140 页]

第二章 当作认识论看的辩证法

一 认识与实践，主体与客体的统一

唯物辩证法在马克思^[1]主义中是决定要素。

客观世界是发展的，主观认识也是发展的。

七月革命以后，客观形势发展了，主观认识也应跟着发展。认识新形势中

如前章所说，唯物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中，是决定的要素，据恩格斯的定义，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社会、及思维的一般发展法则的学问。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不同。形而上学把事物及其知的反映（即概念）^[2]，当作不变的东西，凝固了的东西去观察，而辩证法却在其相互联结上、在其运动上、在其发生与消灭上，去把握事物及其知的反映（即概念）。辩证法教给我们，不但客观的现实是发展的，并且认识也是发展的。

一九一七年七月革命以后，……

伊里奇明白的指出：应当理解变化了的现实怎样使人们认识新的矛盾，新的联结。他指出了“一切权力都归苏维埃”这个口号，到七月革命止，它正确的反映了一九一七年革命中的阶级势

[1] 马克斯，即马克思。

[2] 本段中“即概念”两边的圆括号系毛泽东所加。

的新矛盾与新
联结。

力和党的相互关系。在一九一七年革命的一定阶段上，“一切权力都归苏维埃”这个口号“是向着和平发展的道路前进一步的、能够直接实现的第一步的口号。它是革命的和平发展的口号，从二月二十七日到七月四日为止，是可能的，当然又是最有望的东西，但在今日，却无条件的变为不可能了。”^[1]——伊里奇指出阶级势力的配置在根本上起了变化，并且这样写着。这个口号，在今日已不正确了。因为在新的情势之下转移权力，只有依据公然的革命才是可能的。

反映论不是被动的摄取对象，而是一个能动的过程。在生产和阶级斗争中，认识是能动的因素，起着改造世界的作用。

现实变化着、发展着。我们关于现实的认识，也随着现实一同变化。但是，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的认识是受动的反映现实，不要以为我们的认识像照相镜那样，无条件地摄映在自己眼界中的一切对象。人类的认识，是当作一个动因被包含在多方面的社会的实践之中的能动的过程。在生产和阶级斗争中，人类的认识，表现为能动的起作用的动因，参加于世界的改造。

新的形势
引导到新的口
号，新的口号

例如伊里奇提起“一切权力都归苏维埃”这口号怎样变化了的问题，不把这个口号当作受动的反映革命的现实的东西去观察，而把它当作在革命的实践上决定大众可以前进的方向，并团结他们的力量去观察。……如伊里奇所说，变化了

[1] 参见列宁《论口号》。（《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7～108页）

反映了形势的新矛盾，并指导群众团结起来为改变此形势而斗争。

九月以后再变化了的形势，又引出苏维埃口号，但此口号的内容大不同于过去的苏维埃。

的现实，如何地引导到新的口号、新的认识；并且这新的认识，能动地反映出现实的新矛盾，它本身是向着现实的变革的一条道路。“看前面勿看后面。勿用陈旧的阶级和政党的范畴，要用新的，七月革命以后的范畴”。^[1]

从七月到九月这个阶段上变化了的阶级关系，变化了的革命的实践，使伊里奇能够再度提出苏维埃的问题，作为在阶级斗争中夺取国家权力的手段。……这个新口号，并不是重复着与七月革命以前所定出的东西相同的口号，它是由于革命的实践之新内容而被弄得丰富了的东西。新的阶段上的苏维埃，不论从阶级的构成上看，或从革命的变革中它的作用看，都与以前的苏维埃不同。[第 193~196 页]

认识主体
在社会的实践
过程中起变化

在实践中实现主体与客体的辩证法的统一。

改变外界，同时又改变自己。

阐明了这种认识过程中的辩证法，阐明了现实与认识的充满矛盾的运动的人，首先是马克思。马克思指示了：现实与认识——客体与主体——之辩证法的统一，实现于社会的实践之历史的发展中。不只认识客体，并且认识主体，也在社会的实践过程中起变化。人类作用于外部自然，一面变革它，同时又变革自己的性质——马克思说。……与形而上学的唯物论一样，费尔

[1] 参见列宁《论口号》。（《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版，第 113 页）

费尔巴哈：主体与客体都不是历史上发生与发展的东西，认识是不变的自然的不变的反映。二者的统一，是不变状态的统一。

人类的感官是在劳动过程中发展的与分化的。

抽象的人与具体的人

认识的主体与客体的变化，在革命期中现得

巴赫^[1]也不把认识看做历史的过程。在费尔巴赫说来，认识是不变的自然之不变的反映。在他说来，认识主体，也和认识客体相同，是不变的，不发展的东西，而是在实践过程之外被把握的。他以为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是一成不变的东西，不是在人类的社会活动上发生的东西。他没有看到社会的实践变化了认识的客体。……他并不理解：物质的=感性的人类，连同他的五官，都是世界史的产物。他不知道：人类的感官，在人类的劳动过程中，在人类的实践之历史的发展中，都不是不变的东西而是发展的分化的东西。……费尔巴赫心目中的“人”，不是由于社会的活动而能动的改造世界的主体，而是直观的实体。马克思批评他说：“他不离开抽象的理论之范围，他不在使人类变成现在这样的一定社会关系中、不在周围的生活环境中去考察人类，所以他决不能到达于现实的存在着活动的人类，而停止于所谓‘人类’的抽象物的境界，只能感觉上稍微认识‘实在的，个别的，肉体的人类’。”^[2]……

马克思说过，认识的主体与客体的变化，在革命期中显现得强烈而明了。这一层，可以用革命的实例表示出来。普罗列达里亚，在俄国革命

[1] 费尔巴赫（1804—1872），现译费尔巴哈。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

[2] 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页）

特别强烈，例如过程中，一面变革现实，同时在根本上变革着他们自己的性质。……俄国无产阶级与中国农民。

……黑格尔是观念论者，他不承认离意识独立的客观世界之实在性，所以主张认识的能动性，首先是在于思维或绝对精神能动地创造出为这种精神的“他在”的自然。能够成就独自的发展的东西，据黑格尔说来，只是能动的思维。自然界一切种类的发展阶段，都被给予于精神之中。思维，“主观精神”对于自然之能动的认识，虽是发展的，而自然本身却不发展。能动的精神，据黑格尔说来，在认识自然，即认识客观世界时，就是认识它自身的“他在”，即认识自己。照这样说，认识之能动的主体，与其客体，在绝对精神上变为一致的东西，同一的东西。黑格尔不用这个来解决认识上主客关系如何的问题，却把客体解消于观念的主体中，离这个问题的解决愈远了。

费尔巴赫暴露了把主客看作同一的见解之观念论的性质。他说，把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视为同一，弄到使任何认识都成为不可能；因为认识

赫格尔^[1]把客体消解于主体中，把主客等同起来。

[1] 赫格尔（1770—1831），在其他处又译黑智儿等，现译黑格尔。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

费尔巴哈不了解主客统一之辩证法性质。

普列哈诺夫以为主客统一带有与实践活动无关的直观性，这是因为他不了解辩证法的本质（对立统一法则），所以不能在辩证法上了解认识论，他的反历史主义是同费尔巴哈一样的。

不是与现实同一的东西，而是现实在人类的感官及思维上反映了的东西。费尔巴赫主张，认识客体与主体不同，它是离人类意识独立的自然。不过费尔巴赫未曾理解主客统一之辩证法的性质，这是在前面说过的。

蒲列哈诺夫对于认识论的理解，并不曾注意于马克思与恩格斯对费尔巴赫所下的深刻的批判，仍没有超出费尔巴赫的范围，蒲列哈诺夫，与费尔巴赫一样，没有理解辩证法的本质、对立的统一的法则，所以他没有在辩证法上考察认识论。他不能阐明认识的充满矛盾的性质，不能阐明认识与社会的实践之结合，关于主客统一问题，仍旧站在费尔巴赫的立场。他与费尔巴赫一样，虽然表示了主客统一的物质，而这种统一，在他说来，带有与实践的活动无关的直观性。他与费尔巴赫一样，主张主客的统一，被给予于在自己为主体同时在他人为客体的个人之中。他不但没有批判过费尔巴赫，并且追随于费尔巴赫之后，重说人类的本质是他的肉体，没有见到人类的本质并不是肉体的东西，而是社会的性质。认识论中蒲列哈诺夫的反历史主义，是从这种地方发生的。

机械论——只看见相互关系，不看见相互渗透。

德波林不知主客相互渗透是在社会实践中实现的，只有机械的性质（外的、直观的），没有辩证的性质，从实践分离了认识。

……机械论者亚克瑟洛特^[1]不能理解对立的统一之辩证法的本质，机械地考察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即在这种关系中，只看到相互的关系，没有看到历史的实践过程中两者的相互渗透之辩证法的统一。

……德波林常常说起主体与客体的辩证法，说起两者的相互渗透，却不曾理解这种相互渗透是在实践上实现的，因而在事实上证明了他没有理解这辩证法的能力。对立的相互渗透，在德波林之下，没有辩证法的性质，只有外的性质，而终结于主体与客体之单纯的移动。他说，主体变为客体，客体变为主体。于是我们依据蒲列哈诺夫及其门徒的谬误的实例，看到如下的事实。即，从实践分离认识，不理解认识上的辩证法的作用，到了解决主客统一的问题时，必然要走到直观的立场，走到费尔巴赫主义。[第196~203页]

[1] 亚克瑟洛特（1868—1946）现译阿克雪里罗得。苏联女哲学家和文艺学家，社会民主党人。1917年年初任梦什维克中央委员，后任普列汉诺夫的“同一派”中央委员。1918年起不再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在高等院校任教。主要著作有：《哲学论》《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等。

二 认识过程的阶段与动因

如何认识外界的问题，在实践以外是不能解决的。

认识运动的路程

认识主体是社会的阶级。

无产阶级的认识发展过程，是阶级认识运动的标本。

前面说过：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以实践的发展为基础而实现；人类如何认识周围世界的问题，在实践以外是不能解决的。现在我们来详细研究认识的运动的路程；说明认识的运动在其发展上通过什么样的阶段，说明这种运动是由什么动因构成的。

当作认识物质的现实之主体而出现的东西，如前节所说，不是从社会游离了的个人，而是社会的人类，社会的阶级。在阶级社会中，周围世界的认识，带有阶级的性质。在阶级斗争上，从“自在的阶级”转化为“自为的阶级”的普罗列达里亚的认识之发展，成为阶级的认识之运动的标本。……

然则普罗列达里亚的认识，是怎样发展，并通过怎样的阶段呢？

普罗列达里亚，在其发展的最初期，还不曾完全意识到在自己周围发生的事。这一层，在英国的产业革命时代，就可以明了看出来。当时，普罗列达里亚对于资本主义的理解，非常浅薄，劳动者们虽然随着机械的采用而成为产业预备军而被抛弃于街头，但他们却不能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看出自己的贫困的原因，而只是在机械当中去寻找那原因。他们不对布尔乔亚作

土地问题

中国革命

战争问题

对轮船、对
汽车

第一期：非常浅薄，不了解资本主义本质，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法，还在“自在阶级”的阶段。

中国对帝国主义的认识

第二期：由于日常斗争的实践，资本主义的现实发展了，使得无产阶级懂得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剥削关系与阶级斗争关系），马克斯主义出现了，进到了“自为阶级”

意识的阶级斗争，而做出了反抗机械的暴动。……普罗列达里亚，由于抵抗机械的运动，就已经是和成为阶级的资本家或布尔乔亚斗争过了，只因他们不曾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所以才做出了错误的斗争方法。那时普罗列达里亚，虽不曾理解资本主义的剥削的本质，而对于自身所受的一切压迫和剥削，却已经是感觉到意识到了。他们为饥饿所苦，又不能满足迫切的生活的必要，他们被放置在今日或明日就要和家属一同挨饿的命运之下。因为这样，所以劳动者们只知道恼恨自己所属的企业家，还不知道那企业家即是剥削者阶级的代表。普罗列达里亚是自然地起来反抗的；他们的斗争，不是基于资本主义发展之科学的理解，而是基于在奴隶生活条件下得到的体验与知觉。然而他们与企业家作日常的斗争，与其他企业中的劳动者相接触，以及资本家们互相支持的事实的反复等——这一切事情，就弄到使劳动者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雇佣劳动与资本间的斗争），教训他们在自己的主人一个人物之中，看出一个剥削者阶级、布尔乔亚的阶级。阶级斗争的日常的实践，使得普罗列达里亚对于周围现实的认识，从自然的感觉和体验的阶段，提高到革命的变革现实的水平。于是说明资本主义的矛盾及其没落的必然性的马克思学说，在劳动大众方面，就能够依据他们自己的阶级斗

的阶段。

从感性阶段
进到理性阶段，
再从理性阶段进
到革命实践。

从直观到
思维

从思维到
实践

认识目的在
把感觉材料作论
理理解，两个阶
段有区别，但不
是不可逾越的。

争的实践去理解。革命的普罗列达里亚，已经不是盲目的了。于是阶级对阶级的战争，就以现在世界为舞台而开演。

普罗列达里亚对于资本主义的现实之认识的路程，最初从感觉、表象、与对象的直觉的阶段，进到对于现实的较高度的理解的阶段，其次再从这高度的阶段，进到革命的实践，进到要实现从前只蕴藏在头脑中的东西的阶段。“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是认识真理的辩证法的路程，是到达于客观的实在之认识的路程。”^[1]（伊里奇）

这一段话，包含着说明我们的认识发展之辩证法的路程的很深的思想。认识的要点，认识的终极目的，在于发见周围的现实之法则，而把我们在感觉、知觉和表象上所领受的材料，作理论的理解。但我们的认识之到达于理论的理解，是认识过程全体的结果。何种动因占优胜的那种差异，也决定认识本身的发展阶段的差异。因而认识过程的阶段，是不能被用不可逾越的界限去互相区别的。

在普罗列达里亚对资本主义的现实的个别现象做自发的斗争时的发展阶段上，普罗列达里亚也曾企图用一种方法去认识并理解那些现象。普

[1] 参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81页）

感性认识：
片面、现象、外
的联系。

理性认识：
全体、本质、内
的联系。

罗列达里亚自身的发展阶段还在低级状态，他们还没有暴露资本主义的本质的能力——这也是因为现实自身在某种程度上还没有充分展开它内在的矛盾——，这种种事实的结果，使得普罗列达里亚对于现实的一切认识，只在理解现实的各个方面或现象的感性认识形式上表现出来。

但是，资本主义的现实以及阶级斗争的发展使得普罗列达里亚感到有在其内的联结上，在其全体性上去认识各个现象的必要，使得他们把资本主义当作特定的社会制度，当作基于剥削的生产方法去理解。感性的理解，对于普罗列达里亚，不表明资本主义的矛盾，不发露那矛盾的“内容”。因为劳动者没有理解资本主义之内的矛盾（剥削关系），所以他们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的现实之一切方面，是怎么样并为什么去互相结合的。……资本主义的个个现象，在他们的认识上，只单是外的联结的东西。但是阶级斗争一进入到较高的发展阶段而转化于“自为的阶级”时，普罗列达里亚就开始把从前个个散乱的资本主义诸现象的总体，当作内的联结的东西去把握了。理论的认识所以和感性的认识不同，是因为它先暴露周围世界之内的矛盾，而能在其总体上，在其一切方面的联结上去把握现实。

伊里奇发展了感性的认识与理论的认识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并说明我们在物质世界的认识过

概念比感觉更为深刻，是进一步的东西，例如商品与价值。

？

程中所领会的概念，比较感觉和表象，更为深刻。他说：“每秒有三十万基米的速度的运动，我们不难表象出来，至于光用那样快的速度而运动这件事，我们却不能理解。”^[1]为要理解诸现象之内的联结，单靠感觉是不够的。和这同样的思想，马克思在论价值时，也曾说起过价值是表现各商品所有者间的关系的范畴。这种关系，是不能靠感觉去把握的。能够看，能够触的东西，只是个别的商品，而不是价值，不是商品所有者的关系，也不是当作全体看的资本主义。这些东西，是不反映“于肉眼”之上的。关于这点，马克思曾经爽直地说过：“商品价值的实体，在不知道它的所在这一点上，与胡尔斯达夫的情妇郭克里寡妇不同……各个商品，无论怎样把它反复舞弄，依然不能抓住它的价值。”^[2]

感性认识不从论理认识分离，感性认识中已有论理认识的萌芽。一般性的东西已在具体性

从感性的认识推移到论理的认识，就是从个别的方面和现象的理解推移到法则，即现实之内的联结的理解。感性的认识，不从论理的认识分离。它在已经萌芽的形态上，包含着我们后来借概念之力所实行的普遍化。

费尔巴赫所谓某种普遍化已被给予于现实之

[1] 参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这里的译文有误。（《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46页）

[2]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一章《商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1页）

的东西中间包含了的，但包含的只是外的联系，不是内的联系。由浅向深，由外向内，由各个向一般，只有依据以实践为基础的思维才能达到。这就是认识之深化运动，是认识之突变。这一深化与突变，才比较正确与完全的反映自然。

两阶段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各阶段，不是互相分离的。

感性的知觉的那个思想，伊里奇是表示赞同的。伊里奇引用过费尔巴赫所说的“只看见树叶不看见树么？”^[1]这一句话。不过费尔巴赫虽然述说过人的感官常与思想相联结这句深刻的话，却未曾力说到这种联结只是外的顺列的联结；现实的法则，只有依据以实践为基础的思维才能发见。费尔巴赫把在直观和表象上被给予着的联结，当作论理的认识。反之，伊里奇却力说到认识之深化的运动，力说到从感性的认识到论理的认识之推移。他这样写着：“物质的抽象、自然的法则、价值的抽象、及其他等等，即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重要的、非瞎说的）抽象，都比较深刻，比较正确，比较完全地反映自然。”^[2]

伊里奇把感性的认识与论理的认识，当作人类认识周围世界过程中两个不同的阶段，又说明了把握实在过程时的感性的知觉与思维的特性。在低级阶段，认识显现为感性的东西；在高级阶段，认识显现为论理的东西。但任何阶段，都是

[1] 参见列宁《费尔巴哈〈对莱布尼茨哲学的叙述、分析和批判〉一书摘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35页）

[2] 参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81页）

实践证明：感觉到的东西不能立刻理解他，只有在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更正确的理解他。感觉是解决现象问题，理解是解决本质问题，只有在实践过程才能暴露其本质而理解他。

此例很好

认识与情感之关系

思想与感情的统一

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各阶段，不是被用不可逾越的界限互相分离的。依实践所证明：并不是我们感觉到什么东西，就立刻开始理解它；反之，也不是理解到什么东西，就不感觉到它；只有在理解了什么东西时，才更正确、更深刻的感觉到。我们与曲解党的一般方针的人们斗争时，不一定是在最初就把握着那事实的本质的。最初我们只感到有些地方不对，往往不能彻底证实它，这只有在实践的过程中，才开始理解到反对者的错误的体系。虽然那样，但我们在最初仍然理解着，关于某一问题，左翼或右翼是怎样离开党的一般方针的。以伊里奇的中委为首班的党，当着和托罗斯基^[1]派及右派相斗争时，多数的党员虽知道两派的个别的错误，却没有知道两派错误的全体系。只有在实践的过程中，即托派和右派的曲解到最后完全结晶时，我们才能在其全体上，在其内的联结上理解了托派与右派的反党的见解。

当我们理解某件事之时，我们当然不仅是说明它，而且还悲叹，还发怒，还愤慨。……

多数派^[2]党员的显著的特征，就是：在他们底下，思想感情与兴趣，并不抵触，如激流一般向着阶级的敌人斗争，去实现社会革命所课责于

[1] 托罗斯基（1879—1940），现译托洛茨基。

[2] 多数派，现译为布尔什维克。他们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时占多数。

我们的伟大的任务。

？

此例不甚
清楚

对

对

说得很好

感性的认识与论理的认识，互相发展，互相丰富其内容，这一层，可举实例来说明。……于是从小布尔乔亚^[1]意识到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意识之急速转变，就在农民之中发生了。可是随着对于现实的新理解，随着普罗列达里亚意识的成熟，又现出新的感觉。从前伟大建设的欢喜，在他是一场空。于是劳动变成于他不适宜的东西了，在他看来，劳动只是“绞汗”，只是压迫。……于是劳动对于他已不但不是压迫自己的负担，而渐渐变为“名誉，勇气，与光荣事业”了。

感性的认识与论理的认识，只是反映了离我们意识独立存在的客观的实在的不同阶段。感觉是当作外界作用于感官的结果而发生的。至于概念，就是从感性的经验发生的。概念是把认识主体在感觉或知觉现实的过程上所得的材料，加以改造，加以普遍化的东西。

感觉和概念，都是对象的肖像，即离开我们意识独立显现的过程的模写。

我们的感觉和概念，是客观的现实之正确的反映么？答复这个问题的，就是实践。“对象的真理到达于人们的思维与否的问题，不是什么理

[1] 小布尔乔亚，即小资产阶级。

实践证明是
否是真理

实践贯穿着
我们认识的全
路程

理论从实践
产生，如果正确
反映客观外界的
发展过程，然后
再应用这种理论
于实践，就能在
实践上实现这种

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们必须在其实践上去证明真理，即证明其思维之现实性与力，证明其此岸性。从实践游离了的思维之为现实的与否之论争，是一个纯粹烦琐哲学的问题。”^[1]（马克思）[第 203~213 页]

在实际上实行理论，也就是试验理论。为真理之标准的实践，并不是真理向它前进，停在那里试验它的努力而又进行的那样的阶段。实践并不是一种“装饰”。一切社会生活，并不是像垫子那样用理论与实践的布片缝合了的东西。为真理之标准的实践，贯穿我们的认识的全路程。整个的革命，实行了马=伊主义^[2]，即只有革命，纠正了并论破了马=伊主义的曲解。

为真理标准的实践之完成认识的路程，这是在理论被实现于实践之中的意义上说的。但在实践上能够实现的理论，必须是从现在之社会的实践产生，而正确反映自然及社会的现实之发展历程的那种理论。

照上面所说，唯物辩证法，是认定“生活的见地、实践的见地为认识论的第一而且根本的见

[1] 参见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6 页）

[2] 马=伊主义，即马列主义。“伊”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即列宁。

理论，完成认识的路程。所以认识与实践的见地为认识论的第一与根本的见地，是唯物辩证法的见地。

资产阶级的实践观——实用主义的实践观，是只顾目前不顾将来的实践观。他们所谓真理，是主观的部分的真理，没有客观性与全体性。

机会主义的实践观的特点：
(一) 埋没弱点；(二) 不把握整个发展，屈服于个个事实；
(三) 没有看穿

地”^[1]的。

然而反马=伊主义的理论，也是依赖于实践的。它们究竟是怎样解释实践的呢？

就资本主义美国“流行的”布尔乔亚的实用主义，举例来说。……实用主义的实践观，是逃回过去的阶级的、具有利己主义与私有财产的阶级的，适合于布尔乔亚状态的布尔乔亚的见解。资本家是所见不远的。对于利润的渴望，使他们不能洞察将来。“捉住这一刹那呵！”——这是美国“实业家”的口号。这就是典型的实利主义的实践观。

布尔乔亚的=少数派的实践观，我们的托派和右派，也是有的。埋没弱点；不把握整个发展而盲目的屈服于个个事实之前；没有看穿现实的矛盾的深处之能力——这些，便是机会主义的实践观的特征。对于实践作这样的解释，就是从科学的理解——只有科学的理解，才能使人们把握并理解整个的现实与整个过程的运动——分离出

[1] 参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2页)

现实的矛盾的深处之能力。这就是抛弃科学理解的实践观。

马克斯主义的实践观，是伴随着洞察究极目的之实践。

经验论和唯理论

经验论——
信根^[1]与巴克

行动。

马=伊主义的实践观，和它完全相反。马=伊主义的所说的实践，是伴随着洞察和究极目的之理解的实践，是当作展开了的阶级斗争看的实践。

在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的认识论，也和观念论的认识论一样，想在物质的实践，在社会的历史的实践之外，去解决认识的路程如何的问题。因而在认识的种种阶段与要素（感官与思维）之间，就缺乏了联结。这种分离，就进到了从论理的认识分离感性的认识之方向。哲学家之中，有认定感性的经验为认识的真实源泉而轻视思维的意义的人；反之，也有只认定思维为真实的东西而怀疑的去处理感性的经验的哲学家。前者是从含有“经验”意义的希腊语的“Emporia”采取的，被称为经验论；后者是从含有“理性”意义的拉丁语“Ratio”采取的，被称为唯理论。
[第 213~216 页]

经验论的创始者，是英国哲学家培根。但他的学说，没有如后起的洛克的学说，以及主观观

[1] 培根（1561—1626），现译培根。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

来^[1]、休谟的区别。

念论代表巴克列与休谟的学说中那种粗笨的一面性，也没有使感性的东西与论理的东西相分离。至于巴克列和休谟的哲学，是从极端的经验论出发，从专承认知觉一事出发的，他们否定论理的概念对于认识所具有的意义，把论理的概念，看做是由悟性引入于我们的认识中的制造品。[第216页]

唯理论的缺点

唯理论有两个重要的缺点。第一是否定概念由经验而生，所以最初的概念，从他出发而到达于真理概念，究竟是从什么处所发生的问题，他们是不能说明的。第二，唯理论是同样从否定经验的认识的真理一事出发的，所以不能从抽象的思维过渡到个个感性的事物之认识。唯理论的这些缺点，在它的发展中显现了出来。[第217页]

根源的性质
认识以实践始以实践终

……伊里奇说：“马赫很知道：在实践上，人们不可避免的就变为唯物论者。人们在社会的活动上，直接与自然联结着，因为要做出某种事物，人们必须从自然所供给的材料出发，即在实践上承认物质的第一次的性质，而变为唯物论者。所以马赫应用观念论者的全气力，要从认识论排除实践。因为这件事是把认识论变为观念论的东西的唯一手段。”……当作认识论看的辩证法，据伊里奇的意见，其中必含有实践。……

[1] 巴克来 (1684—1753)，在其他处又译巴克列等，现译贝克莱。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第 218 页]

普列哈诺夫
看轻实践

……蒲列哈诺夫超出论理的证明之界限以外的事是很稀少的，但他对于实践却看得很轻。譬如，一切观念论对于现实的曲解，其本质与根源，是在于从认识过程分离实践，是在于放弃为真理之标准的实践，这种地方，蒲列哈诺夫并不曾用力说来。[第 219 页]

四 真理论

我们主张参
加反法西〔斯〕
战争。

? ^⑩

……人类的认识，在各个被给予的历史的瞬间，不能完全究明无限的这些联结。所以各个一定历史的瞬间中所得到的知识，是被限制着。绝对的知识固是不可能的，而知识之渐趋于完全和深刻，即是可能的。[第 236 页]

……还有更奸巧的诡辩论，就是普列哈诺夫和考茨基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劳动者在特定情形参加某一类战争的理论，去辩护第二国际对于国际劳动运动的背叛。例如，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曾经主张西欧国民参加于对俄战争。恩格斯在一八五九年，也曾表同意于德国对法国的战争。但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什么在当时陈述那样的

[1] 毛泽东在此处用红铅笔、黑铅笔、毛笔批了三个相叠的问号。

意见呢？这是因为在一八四八年当时，封建的俄国演着国际的宪兵之任务，演着扑灭波兰及匈牙利的革命之任务；在一八七〇年当时，德国对法国的战争，含有对拿破仑三世的世界帝国的战争的意思，含有德意志国民的统一的意思。……

[第 250~251 页]

96^[1]

第三章 辩证法的根本法则——由质到量 及由量到质的转变的法则

一 发展之质的规定性

？

……科学的认识之任务，在于渗入过程的深处，暴露过程之发展的原因，认识过程的根本矛盾及内的规律性，并由此去阐明多种多样的现象与现象间的相互联结。但，我们并不是一次就认识现象的法则，而是经过许多的阶段才认识它。我们在社会的实践上，首先碰到相互联结的极复杂的种种现象。我们的思维集中注意于这些现象时，首先要确定一种现象和他种现象的差异，这个事物和别个事物的差异。

研究从辨异
入手

我们当观察在与他种事物相互作用中的某种事物、某种现象之时，首先不能不确定这种事物

[1] 这是毛泽东注明的本章页数。

和他种事物不同的所在，这一过程和另一过程不同的所在。

苏维埃经济，究竟和资本主义经济有怎样不同的处所？苏联进到社会主义时代的阶段，和新经济政策最初的阶段，究有怎样不同的处所？认识任何过程时的第一任务，就是确定那过程的特性。这即是暴露那过程的“质”。所谓“质”的范畴，自古以来，就已知道了。古代希腊哲学者们，譬如说亚里士多德，首先就要求了研究任何过程的质。

认识过程先确定过程的性质，与其他过程的性质有什么不同，即认识其特性。

认识其最简单最根本的性质，由此再进到深处。

过程的简单的特性，是唯物辩证法最初的范畴，他是客观存在的。

战争首先分析特点，统一战

所谓暴露过程的质，就是指示过程之最单纯的、最根本的规定性。我们暴露出过程的质，就踏上认识的第一阶段。在认识了过程之质的特性后，我们就更进到过程的深处。

质，是唯物辩证法最初的范畴。过程的质，不是如机械论者莎拉比雅诺夫^[1]所主张的那样，也不是如一切主观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它不单是我们思维能力的产物，它是在实在的现实中存在着而被人类意识所反映的东西。进到社会主义时代那个阶段的特殊性，不是人类头脑所规定的东西；不论人类意识它与否，它现实的存在着。

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地存在着，具有使它和以前的社会形态相区别的许多特殊性。即，发达了

[1] 莎拉比雅诺夫（1886—1952），现译萨拉比扬诺夫。苏联哲学家。著作有《历史唯物主义》等。

线也是首先分析特点——中日矛盾与国内矛盾。

的商品交换，剩余价值的占有，产业预备军，资本家的企业，利润，商业的利益，利息，货币地租，加特尔，托拉斯，金融公司，产业恐慌等等。我们仔细去考察资本主义的发展时，就看到这些现象是贯穿于自由竞争时代及帝国主义时代的各阶段的。帝国主义时代，同时具有自由竞争及独占，同时具有个人企业及托拉斯，加特尔，金融公司，同时具有商品输出及资本输出，等等。

过程许多特性之中有根本特性，例如劳动动〈力〉买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特性，他规定这社会中其他许多特性。

前面说过，质就是一定过程之根本的最初的规定性。我们要确定资本主义的质，不可以单只数出资本主义的全部特殊性就算了，还有阐明它的最初的规定性之必要。资本主义之最初的规定性，是当作商品交换的发展及生产手段从生产者分离了的过程之结果看的、所谓劳动力那种特殊商品的发现及存在。资本主义的其他特性，完全受这个根本的特性所规定。（所谓最单纯的最根本的规定性，最初的规定性，根本的特性，就是所谓本质。本质以外，还有其他许多特性，为本质所规定。）^[1]如果只把一定过程的标帜一齐数出来，那还不能探出那个过程的发展法则。例如培根那样的经验论者，他分析某种事物、某种过程时，是数出那过程的一切标帜的。固然，这种

指出过程的一切特性是必要的，尤要指出根本特性，才能认

[1] 以此种形式排印的是毛泽东写在行间的批语，下同。

识过程之发展法则，因法则是包含于根本特性之矛盾发展中。例如资本主义法则包含于劳动力买卖这个根本特性之矛盾发展中。

过程发展，根本特性（规定性）也随之发展，在发展的每一阶段上都获得特性，直至过程完结为止。例如劳动力出卖者（工人）的性质。

工作是必要的；但只是这样，还不能认识一定过程的运动法则。（倍根研究方法之错误。）反之，暴露出最单纯的规定性时，我们就能够确定运动法则。因为，法则的本身是被包含在这样最初的、最单纯的规定性之矛盾的发展中。

适应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那个最单纯的规定性也随之而发展，愈益获得新的方面，并丰富其内容。商品交换越发展、扩大，劳动力出卖者的质，就越发增加。不论资本主义通过如何的阶段，这个资本主义发展之最单纯的规定性，就在每一阶段获得特殊性而被保存着。在一定的过程存在而没有消灭的限度内，那个过程的质是被保存的。

帝国主义时代，虽说由于许多特殊性而与自由竞争时代有区别；但是，整个资本主义的质，在帝国主义时代，仍然保存着，发展着。

帝国主义阶段与自由主义阶段各有许多不同的特性，但资本主义的性质是始终存在的。^[1]

[1] 以此种形式排印的，是毛泽东的批语。下同。

不但要认识整个过程的根本性质，而且要认识这个过程各阶段上性质的差异。

苏联经济三个阶段中，不但苏维埃制度的根本特性发展加强了，而且各阶段都有不同的质。

？

过程各阶段是统一的，但根本特性在各阶段中都有新的发展，认识各阶段中的特点是要的。

质表现于许多特性中。

任何过程都有许多特性，为其根本的质

对于任何过程之具体的研究，不仅要求研究整个过程之质，并且要求在其相互的质的差异上，去研究这个过程的种种发展阶段。

例如，苏维埃经济，在其发展中，经过了两三个阶段。即，经过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的复兴期、再建期，现在进入于社会主义的时代。每一阶段都把全体的苏维埃制度的根本特性发展了，并且加强了；同时，各个阶段又各自具有相异的质。[第 253~257 页]

固然，各个发展阶段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先行的阶段是以后各阶段的准备，但各个阶段，都独特的发展了整个苏维埃制度之规定的特殊性，即“质”；我们必要记住这一层，去考察各阶段之质的特殊性。

发展的各过程各阶段之质，显现于许多特性之中。

不单是社会过程如此，即客观世界的任何过程，也都具有为其固有的质之发展所规定的许多

所规定。特性，都具有许多的固有性。

一切过程依一定方面互相联结，例如苏联与外国依条约与军备与外国联结，这些方面根本上为过程的质所规定。

过程中质的发展使得过程的固有性随之发展，例如恐慌随资本主义之根本特性而发展。

固有性有本质的非本质的。

过程发展有原为本质的固有性变为非本质的，有原为非本质的变为本质的。这个区别是

我们知道，所谓孤立的过程是没有的，一切过程都依一定方面互相联结着。例如，苏联即处于与世界资本主义的联结之中。这个联结，显现于许多固有性之中，这些固有性，如以对外贸易的独占及苏联之强化为目的的许多条约关系，以及保卫苏联之必要的军备等即是。

过程的质之发展，规定过程的固有性之发展。例如，随着资本主义的根本特性的发展，恐慌也发展起来，尖锐化起来；产业循环期，每次都呈现为新的独特的形态。譬如，在战后帝国主义时代中，恐慌及不景气的期间延长了，好景气的时候非常的缩短了。

固有性有本质的及非本质的。例如，产业循环期之周期的交替，对于资本主义是本质的东西；但在好景气之时，某部分的恐慌高涨起来，那是非本质的。就运动过程的各阶段说来，某种固有性虽是本质的，但在一定条件下，在以前的发展阶段上虽不是本质的东西，而在特定阶段上却变成本质的东西。这在相反的情形也是一样。……

对于固有性之本质的东西及非本质的东西，

必要的，否则如没有区别的能力，就要引到错误的结论。……
错误。

过程的质只有通过各阶段的固有性才能发展。

固有性的发
展，促进过程由
一阶段转变到他
阶段。

过程有共同特性又有多数方面，这些方面又都有其特性。

过程有质的一方面，还有量的一方面。

[第 258 ~ 260 页]

任何过程之根本的规定的特性、即它的质，只有通过各阶段的固有性之发展而发展。
[第 260 页]

保存整个过程的质的固有性之变动，促进那过程的发展，招致由一发展阶段到他发展阶段之过程的转变。

各过程互有质的区别，同时，又具有被一个规律性所连系的多数方面。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分配、消费，表现为一个生产方法之质的差异的方面。

质的规定性，只给与我们以过程的一方面的认识。在确定了过程的质及其固有性之后，我们的认识更加前进，进到下面的阶段——过程的量的规定性之认识。

二 发展之量的规定性

世无无量
之物。

我们在一切过程中，都与量的规定相接触。过程之量的规定性，不是我们头脑的创造物。它不像怀疑论者及主观主义者所想的那样，它不单

依一定方法，使过程的要素及方面完成量之发展。

是我们的表象，而是存在于客观的现实之中。不具有量的规定性的事物，一个也没有；又，不依一定方法使其自身的要素、自身的方面成就量的发展的过程，一个也没有。

量与质，不是各自独立的存在着的东西。

量与质是同时存在（非分割的），同时发展，二者是统一的。

不同过程，量也不同。布匹、人寿、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量之发〔展〕都不同。

量的发展速度，依质的情况而不同，质规定量。

任何过程量的特殊发展，为特殊的质所规定。

质在过程各

……不同的过程，具有不同的量的规定性。布匹不能用里特^[1]去测量，人的寿命不能用启罗格兰姆^[2]去测量。资本主义，描画着腐朽的曲线而发展；苏维埃制度，描画着成长的曲线而发展。过程之量的规定性，其发展的期间及速度。依存于过程之根本的特性，为过程之质所规定——这一层，从前面关于质的陈述看来，是不难理解的。[第 261～263 页]

任何事物，任何过程之特殊的量的规定性，都为那事物的质所规定。

特殊的被规定了的量之变动，起于过程之各

[1] 里特，现译升。

[2] 启罗格兰姆，现译千克。

阶段中起变
〔化〕，规定着
量也起变化。

量的变化也
促进质的变化。

认识质量联
结不可分，认
识量的发展之
特性是最要任
务之一。

不了解过程
质的特殊量也
特殊，以为不
同的质却是相
同的量。

红白军质不
同，量也不同——
行军速度，任苦程

阶段的发展之中。

计划经济的发展及强化，社会主义关系的优
势，农业的半数以上引入了社会主义关系，这些
事，使得进到社会主义时代的速度显著的增高，
超越再建期及复兴期的速度，而使经济上发生质
的变化，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工事的完成。这
样沿着加速曲线的成长，变成苏维埃经济之规律
的发展现象。

确定量与质之不可分的联结，确定过程之量
的方面之特殊的的规定性，是唯物辩证法最重要的
要求之一。

右翼，左翼以及一般害虫们的见解之理论的
基础之一，即在于他们不能理解量之特殊规定
性。

孔德拉捷夫^[1]，克鲁曼，查亚诺夫^[2]及其他
害虫们，都以为苏维埃经济不能成就在资本主义
经济以上的发展速度。他们以为，前者和后者一

[1] 孔德拉捷夫，现译孔德拉季耶夫。苏联经济学家。

[2] 查亚诺夫，现译恰亚诺夫。苏联经济学家。

度，作战力量。

国共两党，
质不同，量也
不同。

路遥知马力，
马力是质，
路遥是量。

压迫的政策
大减学生学习的
积极性，我们学
校则不然。

睡得死，能
力增加；精神
疲劳，则产量
减少。

新量〈质〉
规定了新量的
发展。

分配土地这
个政策的质，规
定了农民积极性的
提高，大量的
扩大红军，发

样，也是沿着腐朽的曲线发展。这种速度论是从那里发生的呢？这种速度论，是由于把苏维埃经济看成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这种速度论，是由于他们没有理解资本主义体系及社会主义体系在原则上是两个相异的体系。右翼机会主义者们，也宣传了同样的腐朽曲线的理论。……他们的任何一方面，都不理解苏维埃制度的特性，开拓着生产力之未曾有的新的发展速度之可能性。他们的任何一方面，都把资本主义的产业发展速度，机械的转用于异质的俄国的条件之上。

右翼之机械论的立场，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当布哈林、路易柯夫、特姆斯基等主张要减低党所公布的速度时，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他们以为俄国经济的发展，应当按照与复兴期最后数年间相同的速度进行。他们不能理解新的质给与了发展之新的量的规定性，不能理解进入到再建期就是意味着新的发展速度——这种无理解，是他们那种见解之方法论上的基础。在苏联进入到社会主义时代的今日，右翼及左右两派反对党所采纳的发展速度；其反对的论据，也是这个同样的方法论上的特征。

展农业经济与
合作社。

和平与民主政策的结果，使得抗日力量大为增加。

如果中国实行民主制度，全国各方面的发展将不可限量，故必须量与质之联结。

机械论者不承认质，只承认量，忘掉一方面。

把一切不同质的现象对立起来是必要的。

因为量的变

对于过程及其各个阶段上量的发展之特殊的规定性，没有理解，这在托罗斯基的场合，特别明显。托罗斯基在第十五次党大会以前，就已要求国内之过度工业化。但是，在俄国进入社会主义时代，用非常的速度向前发展之时，托罗斯基却不能抓住这一时代之特殊的特性，却反对这个速度，以为过于极端。[第 265 ~ 267 页]

机械论者们不以暴露过程的质为任务，他们以为科学之唯一的任务只在作出现象之纯量的说明。

……布哈林在史的唯物论^[1]中，大声疾呼把力学的现象和“有机的现象对立起来……是没有意义的”。机械论者们，要求只研究过程之量的方面。……[第 268 页]

恩格斯批评那否定质与量之联结的机械论的思想。他说：“机械论的意想，在从地点的移动去说明一切变化，从量的差异去说明一切质的差

[1] 现译名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布哈林 1921 年著。

化产生了质的变化，反过来质的变化又产生了量的变化。

？

异；致于质量相互之间所有的关系，质到量的转变，量到质的转变，其中的相互作用，是没有注意的。如果一切质的差异及变化，不能不归约于量的差异及变化，不能不归约于机械的转动，那末，我们就必然的到达于如次的命题。即，一切物质都由同一的极微体构成；物质的化学要素之一切质的差异，都起于这些极微体在原子中被统一时之数量的差异及空间的集结。”^[1]

三 由量到质及由质到量的转变的法则

质在量中发展。

量发展便变为新质，新质发生，新量也发生，质变为量。

只有依量的变化质才能变

如上所述，没有无量的质，也没有无质的量，——质量这两个方面，在客观的现实上，是在统一之中被给与着。质在量之中发展，即一定的，特别的，被规定了的过程在量之中增大，使其一切方面或要素发展。量，特别的被规定着。过程发展其一切方面而转化为其对立物。过程之量的增大引导其自身转化为新质。——量转变为质。

另一方面，新质的生成，同时就是新量的发生。——质转变为量。

恩格斯把由量到质的转变及由质到量的转变，认作辩证法的三个根本法则之一，他说：

[1] 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96～597页）

化，也只有依质的变化，量才能变化。

人多成王。
温度增减成固、
液、气。王子筷子集散。地小不
足回旋，地大则否。英勇〈雄〉
无用武之地。有机体。帝国主义。
苏联经济。民主运动。抗日
运动。长袖善舞、
多财善贾^[2]。韩
信将兵。

第二种见解，

对

过程间
的转变
的方法

“这个法则，为着我们的目的，可以这样表示出来。即，在自然界中，质的变化，只有依着各个场合中正确的被规定了的方法——物质之量的增减及运动，才能发生。”^[1]

无论观察任何过程，过程之量的增大都引到新质。在气压不变的情形下，温度降至摄氏零度，水变成冰；温度升至摄氏百度，水变成蒸气。

如达尔文所证明，有机体中渐次的量的变化，引到有机体中之质的变化。资本主义的独占之量的增大及扩张，和资本主义的现实的其他方面的增大相伴行，导入了资本主义之新阶段的发展，即帝国主义。在苏联，贯通于国民经济全线之社会主义要素的成长，引起了由复兴期到再建期的转化。[第 269 ~ 272 页]

各过程之量的增大，受那过程的构造所规定。各以独特的方法显现。苏联向社会主义的推移，向过渡期的社会主义时代的转化，也各以独

[1] 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5页）

[2] 参见《韩非子·五蠹》。原文是：“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

特的方法显现着。

对

所谓量到质的转变，就是一定的质及其量的规定性，同时转变为具有别种量的规定性之别种质。

对

过程间的
转变与过
程中的转
变之区别

把一种过程到他种过程的转变和过程内部的转变相区别，把一种质量到他种质量的转变和质量内部的转变相区别，这是必要的。

民主革命过程中，辛亥革命、袁世凯、五四运动、大革命、苏维埃战争、民主共和国，各阶段不同，每阶段内还有一些小的阶段——例如争取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

过程与阶段

的区别

一种质量到他种质量的转变，例如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就是到新形式的规律性的转变。反之，质量内部的转变，例如由单纯的资本主义协作转变到工场手工业，更进而转变到机械的生产方法，乃是质量之特性的发展，乃是质量由一阶段到他阶段的转变。各阶段，使从前阶段的各方面在量之中发展着，并且添加几多新的方面和属性，而与从前的阶段有质的区别；但是，截至某一定的瞬间，还没有引导到全体的质量向新的质量之转变。

连续的中断

一切质量，到达某一发展阶段时，就中断其一定的发展过程，而转化为别种质量。

通过飞跃或

一种质到他种质的转变。一种质量到他种质

革命而表现

量的转变，通过飞跃而显现。例如，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是通过革命而显现的。

承认飞跃的发展，是辩证唯物论中心特点之一。

自然、社会、思维，都有飞跃。

飞跃的瞬间，旧质消灭，新质产生（以旧质为基础）。

旧物之质与量都中断，新质与量开始发生。

旧过程是新过程的准备，旧阶段是新阶段的准备。

新过程或新阶段中保存着旧

承认飞跃的发展的道路，乃是辩证唯物论之中心的特性之一。

不论在客观的现实之一切领域中，或在思维之中，都发生飞跃。一种质到他种质的转变，完全是飞跃。这因为在那一瞬间即转变的瞬间，旧质失去了作用，以旧质为基础而生长了的新质开始发展。一切飞跃，都是“连续性的中断”。这因为在那一瞬间，旧物之量的发展被中断，而新物的发展即新质量及新质的规定性开始发展。

新质不是一时突然出现的。旧质之一切从来的发展，是新质的准备。机械的生产方法是由工厂手工业的发展所准备的；手工业之部分作业的细分，准备了向着机械的推移。社会主义，是由资本主义发展的全进行，资本的聚积及集中，普罗列达里亚的成长等等，所准备了的。

新质从旧质生长出来，而且在长时间还保存着若干旧来的特征及方面。资本主义，在长久期

质的残余，而且长时间新旧错综，但有主导。

不但过程而且阶段，凡有质的变化就是飞跃。

这一认识却要紧。

一切客观过
程都如此。

飞跃各以独
特的方法

举例

飞跃的特

间，还保存着单纯商品关系及若干封建的遗物。

我们不仅要考察一种过程到他种过程的飞跃，一种质量到他种质量的飞跃，例如由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飞跃；并且还要考察过程内部或质量内部的飞跃。在资本主义以及苏维埃经济中，由一发展阶段到他发展阶段的转变，是一个飞跃。这因为它在质的方面转变到新阶段。

这种飞跃是与一种质量到他种质量的飞跃有区别的，因为它是在当作全体看的过程之一定规律性的范围内所发生的飞跃。

质量内部的飞跃、种种方面的飞跃的发展路程，是客观现实的一切过程之发展中所固有的。在动物及人类的有机体中，显现着万千的飞跃的变化；生物学上的种，通过若干的飞跃而变化；化学上的原素，其形成及分散，都是飞跃的。

各种质量，以其独特的方法，转化为他种质量。唯物辩证法要求认识特殊性及规定性，要求认识转变及飞跃。

由新经济政策的再建期到社会主义时代的飞跃，和那到资本主义过渡期的转变，带有完全不同的性质。

飞跃的特殊性及形式、期间、速度及强度，

性、形式、速度、强度，因过程的不同而不同，即受旧质的特性所规定。

都受旧质的特殊性——它的构造、及新生长着的质的特性所规定。由水到冰的飞跃，在极短的时间内进行；但是，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飞跃，却必须伴着资本主义内部的发展的若干飞跃的方面所经历的长时间。唯物辩证法要求认识过程之质，要求指出飞跃的特殊性。

举例

辩证法要注
意飞跃的特性。

德波林的离开实际，也不知过程内部的飞跃。

托洛斯基也不懂

德波林一派，对于飞跃的特殊性虽曾给以一瞥，但他们之中，谁也不能用具体的实例去指示这种特殊性。德波林一派，更没有提出质量内部的飞跃的问题。

不能理解飞跃的本质及其特殊性，这是把不同时代不同过程的飞跃作同视的托罗斯基的特征。

机械论

对于飞跃的发展方法之否定，是机械论者的特征。机械论者否定质，只承认量的发展，因此，他们当然也否定飞跃。

视飞跃为
神秘

波格达诺夫^[1]肆口嘲笑了辩证法之神秘的飞跃。有些现代机械论者，以为飞跃只存在于我们头脑之中。现实中存在的东西，只是不断的量的发展。机械论者，是站在所谓渐次的发展、过程

[1] 波格达诺夫（1873—1928），在其他处又译波格达洛夫等，现译波格丹诺夫。俄国社会哲学家，经济学家。

庸俗进化论

的渐次的增减之见地上的。这种渐进主义的见地，正是一切修正主义的基础。……[第 272~276 页]

渐进主义是庸俗的经验论，忘记阶级根本利害。

以上论过程质的特性及量的特性。

以下论过程发展之内的规律性。

两种见解

第一种见解，机械的发展观，发展由于量的增减。只从片

……渐进主义的见地，陷于鄙薄的经验论及拜金主义，忘记阶级之根本的利害，导入于基尔特气习^[1]的游戏。

四 当作辩证法的本质看的对立之统一及斗争

以上，我们确定了过程的特殊性、其质的特性及量的特性，现在，要进而考察过程的发展之内的规律性。

在人类思想的历史上，有关于发展的两种根本的见解。依照第一种见解，所谓发展，是存在物之单纯的增减。……

第二种见解，以为一切事物都由于对立的斗争、由于统一物的分裂而发展。……

第一种见解是机械的。这种见解，从现象的表面出发，只能从外面去记载过程的增减，而不能说明过程的运动之内的原因，不能指示出一定

[1] 基尔特气习，基尔特，现译行会。基尔特气习，即行会习气。

面与外面看问题，不从全面与里面看问题，不能说明事物发展的原因。

第二种见解，唯物辩证的发展观，暴露过程自己运动的源泉。所谓认识过程，就是暴露出过程之充满了矛盾的各方面，确定这些方面之相互关系，追求过程之矛盾的运动。

把过程在其分裂上去认识，考察过程充满了矛盾的部分，以及这些部分之相互关系时，我们就能认识过程由发生到消灭的发展。所以列宁

的过程怎样发展并为什么发展。……

第二种见解，不停留于现象的表面，而深入于过程的底层，暴露过程的发展之内的法则，确定一定过程之发展的原因，在这种场合，不在过程的外部而在过程的内部去发现发展的原因，主要的注意在于暴露过程的“自己运动”的源泉。依照这种见解，所谓认识过程就是暴露出过程之充满了矛盾的各方面，确定这些方面的相互关系，追求过程之矛盾的运动。……

第二种见解，是辩证唯物论的主张。

伊里奇说，统一物的分裂及其充满了矛盾的部分之认识，是辩证法的本质。这是说，把过程在其分裂上去认识，考察其充满了矛盾的部分以及这些部分之相互关系时，我们就能认识过程由发生到消灭的发展。这个法则，贯穿于客观的现实及我们的思维之一切方面。

说：对于统一物的分裂及其充满了矛盾的部分之认识，乃是辩证法的本质。

仅认识过程之互相区别、互相对立的许多方面与许多属性，以及认识这些方面与这些属性之互相联结，是必要的，但是不够的；还须认识所以使过程〔发展〕之根本的矛盾，这就是自己运动的源泉。

不 认 识 矛
盾，便不能认识
过 程 的 发 展 法 则。

暴露出质、量及质量这件事，使我们明白各个过程具有互相区别的、互相对立的许多方面。各个过程，具有内的联结着的，互相依存的种种对立方面。但是，为解答一切事物为什么发展这问题，单只确定过程之若干方面与属性以及这些方面与属性之单纯的结合，那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在任何现象之中，暴露出规定其发展之进行的根本的矛盾。

但是，普列哈诺夫只停留于对立的方面之单纯的确定，并没有暴露过程的自己运动的源泉。……[第 277～280 页]

五 统一物的分裂，本质的对立之暴露

马克思前后的布尔乔亚经济学，认为布尔乔亚制度不但现在存在着，今后也将永久存在；那种经济学不理解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性，不认识资

在過程中我們要看到矛盾，要看到過程是矛盾的一方指向另一方，這就是一個問題。當時我們被列哈諾夫的過程，由外向內到內向外的發展所吸引，對於統一物的關係，我們沒有去考慮。列哈諾夫說：「凡是一切運動都是統一的，因為運動的本質就是統一的。」

四、當作辯證法的本質看的對立之統一及鬥爭

二八〇

伊里奇說，統一物的分裂及其充滿了矛盾的部分之認識，是辯證法的本質。這是說，把過程在其分裂上去認識，考察其充滿了矛盾的部分以及這些部分之相互關聯的認識。

是說，把過程在其分裂上去認識，考察其充滿了矛盾的部分以及這些部分之相互關係時，我們就能認識過程由發生到消滅的發展。這個法則，貫穿於客觀的現實及我們的思惟之一切方面。

(1) 這個識別三相對立的過程，曝露出質、量及質量這件事，使我們明白各個過程具有互相區別的、互相對立的許多方面。每個過程，具有內的聯結着的，互相依存的種種對立方面。但是，為何呢？此屬性之解答一切事物為甚麼發展這問題，單只確定過程之若干方面與屬性，並不能解決。屬性之單純的結合，那是不夠的。我們必須在任何現象之中，曝露出規定其發展之過程的三相對立的根本的矛盾。

之相對立的矛盾，已經是三相對立的過程。

但是，普列哈諾夫只停留於對立的方面之單純的確定，並沒有曝露過程的自己運動的源泉。關於普列哈諾夫，伊里奇寫道：「對於辯證法的這個方面，普通在普列哈諾夫的場合）都沒有加以注意。對立之同一性，被解釋為實例的總合……不被解釋為認識的法則（而且是客觀的世界之法則）」。——唯物論與經驗批評論。

旧经济学与 新经济学的区别

本主义走到死灭的内的矛盾。甚至于亚丹斯密^[1]、李嘉图一流的进步学者，虽承认价值是体现于商品中的人类劳动，却仍不能暴露资本主义之根本的发展法则。这是由于他们没有看见资本主义的矛盾。马克思以资本主义之现实的辩证法，去对抗布尔乔亚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他说：“不要矛盾的独断，而代置以构成那独断所掩蔽了的基础的矛盾的事实及实在的矛盾，才能使经济学成为实证科学。”

马克思暴露了布尔乔亚生产方法的主要矛盾，由此说明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法则。

从生产社会性与占有私人性间的矛盾看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的矛盾，这是根本矛盾。由这根本矛盾发生其他一切矛盾，由这根本矛盾规定资本主义的发展。

不平衡发展

马克思在资本论之中，指摘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及其“自己运动”的主要源泉，论证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及生产关系间的矛盾规定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个矛盾，在于：生产力之发展，在剩余价值生产的名义上显现，而又成为产生剩余价值的手段。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之发展，陷入于和那狭隘的目的即剩余价值的产生之间的日益不能相容的矛盾。

伊里奇指示了资本主义在其最后的发展阶

[1] 亚丹斯密 (1723—1790)，现译亚当·斯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

是帝国主义的主要矛盾。

段，转化为资本主义体系的主要矛盾极度激化的帝国主义。从分析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主要矛盾出发，从各国的帝国主义之不均等的发展法则出发，伊里奇论证了帝国主义的锁链中最弱的一环被冲破的现实性，科学的证明了一国中革命的胜利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

九一八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我们论证了民族统一战线的现实性，证明了民主共和国的可能，这样去解决这个主要矛盾。

苏联过渡期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个矛盾不断发生的基础是富农的存在。其他一切矛盾，都受这个主要矛盾所规定。只有由于工业化及农业社会化，才能将此主要矛盾解决，但有用

伊里奇和斯达林^[1]在其著作中，指摘出过渡期之根本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并证明使这个矛盾不断的再生产的根柢，是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和分散的小布尔乔亚农业之间的矛盾，是主要阶级的普罗列达里亚和农民层之间的矛盾，——这农民层中的劳动者是普罗列达里亚的同盟者，但农民层中的小所有者，却时时刻刻产出资本主义。他们指示了苏联普罗列达里亚和资本主义要素之间的对立（不能相容的矛盾），是怎样产生并怎样成长的。

[1] 斯达林，在其他处又译斯丹林等，即斯大林。

内部力量解决此矛盾之可能。

一切客观过程都由内部矛盾而发展。

原子的内部矛盾规定原子之物理化学性质。

化学元素的发展由于内部矛盾。

生与死、发生与消灭、同化与异化，由于内部矛盾规定有机体现象的发展。

变异性、遗传性之矛盾统一——有机体发展的主要原因。

内部矛盾，不但使社会现象发展，并且使客观现实的一切现象发展。

现代科学早已不把原子看作物理学上的物质被分解的最后界限，现代科学发现了原子是阴阳电子的统一，并且阐明了这阴阳两电子的交互渗透规定原子之物理的及化学的性质。不仅如此！在二三十年前，物理学及化学尚被认为绝对不变的东西。基于历史的见地，去考察化学元素的性质，还是最近的事情，化学元素在发展着。化学元素之发展的内的根据，就是元素的内的矛盾之运动。

生命现象的自然过程之辩证法的性质，特别明了的表现着。不论在有机体的生命中，或在各个细胞的生命中，生和死、发生和消灭、同化和异化（物质和能力的新陈代谢），都是被给与的内的统一。

在生存竞争中的变异性及遗传性之充满了矛盾的统一，是有机体发展的主要原动力。

矛盾统一及其分裂也是思维的法则。

认识受实践状态及社会历史所规定。

统一物的分裂，是一切客观现实过程及思维过程之普遍的发展法则。

所谓对立统一，就是统一物分裂为互相排斥的对立以及这些对立间的相互联结。这就是所谓主要矛盾，所谓自己运动的源泉。

矛盾的特殊

对立的统一和统一物的分裂，是我们思维的普遍的发展法则。如前所述，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运动于相对真理及绝对真理的矛盾中，我们虽认识绝对真理，但在各个特定的发展阶段上，我们的认识是相对的。

我们的认识，受我们的实践状态及一切从社会的历史所规定。

统一物的分裂，是客观现实及一切思维过程之普遍的发展法则。辩证唯物论——伊里奇说——“是把发展当作对立之统一（统一物分裂为互相排除的对立以及这些对立间的相至关系）”去观察，因此，“主要的注意在于认识自己运动的源泉”^[1]。统一物的分裂，正确的摘发出过程的本身、过程的内容、过程的矛盾、过程之自己运动的源泉的主要矛盾。

一种过程之内的矛盾，和他种过程之内的矛

[1] 参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12页）

性，每一不同过程的矛盾互不相同。

没有同型的矛盾。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

盾，是不同质的。那只有依着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解决的资本主义的矛盾，和过渡的经济之矛盾，各不相同。

托罗斯基主义的特征，就是不理解各过程之内的矛盾的特殊性。托罗斯基不知道帝国主义时代中资本主义之主要矛盾的发展的特性，不知道不均等的发展法则。他之反对一国内社会主义的胜利之可能性，其第一论据就是从此产生。在托罗斯基看来，苏联中普罗列达里亚及农民层的矛盾，和资本主义经济中普罗列达里亚及布尔乔亚的矛盾，是同型的矛盾；后一矛盾和前一矛盾同样，只有由于国际革命才能解决。他反对一国内社会主义的胜利之第二论据，就是由此发生。实践，反驳了托罗斯基的理论，证明了不同质的矛盾要用不相同的方法去解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普罗列达里亚和布尔乔亚的矛盾，被革命所解决；而在苏联条件下的普罗列达里亚及农民层的矛盾，却由国内的工业化及农业的集体化所解决。实践，把一国内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可能的理论，精当的确证了。[第 281～286 页]

中日民族矛盾要用联合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去解决。一九二七〔年〕后的国内矛盾，却只用联合农民与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去解决。劳资间的矛盾，在平常时期要用工人统一战线去解决。党内及革命队伍内正确路线与错误倾向间的矛盾，用思想斗争的方法去解

决。在国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间的矛盾，用革命去解决。苏联无产阶级与农民的矛盾，则用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去解决。社会与自然间的矛盾，用发展生产力去解决。过程的矛盾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

辩证唯物论看问题，有暴露任何过程内部矛盾的特殊性之必要，同时认识过程各方面的矛盾之特殊性也是必要的。对立的两方面中，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地位，即每方的特性如何，各用怎样的具体形式同对方发生依存关系，在依存破裂时，又各用何种形式同对方斗争。研究这些问题。

与托罗斯基主义及与右翼机会主义相斗争的课题，教给我们有暴露任何过程之内的矛盾的特殊性之必要。同时，认识那为全体过程的矛盾所规定的过程各方面的矛盾之特殊性，也是必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这样说过：

“普罗列达里亚和财富，是互相制约的对立。并且两者形成一个总体，两者都是私有财产的世界产生出来的。问题就是，这两个对立，在矛盾之中，各占着怎样的特定的地位呢？单只说明统一物的、整体物的这两个方面，那是不够的。”^[1]

为理解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必须认识普罗列达里亚及布尔乔亚的特殊性，必须认识两者相互的关系及其具体的依存关系，必须认识被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所规定的两阶级的相互制约性。

[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著《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3页）

题，是我们的任务。列宁主义就是研究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作斗争的各种具体形式的科学。

六 对立的相互渗透

对立的方面互为条件，一方存在他方才可能存在。

内的对立互相结合，对立的一方面如没有他一方面就不能存在。

国家统制与商人自由之对立的统一，此类例子可举出许多，都有这样不可分的两方面互相联结。

一切过程都如此，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

新经济政策，内部存有矛盾。斯丹林说：“在新经济政策中，必须保存两个方面——一方面与战时共产主义相对抗，以买卖之一定自由的保证为目的；他方面与买卖之完全自由相对抗，以国家的市场统制的任务为目的。这两个方面中，去掉一个方面——那样，在我们之下就没有新经济政策了。”^[1]

充满了矛盾的方面这样不可分的联结，在客观现实的一切过程中，也可以看见。

[1] 参见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5页）

对立的两方面相互结合，并转变到新的对立，即所谓相互渗透。

对立的互相结合及其转变即是相互渗透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对立关系的相互渗透

对立，不仅处于不可分的联结中；并且一个对立转变为别一对立，相互的渗透着。

矛盾的一方面以他一方面为前提，向着他一方面转变。……由工厂手工业到机械的生产方法之发展，同时是生产力的发展，又是新生产关系的发生。劳动力和生产手段的统一，同时是生产力的联结，又是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联结即生产关系。工厂手工业中的分业，是生产关系，又表现为生产力。以此为基础，即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交互渗透为基础，展开普罗列达里亚及布尔乔亚间之激化的矛盾的过程。

游击战争与正规战争，保存游击性与克服游击性；分配土地的土地私有与准备转变为社会主义；共产党的民族性与国际性；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

对立的相互渗透，一个对立向他一对立的转变，存在于一切过程之中。为要暴露及指摘这种相互渗透的性质，必须具体的分析过程。

我们进到了社会主义时代，但又经历着新经济政策的最后阶段——这是一个矛盾。我们巩固货币制度及信用组织，实行节约冗费及统制卢布，以节约冗费为基础发展着苏联的商业。货币制度及银行的强化，同时又是社会主义会计、计划训练的造出及强化；冗费节约的实施，同时又是社会主义的计划化，伸张到作业场、工作组及

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战争与和平，和平与战争；同资产阶级联盟与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叛变；共产党同国民党妥协，正是加强共产党的独立性；军队的休息训练，同时即是加强战斗力；退却与防御，同时即是准备进攻；良药苦口，同时却利于病；忠言逆耳，同时却利于行；羊肉好吃，无奈烫的〈得〉慌；玫瑰花儿可爱，刺多扎手；佳人却可倾国；^[2]祸兮福

集体商场。苏维埃商业的发展，同时又是作出生产物之社会主义分配的要素的路程。集体农场是在内部分配利益的亚尔特尔，同时又是社会主义的企业之一种模型，并且这种企业不久就会变成彻底的社会主义的企业。在国家问题之中，也有与此同样的对立之渗透。社会主义是以国家之消灭为目标的制度。但是，我们正在策进普罗列达里亚独裁^[1]的强化。我们所以使国家发展，因为要造出把国家引到死灭的条件。“国家权力之最高的发展，是以准备消灭国家权力的条件为目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它‘矛盾着’吗？是的，它‘矛盾着’。但是，这个矛盾正在生动着，它完全反映着马克思的辩证法”。（斯大林）

[1] 普罗列达里亚独裁，无产阶级专政一词的旧译。

[2] 佳人却可倾国，参见《汉书·孝武李夫人传》：“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倾城、倾国，既可指倾覆国家，也可用形容女子的绝美。毛泽东这里指旧谓绝美的女子可以误国、亡国。

所倚，福兮祸所伏；^[1]都是互相渗透、互相转变的对立。一切对立都是这样的。

在民族文化和国际关系的交互关系的问题中，也有与此同样的相互渗透。我们使民族文化发展，但是那种发达，同时是使民族文化死灭、是准备融合民族文化为一个共同的国际社会主义文化的条件。对立的统一及互相渗透，“使得多数派能够在民族问题的领域中，建立坚固不拔的要塞，反映着生动的真理”。

以上苏联的八个例子。

辩证法中心任务，在研究对立的相互渗透即对立的同一性。

由对立转到同一：战争是双

正是这个对立的相互渗透，伊里奇名之为对立的同一性。暴露任何过程中对立的相互渗透及同一性，是我们的认识论、我们的辩证法之中心任务。

伊里奇说：“辩证法，是关于对立怎样能是同一性？又怎样是同一性（怎样变成同一性）？

[1] 参见《老子》第五十八章。原文是：“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方对立，同一是双方和平；国家是双方对立，同一是国家消灭。因为处在一个过程中对立互为条件，经过斗争克服对立，所以能变成同一性。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条件之下，国共对立却变成同一性，而转化为统一战线。统一战线与侵略战线的对立，在民众起来与世界革命条件之下，却将变为同一性而转化为世界和平。因为客观现实一切过程都是由于矛盾的对立与转向

在怎样条件之下，对立变成同一性而互相转化？为什么人的悟性不把这些对立当作死的、凝固了的东西去观察，却当作生动的、附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观察？等问题的学说。”^[1]

[1] 参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11页）

同一性，转向否定之否定。他们本是生动的、附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所以人的悟性这样去观察。

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之对立与转向同一。

如不具体研究过程，无法了解对立的同一性即相互渗透。

认识过程中对立的同一性（或相互渗透），就是认识过程中矛盾着的那些方面（即过种〈程〉中主要矛

对立的互相渗透，同一性，又是我们的认识过程的特征。人类认识的主要矛盾之一，如前所述，是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矛盾。相对真理在种种形态上反映绝对真理；绝对真理由顺次的相对真理所组成。

对立的同一性及其相互渗透之暴露，要在过程之具体的研究以后，即在过程之充满了矛盾的方面，这些方面的联结及相互制约性的特殊性之具体的研究以后，才有可能。……[第 287 ~ 292 页]

研究对立的相互渗透、同一性，就是认识过程之充满了矛盾的方面的运动、发展、被制约性及其一切限界的可动性、与这些界限的互相转化。[第 292 页]

盾与若干其他次要矛盾每一种矛盾之两方面)之运动，那些方面的被制约性，那些方面所设界限的可动性，以及那些方面所设界限的相〔互〕转化。辩证法研究这许多，就是对立的同一性或相互渗透。

不是统一物的分裂，而是外在地存在的两种力；不是内的矛盾，而是外的矛盾；不是对立的两方面不可分地结合着，而是二力各能独立生存——反

依照布哈林的意见，互相独立的力存在着，它们互相作用。而且，运动之引起，由于不同方向之力的外的冲突。伊里奇要求首先要认识过程之内的矛盾，发现自己运动的源泉；但布哈林却要求去确定互相冲突的外力。伊里奇要求论证统一物的分裂，暴露对立的同一性，即确定对立的诸方面之不可分的联结；但布哈林却要求只去考察互相独立的力，各自能够个别存在的那样的力。布哈林把对立之统一的法则，机械的去理解。这是由于他从力学的概念、互相独立的力之单纯的冲突出发的缘故。

从对立的互相渗透之机械的解释出发，对于

辩证主义的形而上学。

有组织的资本主义

矛盾普遍的存在着，对抗是某些过程的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才发生的。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之间的矛盾、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国家与国家间的矛盾、党派与党派间〔的〕矛盾，如此等等的矛盾，都有发展为对抗的形势。社会过程中这种对抗，取压迫与战争的形式；自然过程中

现时帝国主义的研究，就会产生这样一种理论，即不把各国之内的矛盾而把世界市场中各国之外的矛盾，看作是帝国主义时代的根本东西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理论。

布哈林和一切机械论者同样，把矛盾和颉抗^[1]看做同一的东西。这是不正确的。颉抗，是用革命的方法能解决的对立之斗争。例如，普罗列达里亚和布尔乔亚的矛盾，带着颉抗的性质。但，一切矛盾并非都是颉抗。例如，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之中，没有互相反拨的两力。普罗列达里亚和农民层的关系，不带有颉抗的性质。这两个阶级之中，存有许多共同的利害。把矛盾和颉抗视为同一，这件事在一方面，变成和托罗斯基主义者一样，认为普罗列达里亚和农民层之间既有矛盾，这个矛盾就带有和普罗列达里亚及布尔乔亚的矛盾相同性质，即认为这个矛盾带有阶级的颉抗关系；在他方面，变成和右翼机会主义者一样，认为普罗列达里亚和农民层既有许多的共通利害，这两个阶级之间就不存有矛盾。

在展开了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没有阶级斗争也没有阶级的颉抗。但是，布哈林把矛盾和颉抗看做同一，以为在展开了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任何矛盾也没有了。伊里奇回答这种主张，这样说

[1] 颡抗，在其他处又译颉顽、拮抗等，现在一般译为“对抗”。

力組織的資本主義

六 國立的相互關係

二九四

樣一種理論，即不把各國之內的矛盾而把世界市場中各國之外的矛盾，看作是帝國主義時代的根本東西的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的理論。

新舊社會

布哈林和一切機械論者同樣。把矛盾和諷抗看做同一的東西。這是不正確的。

新舊社會

諷抗，是用革命的方法能解決的對立之鬥爭。例如，普羅列達里亞和布爾喬亞的矛

盾和階級之間的矛

盾，帶着諷抗的性質。但，一切矛盾並非都是諷抗。例如，使用價值和價值的矛盾

屬於經濟階級

之中，沒有互相反撥的兩力。普羅列達里亞和農民層的關係，不帶有諷抗的性質。

新舊社會

與波尼亞特納
這兩個階級之中，存有許多共同的利害。把矛盾和諷抗視為同一，這件事，在一方面

新舊社會

矛盾就帶有和普羅列達里亞及布爾喬亞的矛盾相同性質，即認為這個矛盾帶有階級的

新舊社會

關係，而在另一方面，變成和右翼機會主義者一樣，認為普羅列達里亞和農民層既

新舊社會

有許多的共同利害，這兩個階級之間就不存有矛盾。

新舊社會

在展開了的社會主義社會中，沒有階級鬥爭也沒有階級的諷抗。但是，布哈林

新舊社會

把矛盾和諷抗看做同一，以為在展開了的社會主義社會中，任何矛盾也沒有了。伊

新舊社會

也以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對抗沖突已經不存在了。人人之間的打架鬥毆和謀殺殺人

新舊社會

已經不存在了。但事實上對抗衝突還存在，並且還比以前更強烈地存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發生了許多

新舊社會

的暴力行為，如殺人、打架、搶劫、偷盜等。這些行為就是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對抗衝突。

新舊社會

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對抗衝突還存在，並且還比以前更強烈地存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發生了許多

新舊社會

的暴力行為，如殺人、打架、搶劫、偷盜等。這些行為就是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對抗衝突。

新舊社會

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對抗衝突還存在，並且還比以前更強烈地存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發生了許多

新舊社會

的暴力行為，如殺人、打架、搶劫、偷盜等。這些行為就是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對抗衝突。

新舊社會

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對抗衝突還存在，並且還比以前更強烈地存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發生了許多

新舊社會

的暴力行為，如殺人、打架、搶劫、偷盜等。這些行為就是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對抗衝突。

新舊社會

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對抗衝突還存在，並且還比以前更強烈地存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發生了許多

新舊社會

的暴力行為，如殺人、打架、搶劫、偷盜等。這些行為就是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對抗衝突。

（這裏指的不是價值與使用價值的矛盾，而是指的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矛盾。）
生與死、富與貧、強與弱、勞動與知識、以及為主導的條件
生與死、富與貧、強與弱、勞動與知識、以及為主導的條件
（這裏指的不是價值與使用價值的矛盾，而是指的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矛盾。）
（這裏指的不是價值與使用價值的矛盾，而是指的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矛盾。）

「這是極端不正確的。額抗和矛盾斷然不同。在社會主義之下，前者消滅了，
都沒有對手了。」（伊里奇回憶著這種主張，這樣說着。）

（這裏指的不是價值與使用價值的矛盾，而是指的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矛盾。）

（這裏指的不是價值與使用價值的矛盾，而是指的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矛盾。）

七 矛盾之主導的方面的意義

（這裏指的不是價值與使用價值的矛盾，而是指的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矛盾。）

新經濟政策

半禮貌的選擇為社會主義而鬥爭。這許多方面中於一個方面是社會主義方面的，但別的次要方面由於二三點主觀的錯誤把這次選舉的負擔不能已別著落之在社會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方面，單就他擇好那樣地沒有希望的東西來（新例）。他所說的中不論三名句次要的對立面還不是他的對立面（之主導的方面）

七 矛盾之主導的方面的意義

二九六

素和資本主義要素的鬥爭。這是把矛盾的主導方面的勝利考慮過了的政治。「反對是對立面（之主導的方面）

派說新經濟政策是資本主義的。季諾維夫說，新經濟政策無論如何是退却的。這不能重申和依賴是

對方以行是對立面（之主導的方面）消說是完全錯誤的。實際上，關於新經濟政策，黨的政治容許了社會主義要素和資

本主義要素的鬥爭，並且考量了社會主義要素對於資本主義要素的勝利」

「實際上，現在我們之前發生的事情，不是資本主義復活之一方面的過程，一純粹資本主義的過程，而是資本主義的發展及社會主義的發展之兩方面的過程，是由社會主義要素去克服資本主義要素的過程」。（伊里奇主義的諸問題）

季諾維夫沒有理解這兩個對立的方面，資本主義要素和社會主義要素，在社會主義要素之主導的作用之下，怎樣很快的發展起來。因此，他把新經濟政策當作資本主義要素之單獨的發展，即退却評價了。

用方面的主導

普列哈諾夫沒有提出過曝露過程的主要矛盾之問題。至於矛盾的主導方面，更是一回也不會論及過。

普列哈諾夫沒有離開所謂對立的屬性之結合那種立場。一切修正主義者們，也同樣的否定了對立的鬥爭中之主導方面的作用。社會法西斯特們

是二三點主觀的錯誤把這次選舉的負擔不能已別著落之在社會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方面，單就他擇好那樣地沒有希望的東西來（新例）。他所說的中不論三名句次要的對立面還不是他的對立面（之主導的方面）

毛泽东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的手稿。

的对抗，〔取〕冲突撞击的形式；个人之间的打架、谋害，也着：“这是极端不正确的。颉抗和矛盾断然不同。在社会主义之下，前者消灭了，后者残留着。”^[1]（伊里奇对布哈林的过渡期经济学的评注）

属于这一类。许多矛盾是不发展成为对抗形势的：共产党内，正确与错误的矛盾；文化领域中，先进与落后的矛盾；经济领域中，城市与乡村的矛盾、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劳心与劳力的矛盾、生产与消费的矛盾；阶级关系中，工农的矛盾；社会主义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自然界中，

[1] 参见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2页。

生与死、正与负、遗传与变异、吸力与斥力、寒与温、海与陆。凡没有及尚未达到爆裂的条件下，一切矛盾都没有对抗。矛盾解决的方法与对抗解决的方法是不同的。这就是矛盾的特性与解决矛盾的方法的特性，应该分别认〔识〕的问题。

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先进与落后的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等等。

七 矛盾之主导的方面的意义

在确定了过程之内的矛盾，过程之对立的诸方面之不可分的联结以后，必须去发现这个矛盾之主导的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摘出

在商品的价值及使用价值那种对立的方面之不可分的联结中，价值具有主导的作用；指摘出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生产力具有主导的作用。

唯物辩证法对于理论和实践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在两者的矛盾上去究明，以承认实践到底是这个矛盾的主导方面为出发点

.....

季诺维夫^[1]没有理解这两个对立的方面，资本主义要素和社会主义要素，在社会主义要素之主导的作用之下，怎样很快的发展起来。因此，他把新经济政策当作资本主义要素之单独的发展、即退却评价了。

.....德波林主义者们，在任何的论文中，一点也没有述及应当暴露主导的对立之必要。他们不但没有把对立统一之法则的这一方面作出定式，并且无视了这一方面；这在他们的全体著作中，明白的表现出来。至于卢波尔^[2]，则以为理论决定实践，实践决定理论。他没有阐明实践之主导的作用，以为两者单只存有交互作用。德波林把新经济政策只当作资本主义要素和社会主义要素的斗争去下定义，并没有阐明社会主义关系

[1] 季诺维夫（1883—1936），在其他处又译季诺维埃夫，现译季诺维也夫。曾任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共产国际主席等职。

[2] 卢波尔（1896—1943），在其他处又译鲁波尔。苏联哲学家。

之主导的作用，也没有指摘新经济政策向着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前进的事实。

一个复杂的过程有许多矛盾，这许多矛盾中，有一个矛盾是主要矛盾，其他则为次要矛盾。由于主要矛盾的发展规定各次要矛盾的发展，不能区别矛盾之主要与次要、规定的矛盾与被规定的矛盾，便不能探出过程之最本质的东西出来（举例）。但矛盾之中，不论主要与次要的，对立的两方面，不但是对立与斗争，而且互相依赖其对方，以行其对立与斗争。两方斗争的结果，发生相互渗透的变化，即转化为同一性，转化到相反的方面，这即是两对立方面之不可分的联结。然而，如果平均地去看任何矛盾之两方面，那就是大错的。两方中必有一方是主要方面，他一方是次要方面，前一方面即所谓矛盾之起主导作用的方面。本书已举了价值与使用价值，价值为主导方面；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力〕为主导方面；理论与实践，实践为主导方面；苏联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为主导方面等四个例子，都证明主导方面对于他方有决定的作用。不是单纯的互相结合，如普列哈诺夫的错误说法；也不是互相决定即交互作用，如卢波尔的说法；而是一方起着主导的与决定的作用。究竟哪一方是主导的呢？这要看过程发展之情况，在一定条件之下来规定，资本主义社会在长时期中，资产阶级是主导方面，但到革命前夜时期及革命以后，无产阶级就转变为主导方面了。在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是主导方面，封建势力是次要方面。然在革命前的俄国与现在的日本，封建势力还是主导方面，资本主义不过占次要地位。在中国社会，主导势力属于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他们的作用决定一切。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决定了各种

的变动。然在一九二五年至二七年大革命猛烈发展中，南方革命势力与北洋军阀对抗中，南方势力由次要地位转变到了主导地位，北洋势力作了相反的转变。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言，资产阶级因握有经济命脉，至今还居于主导地位；然在革命领导上面说来，由于无产阶级之觉悟程度与彻底性，而资产阶级则是动摇的，无产阶级却居于主导地位。这一特点，影响到中国革命之前途。无产阶级要在政治上、物质上都居于主导地位，只有联合农民与小资产阶级，如果工农小资产阶级多数觉悟与组织起来的话，那末，革命之决定的主导的作用，就属于无产阶级了。在中日对抗的局面中，中国的因素正在由次要地位向主要地位转变中，因为民族统一战线如果广大的与坚固的建立起来，加上国际的因素（苏联、日本民众、其他和平国家），就有造成优于日本方面之势。在农民与无产阶级之矛盾中，无产阶级是主导。在产业工人与手工工人的矛盾中，产业工人是主导。在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的矛盾中，熟练工人是主导。在城市与乡村的矛盾中，城市是主导。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中〕，经济基础是主导。在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矛盾中，感性是主导。在主力红军与游击队的矛盾中，主力红军是主导。在进攻战术与防御战术的矛盾中，进攻是主导。在战略与战术的矛盾中，战略是主导。运动战与阵地战的矛盾中，运动战〔是〕主导。各兵种中，步兵是主导。劳心劳力的矛盾中，劳力是主导。凭谁决定？凭过程发展至一定阶段中，斗争双方的力量如何而定。主导与非主导是互相转变的。

八 自始至终的过程的矛盾的运动

.....

研究的原则
如此

伊里奇接着说：“这正是辩证法的一般的叙述方法或研究方法。”^[1]（《伊里奇文集》第十二卷）发现过程之最单纯的最根本的关系；在那种关系之中，暴露主要矛盾；探求主要矛盾的发展、斗争及以主要矛盾为基础而出现的全体矛盾、充满了矛盾的方面、发展的倾向——过程之自始至终的发展；探求发展中的过程各阶段的质的变化，充满了矛盾的各方面的运动之相对的特殊性；充满了矛盾的各方面之相互联结及相互推移——这是必须的^[2]研究任何过程的路程。[第293～299页]

九 对立的统一、同一性是相对的， 对立的斗争是绝对的

.....

同中国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是相对的，中国同某些和平国家之和平外交也是相对的，苏联同

永久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随时随地，一种形态转变为他种形态；一切过程，都有始与终。一切过程，转化为其自身的对立物。任何过程的常住性，是相对的。但是，一种过程转变为他种过程是绝对的，对立的斗争是绝对的。伊里奇说了这斗争的绝对性及统一的相对性，并且作

[1] 参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13页）

[2] 这是毛泽东对原文的修改。

各国之共居及同盟条约也是相对的，党内的一致亦然，一切过程之一致皆然。

思想斗争所以是经常的方法。

两例甚好。

对立的同一性、合致、统一、常住性，被包含于对立的斗争中，不过是对立的斗争的一动因。静止被包含于运动之中，为运动之一动因。认识同一性、常住性、静止性是辨别斗争或运动的条件，

出极明确的定式。他说：“对立的统一（合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互相排除的对立之斗争，是绝对的，发展、运动是绝对的。”（关于辩证法的问题）^[1]

在布尔乔亚民主主义革命之中，普罗列达里亚与那包含农村布尔乔亚在内的全体农民，一起反对农奴的关系。这种普罗列达里亚和农村布尔乔亚之活动的合致以及两者之利害的同一性，带有相对的、一时的、有条件的性质。两者之间的斗争是绝对的，把同一性作为其动因而包含着。在法国大革命时，未发达的普罗列达里亚和布尔乔亚的利害，彼此合致，形成了统一、同一性。但是，这种统一，带有相对的、一时的、有条件的性质；这种性质，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久就出现于表面，暴露了普罗列达里亚及布尔乔亚间的阶级斗争之绝对性及不联合性。两者的这种

不统一，不合致^[2]

同一性，不过是包含于两者之绝对的斗争中的一个动因。

[1] 参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原译《关于辩证法的问题》，又译《论辩证法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12页）

[2] 这是毛泽东在行间的批语。

是必要的；然而，他是暂时的、相对的，并且即是斗争、运动之一动因。

一切过程矛盾的运动，同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这是任何过程如此。但因矛盾性质每个过程不同，内部构造每[个]过程不同，这种绝对性、统一性的表现方法因而各异，这是要明白的。

承认矛盾引起运动是对的，但是不够的，还须明了矛盾在何种状态引起运动。矛盾在统一状态虽然是运

客观的现实之一切过程，也和这相同，只是在各个过程上，对立的斗争之绝对性与统一，各以其独特的方法显现，由过程的质及其内的构造所规定。

马=伊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不同之点，在于理解对立的斗争的绝对性，及其统一的相对性。社会民主党的任何一个理论家，考茨基也好，普列哈诺夫也好，虽然他们反对伯伦斯泰因对于马克思的辩证法的修正，承认矛盾引起运动，可是他们毕竟没有认知统一物的分裂引起运动，没有认知对立的斗争的绝对性及其统一的相

动，但那是运动之特殊状态，相绝〈对〉状态，普通叫做静止、对性。考茨基所以只在形式上承认辩证法，而不曾理解辩证法，那是什么意味呢？那是因为：考茨基仅仅^[1]主张矛盾引起运动，是革命的形而上学；事实上，他拒绝了辩证法。

常住、不动、死、止、停顿、僵局、相持、和平、和气，这是相对的、暂时的、有条件的。必须承认运动之一般状态，即统一物的分裂，斗争、冲突、动、无常、生、行、活跃、战争、相争，这是绝对的。同一、统一、静、死、和平等相对的矛盾状态，包含于绝对的矛盾状态之中。不明此理，就是形而上学、

[1] 这是毛泽东对原文的修改。

机械论，事实上
拒绝了辩证法。

和解、妥协、调和是可以有的，〔在〕过程发展〔的〕一定状态必是〈是必〉要的。停战、媾和、终止罢一〈工〉、临时的统一战线、某些合作，是阶级斗争中有过的，会有的，但不是总战术。不能和解与妥协，最后还须用革命解决矛盾，则是总战术。

列宁党也有过和资产阶级合作的时期，提出分进合击的口

现代社会法西斯特^[1]们的政治上的总战术，都以对立的和解为基础。他们弃去马克思所说阶级斗争不能和解的命题，而宣传普罗列达里亚和布尔乔亚之利害的调和，两个阶级的妥协，援助资本家的产业合理化，援助民族布尔乔亚之夺取市场的斗争，诱引普罗列达里亚去参加布尔乔亚的国家。

多数派理解对立的斗争之绝对性，及其统一同一性的相对性；少数派却高唱统一之永久化的理论；这两种不同的主张，是两者在阶级斗争上种种不同的战略战术之理论的基础。

多数派对于自由主义布尔乔亚的战术，在赞姆斯特瓦选举战时代的“分开前进，共同攻击！”的口号中，表现了出来。在一定阶段上的、与一定形态中的自由主义布尔乔亚的这种共

[1] 法西斯特，法西斯分子，法西斯主义者。

号。中国党同国民党合作，原则上也是分进合击，不过表现的方法不同。分进是阶级与党的政治独立性，合击是统一战线。

同动作，乃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战术之相对的、一时的、有条件的动因。少数派对于这种相对的动因，附与绝对的意义，以之为自己的全部战术的基础；其结果，少数派转入了布尔乔亚的奴仆的任务。一九一七年，以普列哈诺夫为首领的少数

在另一定阶段派，支持了取得胜利的布尔乔亚，宣传利害的调和，上与另一定形态中的资产阶级共同动作 陈独高唱继续帝国主义的战争，对于妨阻资本主义强秀主义高唱不要违背国民革命对于妨阻国民党强化的一切，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却倾注全化的一切 特别对于土地斗争

力加以反对。十月革命以后，他们直接支持白党

现在他们直接支持了。苏联中资本主义要素的驱逐，使得少数派和日本侵略^[1]

妨害革命的布尔乔亚政党缔结同盟；贯通全线的广泛的社会主义的进攻，使得少数派去援助那准备干涉苏联的国际布尔乔亚。

这两句是说的陈独秀主义

在主张对立的统一之时，而不理解斗争的绝对性，必然不可避免的引到对立物的和解。对立物的和解论，是右翼派的立场之特征。右翼派，抛弃马克思=伊里奇所说阶级斗争是不和解的那

[1] 以此种形式排印的是毛泽东写在行间的批语，下同。

是把无产阶级和富农不能相容的利害考虑过了的同盟，即在中国民主革命中亦然，何况十月后的苏联。

所谓以一定过程之发展为基础，即是过程由一种状态转变到他种状态，即是矛盾的发展，即所谓飞跃、突

命题，而建立所谓组织化的资本主义的理论、主张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矛盾可被取去而移至外部的斗争场中——世界市场之中。在苏联中，他们建立了所谓豪农向着社会主义和平的成长之理论。他们以阶级斗争之自然的消灭，和平的死灭之理论，去代替伊里奇所说阶级只有依著激烈的社会革命才能消灭的理论。右翼派忘记农民层内部的矛盾，在他们看来，农民是涂上了灰色的集合体。他们不曾注意：我们和农民的同盟，是把普罗列达里亚和布尔乔亚不能相容的利害考虑过了的同盟，因而是和农民之资本主义要素相斗争的同盟。“没有辩证法的理论家，烦琐哲学的理

辩证法的本质是矛盾斗争的问题，烦琐哲学论家布哈林”，不理解对立的斗争是绝对的、对即形而上学 陈独秀同样不理解。

立的统一是相对的学说。

对立的和解论，是形而上学的理论。因为这
对

种理论，没有发现从一种状态到他种状态的出路。辩证法的本质却在此对立的和解论，没有注意新事物的发生，没有注意新现象、新过程的前提、可能性、条件及其发生，乃是以一定过程的发展为基础而作出的。这种理论不注意一定过程之矛盾的发展，不考察一定状态怎样转变为其他状态。……

变。以此为基础，乃作出新过程的前提、可能性、条件及其发生。

对立的和解之见地，变成了德波林一派对于马克思的辩证法所加入的少数派的=观念论的修正之基础。……在他们的任何著作中，对于对立的和解论从没有加过批判。反之毋宁说他们简直对

对立的统一性不是本质，对立的斗争〔是〕。

是从这样理论出发。德波林不在对立的斗争中而在对立的同一性中，去发现辩证法的本质；……德波林的特征，在于不理解伊里奇的思想——伊里奇所说对立的同一性不过是充满了矛盾的对立的统一中之一动因。[第 303 ~ 308 页]

一〇 均衡论

以为对立的均衡是绝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相对的，而所谓对立是外的对立，体系与体〔系〕间的对立；

……在布哈林看来，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翻译为现代力学的言词，是必要的。布哈林忠实于自己所提起的问题，认为黑格尔和马克思所说的矛盾引起运动，实际是两个反拨的力之冲突，外部之力互相冲突，暂时形成可动的均衡，这均衡以后被扰乱，再在新的基础上恢复均衡。……布哈林这样写着：一切事物是某种总体的东西，由互

体系内部由互相联结的一群要素所组成，体系中各要素之间也有矛盾，但是次要矛盾；主要矛盾是外的矛盾，起着对于内部矛盾的决定作用。

布哈林学习斯宾塞^[1]、谢林格^[2]、波格达洛夫。

相联结的一群要素所组成，即成为某种体系。一切这样的“体系”，和那构成其本身的环境的其他体系，互相结合。环境和体系互相矛盾。这种体系和环境的矛盾，在布哈林说来，是一切发展的基础。

布哈林所乱说是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均衡论，并不是新的东西。这种均衡论，在布尔乔亚的社会学及经济学上，广泛的一般的被应用着。布尔乔亚的哲学者及社会学者的斯宾塞，在这种均衡论之上，构筑了他的机械论的进化论。……在斯宾塞之前，已直接反对黑格尔及马克思之辩证法的谢林格，这样说过——

“在反对的方向中互相抗争的力之对立，也是自然及其发现体的一切作用的根本形式”。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严格的批判了这种见解。把均衡作成了极完全的定式之人，是波格达诺夫。波格达诺夫在布哈林以前，就把辩证法翻译为“力学的言词”了。……波格达诺夫把

[1] 斯宾塞（1820—1903），英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宣扬不可知论和庸俗进化论。主要著作有《社会静力学》《第一原理》等。

[2] 谢林格（1775—1854），现译谢林。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

运动从没有任何矛盾的均衡发生。

问题：为什么中国与日本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

除此以外不可能吗？恰好可能是另外一面。不是扯高补低，而是克服落后，把低、落后提到先进的水平。不是先进向落后看齐，而是落后赶上前进。履与足矛盾时，削足适

辩证法定义为：“由对立的力之斗争而显现的组织过程。”在他看来，运动从没有任何矛盾的均衡发生，其后，这个均衡为两个对立的力之斗争所搅乱，然后再在新的基础之上恢复。波格达诺夫所认为根本的东西，规定的东西，是制约内的矛盾之外物。他以为，主要矛盾是环境和体系间的矛盾。这样，我们看出布哈林之大智的源泉，就是布尔乔亚的社会学，和他受过强烈影响的观念论者、折衷主义者波格达诺夫的哲学。

均衡论在一切有害的团体中受非常的欢迎，它成为他们的理论的见解之方法论的基础。……

即一般思想原理。（经济评论，一九二七年第六号，第二一页）〔第310—320页〕

“在由相互间必要不可缺少的一联环子所组成的全部体系中，具有决定的意义的，是最弱的环。例如，铁对于社会经济中的一切部门都是必要的，如果铁的生产低降至标准以下，那末，只好停止一切部门，专事采掘铁量到够用的程度，除此以外是不可能的。”（波格达诺夫《一般组织学》二七四页）

均衡论的一切党徒，一切机械论者，都宣传补救弱点，孔特拉捷夫仿效布哈林的经济学家的摘

履，正是布哈林的思想。这是可能的吗？不可能的。补救弱点是可能的吗？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所谓补苴罅漏^[2]的办法，结局将使大局溃败。这不是扩大矛盾去解决矛盾，从根本上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堵住矛盾发展，取得内部的安定，以求得所谓平衡，结果是无济于事的，这是破落户救穷的办法。从构成外部平衡来求得内

要^[1]，重复着相同的口号，他在财政人民委员会的廓清会中说：

“如果没有砖，房子就不能建筑，在这一点上，我和布哈林同意，是的，应当补救弱点。在我看来，除此以外，再没有方法。”

从均衡论从补救弱点的思想，生出一切右翼机会主义的问题。例如说，在建筑材料的生产比较其他生产部门落后时，不去克服这种落后的状态，却以为应当减低资本的建设。

[1] 《经济学家的摘要》，布哈林著，原载苏联《真理报》1928年9月30日。现译为：《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为迎接新的经济年度而作》（《布哈林文选》中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0～299页）。

[2] 参见韩愈《进学解》。原文有“补苴罅漏，张皇幽眇”之句。

部平衡，这是布哈林的根本方法。

依靠斗争，依靠社会主义农业与基于分散性而自由〔倾〕向资本主义的农业之间的斗争，来克服农业分散性（这个同社会主义经济不相容，而有利于资本主义根苗的生长）

〔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

很清楚

过程外的矛盾与过程之内的矛盾，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但不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他须通过过程之内的规律性才影响于

苏维埃经济的发展中最弱的环，是小商品农业的分散性，均衡论的党徒们，认为这个矛盾的克服，不是由于把农业的发展引上大产业的水准一事——这要靠把农业转移为社会主义的形态才有可能——所能做到；反之，他们以为要由于缩小产业的发展速度才能做到。均衡论的党徒们，以为上述矛盾的解决，其可能性在于保持这两个对立的方面，即社会主义的大产业和小商品农业，在于利用这两个方面之机械的相互关系去补救弱的方面，而在两者之间设置均衡。[第315～316页]

马克思及伊里奇的辩证法并不否定外的矛盾的作用、即某种过程对于其他过程的作用，反之，毋宁说是从现实的一切过程之不可分的联结那种观念出发，而要求认识过程之相互的作用、过程之相互的影响及其相互的渗透。马克思及伊里奇的辩证法，其主要的注意在于暴露内的矛盾，确定对立的同一性，认识过程之自己运动的源泉。外的矛盾，只有通过过程之发展的内的规

过程之发展。他不是主要与决定的东西，主要与决定的矛盾是在过程之内部。

例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即社会内部的矛盾，给予决定的影响于社会与自然的矛盾，即所谓人定胜天。从有劳动工具之产生以来，就是如此的。此处举例是进步社会之事。

“物必先腐也，然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然后谗之。”^[1]

律性，才影响于过程的发展，马克思和伊里奇的辩证法，不否认社会和自然的矛盾，但不承认外的矛盾是主要的东西，决定的东西。在历史的研究中，我们看到许多国家的地理条件、气候条件、地形、动植物、天然富源，在长期间内没有变化，而社会关系却变化了，即封建制度变为资本主义了。

在社会构成的发展中，譬如说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辩证法所看作主要的东西、决定的东西的，是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社会和自然的矛盾，不消说也作用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但不是直接起作用，而是通过资本主义之主要矛盾的发展才起作用，地理环境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时，社会依其内的规律性，发展社会的生产力，变化地理环境。

……国际资本企图实行要粉碎苏联之绝望的尝试。这个尝试成功吗？或终于不成功吗？——其程度，完全系于苏联的强度如何。国际资本依其内的矛盾而发展。这些矛盾怎样急剧的激化起

[1] 参见苏轼《范增论》。原文是：“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

“非战之罪，乃天亡我”^[1]的说法是错误的。五次〔反〕围剿失败，敌人的强大是原因，但战之罪，干部政策之罪，外交政策之策〈罪〉，军事冒险之罪，是主要原因。机会主义，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帝国主义吸引与国民罪〈党〉变，对于革命说当然是原因。外的力量，须通过内的规〔律〕性（机会主义

这是主要的

来，在某种程度上，也依存于苏联。苏联社会主义的成长，使得资本主义体系之内部的矛盾激化起来，因而促进普罗列达里亚的世界革命。理由是：苏联社会主义的成功，对于社会主义之终极的胜利，具有绝大意义。

这样，我们看到外的矛盾，只有通过过程之内的规律性的发展，才在过程的发展之上，曲折的发生影响。我们只有具体的分析两个互相作用的过程，才能把其影响的性质、程度及力量，暴露出来。

具体分析两个过程，才能把互相作用的性质、程度、力量发现出来，各过程的情况是互不相同的。^[2]

[1] 参见《史记·项羽本纪》。原文有“天亡我，非战之罪也”的话。

[2] 这是毛泽东对上面一段话的批语。

等）才能曲折的即间接的发生影响。流水不腐，非流水腐；户枢不蠹，非户枢蠹^[1]。物之本身情况如何，是第一原因。国民党能够破苏区与红军，但必须苏区与红军存在有不能克〔服〕的弱点。若能克服弱点，自己巩固，则谁也不能破坏。红军至今没有被破坏，就因为此。中央苏区、鄂豫（豫）皖苏区被破坏，主要的〔是〕内的原因。西路军亦然。“内省不

[1] 参见《吕氏春秋·尽数》。原文是：“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后来唐朝马总撰的《意林》等都引“不蠹”作“不蠹”。

疚，失何忧何惧”。^[1]九一八之不能抵御，原于一九二七〔年〕之失败。今日国难之是否得救，决定于统一战线能不能发展与巩固，不决定于日本。国民党之不能照旧不变的存在，原于其政策与组成之弱点。资本主义之必然灭亡，原于其内在的矛盾。阶级与政党之兴亡，原于其自身之条件。人之健病、生死，原于其自身条件。机械力推动物体运动，通过

[1] 参见《论语·颜渊》。原文是：“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物体自身的可动性。任何事物、任何过程，外力是有影响的，且是严重的影响，然必通过内的情况才起作用。决定的东西属于内力。

试举具体处理之例

均衡论，忽视了暴露过程之具体的内容及“自己运动的源泉”之必要，因此，在一方面，对于哲学问题抽象的唯理论那样去处理，从所非具体的谓“一般”的见地去处理，因而到达于空洞的非特殊的无个性的图式主义；在他方面，到达于忽视根本的东西及形式主义 近视病与琐屑病具体的东西之经验论。这种二重性，也就是右翼派的特征。他们对苏维埃经济的问题，一方面，抽象的去处理；不分析其发展之具体的条件、局面及阶段；无力暴露那新转化向着新局面出现的条件及可能性是怎样造成的；不注意新的发展阶段从新提出^[1]问题，从新解决其矛盾。他方面，这是唯理论

们从补救弱点的均衡设置论出发，因而到达于拜金主义。例如，他们的困难打开策——在社会主义的大产业及小商品农业之间从速设置均衡——，当一九二八年——一九二九年时，这只有基于个人农业的成长才是可能的。由此，生出了

[1] 毛泽东在此处删掉了一个“了”字。

使提供大部分谷物商品的个人经济（主要的是豪农经济）发展的政策，而回避了那打开困难的根援助富农发展的政策

当时的阶段
已经存在了这种
转变的条件，造
出了可能性。

世上无此过
程，只是机械论
者的幻想——资
产阶级的幻想，
一面自慰，一面
迷惑劳动群众。

一针见血
之言

德波林也不
承认自始至终的
矛盾运动。

均衡论，不承认过程的发展是始终都依存于在发展中的矛盾而进行。从这种理论的见地说来，所谓均衡乃是过程中没有矛盾的瞬间之东西，因而过程的运动，在矛盾发现的瞬间以前，只有由于外的原因才有可能。

德波林一派对于均衡论加以时代落后的批判，不能给与这种理论以决定的打击。德波林派的那种批判是极一般的，极抽象的，他们不能抓住均衡论的最主要点——均衡论不承认过程是自始至终依着矛盾，依着统一物之分裂而发展，即均衡论使对立和解之点——，去加以批判。这是因为他们本身对于对立之统一的法则的理解，是与均衡论合体的。他们也和均衡论同样，认为矛盾不是从过程发生的瞬间就在过程中固有的，而是在过程发展为某阶段上才出现的——这样，他们作出了他们自己所恐怖的结论，即所谓过程在

矛盾发生的瞬间以前，由于外的原因而发展的结论。而且，和均衡论的党徒们同样，他们也支持着社会民主主义的对立和解的理论。极端和极端，是相通的。

左的与右的相通，因为都离开过程之正确的了解，到达于不顾过程内容，不分析具体的阶段、条件、可能性等抽象的一般的空洞见解。因此，他们两极端就会于一点。

—— 否定之否定的法则

从上面所述看来，当作通过质与量的发展而进行的、基于对立的运动之飞跃的转变的过程看的辩证法的过程，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们已经知道了。但是，现实以及我们认识的发展之辩证法的过程，不止是量到质及质到量的转变的法则和对立之统一的法则。与以上两个辩证法的根本法则相并行，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建立了辩证法的第三个根本法则——否定之否定的法则——的基础。

.....

多数劳动者私有——少数资本家私有——社会公有的私有

“私有，和社会的集团的所有不同，只存立于劳动手段及外的劳动条件属于各个人的场合。劳动者私有生产手段，是小生产的基础；小生产成为社会的生产及劳动者自由的个性之发展的必

否定之否定
的范例

恩格斯之言
三段法是
对的

这样说是不
对的。甚么也乱
嵌进去，这是外
的连〈联〉结，
表面现象，图式
主义，不是内的
联结与本质发展
的东西。否定之
否定律是论内的
联结的理论。

赫格尔也犯
了图式主义。

横的联结与
纵的连〈联〉
结。横的联结是

要条件……

.....

.....恩格斯说：否定之否定，“实际上是极单纯的随时随地进行着的程序。这个程序，只要把旧观念论哲学掩蔽着它的秘密的破衣取去，就是三岁的儿童也能理解”^[1]。.....形而上学者们把否定之否定的法则，当作图式的“三段法”描写出来，而说马克思主义者们无理的把具体的现实之发展嵌入三段法之中。但是，这里不能不声明一句，黑格尔自身，特别在所著《法律哲学》^[2]之中给与了一个根据：即不把“三段法”的性质解释为否定之否定的法则的一个方面，而是可以把它解释为发展法则本身。例如，黑格尔把犯罪当作法律的否定去观察，把刑罚当作犯罪的否定即否定之否定去观察。在这里，实际上，三段法成为把现实的现象嵌入于其中的外的图式。.....

马克思及恩格斯在说明否定之否定的法则时所力说了的，不是这个法则之“三段法的性质”，而只是互相发展并且互相推移的现象之内

[1] 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5页）

[2] 现译名《法哲学原理》。

矛盾的两方面在发展中相互依赖与相互斗争的关系。纵的联结是过程经过飞跃向前发展的关系。两者都是内的联结。

第二个否定的结果，再归于最初的东西，然而性质与数量变了。谷物等〔种〕类因变化缓慢，不容易〔易〕看见质变，但看〔见〕质变的事物或过程是极多的。举例。

不是单纯的纯量的循环，每次都有质的变化。

在的联结。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倾向之分析，上面已经引用过了；在那引用文中，否定之否定的法则的这种本质，被力说着。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引用麦粒为例。落在地中的麦粒，置于适当的条件之下，发出芽来。“麦粒被消灭，被否定，而从麦粒生出来的植物，出现为麦粒的否定。究竟，这种植物之正常的生涯是怎样的呢？它成长，开花，结实，最后再生出麦粒。而且麦粒成熟时，麦茎枯死，轮流的被否定。当作否定之否定的结果，我们再获得最初的麦粒，然而这不是一个麦粒，而是十倍，二十倍或三十倍的麦粒”。

恩格斯并且事先指出，这里的问题不单只是发展之量的方面。“谷物的种类仅是极缓慢的变化。所以，今日的大麦和一百年前的大麦，几乎完全一样。但是，试考察粘质的观赏植物；例如牡丹或兰花罢。如果我们把种子及由种子生出的植物加以人工，这否定之否定的结果，我们不但得到更多量的种子，又得到生出更美丽的花的、质的方面被改良了的种子；并且，这种过程的每

次的反复，每次的新的否定之否定，这个改良是被促进了”^[1]。[第324~327页]

问题是明显的，否定之否定律是论由同一规律性所发生的现象之内的联结。其行程只有两个否定，多数否定说法，如蚕蛹蛾、茎花果、少壮老，等等，是不对的。因为都是同一规律性所发生的现象，虽通过种种变异阶段，依然只是完成一个种属的持续过〔程〕，依

民粹派的密海洛夫斯基^[2]，以自己的方式去解释恩格斯的麦粒之例。他说：茎否定粒，花否定茎，果实否定花。这样，三段法在哪里呢？在这里，不只两个否定，而有三个否定。恩格斯恰好像预知这样的“反驳”一样，他在《反杜林论》中写道：“和麦粒的场合同样，这种过程在许多昆虫的场合，譬如蝶的场合，也显现着。蝶由于卵的否定，由卵生出，通过到性的成熟为止的种种变异阶段，交尾，于是再被否定。即，雌蝶完成种属的持续过程而在生下多数的卵时就死灭。

在其他植物及动物的场合中，这种经过不是那样简单的被解决。在其死灭之前，不只一次而是多次的产生种子、卵或幼儿，这种事实在这里与我们没有关系。在这里，只是证明否定之否定的法则现实的显现于有机界的两个领域中，就够了”^[3]。

[1] 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5~176页）

[2] 密海洛夫斯基（1842~1904），现译米海洛夫斯基。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思想家，在哲学上倾向实证主义、康德主义和马赫主义的观点。主要著作有《什么是进步？》《社会科学中的类比方法》等。

[3] 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6页）

然处在同一的规律性中。密海洛夫斯基的错误：不看发展的全生涯，只看量之变异。而重要恰好不在量，而在发展之质的生涯。必须当作新生命的出发点，即新规律性之出发点之一定过程的否定，才是否定之否定律的真义或本质，否则只是空虚概念的游戏。普列哈诺夫在这里是正确的。过程中的阶段有表现为否定之否定的，社会现象中此例甚多。但不是一切

这样，重要的事情不是否定之量，而是发展的全生涯，把其自身的否定当作向新的规律性之转变——否定之否定——，在其自身之中包含着。过程之发展中的现象及阶段，并不是一切都表现为否定之否定。

“花是植物的一机关。并且，当作这样东西看的花之不否定植物，恰如密海洛夫斯基的头之不否定密海洛夫斯基本人一样。但是，果实，正确的说来，受胎了的卵，实际上当作新生命的发育之出发点看，是一定的有机体之否定。恩格斯从那由受胎了的卵生出的植物之发展的开始，到植物把受胎了的卵再现为止，观察植物的生涯”。^[1]（普列哈诺夫《史的一元论》）这样，普列哈诺夫把那企图反驳否定之否定的密海洛夫斯基的尝试，加以还击了。密海洛夫斯基不但把三段法偷换为多数的否定，并且把否定变为现象之外的交替。因此，密海洛夫斯基终于不理解辩证法的否定之本质和否定之否定的本质。这否定之否定，正存于通过过程之矛盾的发展而发生新的规律性的问题中。[第327~329页]

[1] 参见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原译《史的一元论》）。（《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646页）

都表现为否定之否定，例如动植物之生涯。

形式论理学^[1]的错误在于把否定看作过程与过程间的外的否定，再则看作绝对的否定，这是完全不理解现实的看法。辩证唯物论即科学的考察与此相反，物质的现实是自己运动的，并且这自己运动是互相联结的。任何过程都是由于矛盾的斗争而自己向前运动，经过突变转化到相反的方向去。任何过程都由正命

在形式论理学，所谓否定是绝对的否定。形式论理学把否定看作完全的取消。例如，动物界中某种动物为他种动物所灭亡，这是否定。形而上学的论理学，没有看见过程之内部的矛盾的发展，过程之自己的否定；认为否定性不是发展着的矛盾之内部的起动的动因，而是外的动力。机械论者恰好把这样对于否定之外的理解，作成其方法论的基础。所以，考茨基在所著《唯物史观》之中，攻击基于物质的自己运动之辩证法的否定。他说，在物质之中，没有任何的自己运动。这完全是从那说精神的自己运动的黑格尔那里借来的神秘主义，自己运动，什么也没有说明。反之，运动的源泉，乃是两个外力的相互作用，在这种相互作用之下，一力否定他力。环境否定有机体——这是反命题。有机体征服环境的抵抗——这是合命题。在这里，否定，否定之否定，是完全相互作用的外的东西。考茨基对于辩证法的否定观——正命题之中已经包含矛盾或反命题，反命题之中包含正命题——，加以批判。考茨基简直不理解，对立的统一正是过程的发展

[1] 形式论理学，旧的译法，即形式逻辑学。

任以懷疑的固執爲否定之否定，而認爲破壞一切、一刀兩斷、不允許任何對抗之存在，而凡一切行持本末之間，
包含着後進的、
東西、後退的、落后的、
包含着保守的、
沒有進步的、
就沒有肯定之否定也。」

所謂否定，不能不是過程之發展中的聯結之一動因。單純商品經濟變爲資本主義經濟時，前者不是被後者絕對的否定了。資本主義經濟是從商品經濟成長的。在商品經濟之中，其內的矛盾、私有的發展已被包含着。生產手段之私有的發展，生產手段及資本之集中於特定階級的手中，是小商品生產者的發展之否定之動因。但是，這否定的動因，又是小商品生產者的發展之起動的動因。沒有否定的運動，也就沒有肯定的運動。沒有否定，也就沒有肯定。辯證唯物論即科學的考察，要求去指明差別，聯結及轉變。如果不這樣做，只有單純的肯定的主張，是不完全的，無生命的，死板的。」（伊里奇）

對於資本主義制度的分析，首先要求暴露牠的主要矛盾，探究那成爲資本主義制度的自己運動之源泉的「否定性」。資本家的私有之對立物，是普羅列達里亞之

题，对正命题之否定的反命题，及对反命题之否定之否定的合命题，构成其发展之全生涯，正命题〔题〕之中已经包含矛盾或反命题在内，反命题之中也包含正命题在内，合命题之中又包含正命题反命题在内。所谓否定，如列宁所说：“不是完全的否定及胡乱的否定，也不是怀疑的否定及混惑的否定，而是保存联结的因素，肯定的因素，

之起动的源泉。他说：“运动，起于相反的要素之对立或冲突。”^[1]这样，考茨基所以攻击恩格斯所举麦粒的例，其中没有何等否定，单只是有机体的变化，其理由充分的明了了。

所以，和一切的机械论者同样，构成考茨基的特征的东西。就是在其否定之理解中有如此的动因一件事：（一）当作对于过程的发展之外的动因看的否定，（二）绝对的否定，当作破坏看的否定。

但是，辩证论者的特征，对于否定有与此不同的理解。伊里奇说：“把否定的要素当作最重要的要素包含着的辩证法中，其特征的东西，重要的东西，不是完全的否定及胡乱的否定，也不是怀疑的否定及混惑的否定；而是当作联结的动因看的否定，当作保有肯定的，即不伴有任何混惑、任何怀疑的发展的一个动因看的否定。”^[2]

[1] 参见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分册，第141页）

[2] 参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44页）

素，即不伴有任何混惑、任何怀疑的因素的否定。”否定不是破坏一切，一刀两断，不是绝对的否定，而是先行的东西中间包含有后来的东西，后来的东西中间包含有先行的东西。没有否定的运动，也就没有肯定的运动，一切过程都是如此。(举例)。

得之否定为失，得之出现以失为前提，得之中包含失。资本家之得包含劳动者之失，二者互相结合而运动。

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首先要求暴露它的主要矛盾，探究那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自己运动之源泉的“否定性”。资本家的私有之对立物，是普罗列达里亚之不保持任何生产手段的私有之事实。但是，这“否定性”和肯定物密切的结合着。这两个对立方面^[1]，彼此相互作为对方的前提。资本家的私有，包含其本身的“否定

[1] 这是毛泽东对原文的修改。

反面，失之否定
为得，失之出现
以得为前提，失
之中包含得。劳
动者之失包含
资本家之得，
二者互相结合
而运动。

至理名言

性”、对劳动者之私有的否定；又，反之，劳动
者之不保持任何生产手段的私有，以生产手段之
集中于资本家的手中为前提。

伊里奇说：“辩证法的动因，要求指摘否定
的东西及肯定的东西之‘统一’，即两者的联
结，发见否定的东西中之肯定的东西。由肯定到
否定，由否定到包含肯定的‘统一’——没有
它，辩证法就变成完全的否定、游戏或怀疑
论。”^[1]所谓否定，不能不是为表现过程之发展
中的联结之特定的否定。

“在辩证法中，否定不是单纯的说‘否’，或
宣布事物不复存在，或随便的把事物取消……在
这里，否定的方法，第一，由一定过程的一般性
来决定，第二，由那过程的特殊性来决定。所
以，我不能不使第二个否定是可能的^[2]或成为可
能的那样去建立第一个否定。但这事怎能做到
呢？这是依从于各个场合之特殊的性质。如果，

[1] 参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
社1974年版，第245页）

[2] 这是毛泽东对原文的修改。

完全否定，
乾坤或几乎
息。^[1]

否定是过程
更向上发展。

一刀两断，
斩尽杀绝，不是
辩证法的否定。

第一个否定
造成了第二个否
定之可能。

哥哥身上有
妹妹，妹妹身上
有哥哥

辩证法否定
是过程发展之动
因，这种否定有

我把麦粒磨碎了，或把昆虫踏死，我诚然完成了否定之第一个行为，但第二个行为却成为不可能。因此，对象的各范畴之中，具有着发展由否定造成的、特殊的、其自身所固有的否定的方式”。^[2]

在上面引用的恩格斯的麦粒之例中，植物不是麦粒之完全的否定，而是麦粒之更向上发展。麦粒之单纯的死灭，昆虫之被鸟所破坏，不表现这样的联结，不是辩证法的否定。反之，麦粒的死灭，在植物出生的场合，同时又在一定发展阶段上，被保存于再生产其他麦粒的植物之中。否定同时是肯定，“死灭”同时是保存。辩证法的否定是过程的发展中之一动因，一方面表现为“扬弃”，即表现为旧事物的克服，他方面，把旧事物当作附属的动因而保存着。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之私有制中，小私有当作独立的规律性被克服着，当作资本主义规律性之附属的、“被扬弃了的”形态，被保存着。

[1] 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1—182页）

[2] 参见《周易·易传，系辞卜》。原文是：“乾坤其易之维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

两方面的表现：

一方面表现为扬弃，即克服旧事物〈事物〉之主要的不适于保存的东西；一方面表现为肯定，即把旧事物中某些还暂时适于生存的东西给以合法的地位而保存起来。正规红军阶段，否定者是游击主义，保存者是作战的游击性、组织的轻快等。

过程之矛盾解决的结果，即一个一定的规律性腹内包含的另一个一定规律性二者间矛盾的解决。即旧规律性倒，新规律

否定不能不把现阶段和过程之发展中的从前阶段的联结表现出来，恰好与此同样，否定之否定不能不是过程的矛盾之解决的结果，即一定的规律性向他一规律性的转变。

性生。

有关系的、亲属性的、因果性的、先行后行、新阶段旧阶段的联结，即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不是不相干的两规律性人工的机械的衔接，不是三段法儿戏，而是向特定方向中的发展。这就是否定之否定的本质。

否定之否定表示过程发展的一个循环之终结，另一个循环开始。

在否定之否定中，也不能不说新阶段和从前阶段的联结、即发展的过程。恩格斯，对于那把否定之否定的法则归着于现象之外的交替的见解，曾经加以批判。那种见解，是把否定之否定的法则，归着于那构成辩证法的过程之“外部的表面的一方面”（伊里奇）的“三段法”，归着于“三段法”的儿戏——“交错的写上A字又涂灭A字，或关于蔷薇，交错的主张是蔷薇又主张不是蔷薇的儿戏”。

在植物的发展中，果实即种子的出生，是植物的否定即否定之否定。但是，种子是植物的发展所生出的，构成植物的一动因，并且是意味着植物发展的终结的动因。植物死灭，种子存留。发展的一个循环就终结。[第329~334页]

第五章 可能性及现实性、偶然性及必然性

三 可能性和现实性

.....

条件

新东西之生成的源泉，是根据的运动。可是，这并没有说，种种的条件在这种过程中不发生任何的作用。如前面所述，在发展的全部过程中，条件是具有一定的意义的。不论在新东西的生成之际，或在实在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之际，条件都具有意义，这是不待言的。……〔第450页〕

第六章 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

三 普列哈诺夫的形式论理学之批判

.....

?

在人的头发脱落的那种场合，不能说他是秃着，也不能说他是不秃着。在青年的面颊上生须的那种场合，不能说他是白面的青年，也不能说他是有须的男子。在这种场合，“对立物”实际上是一致的。〔第499页〕

四 形式论理学与实践

.....

理论上——辩证法，实践上——形式论理学，亚斯姆斯^[1]这样说。

如果从这种见地说来，伊里奇就变为反对辩证法的“全面性”而拥护形式论理学的规律性及论理性的人了！因为伊里奇，在其革命活动的全生涯中，对于党的各个的环的动摇与踌躇、观照的客观主义、少数派的小布尔乔亚的折衷主义“在这方面在那方面”等等，都斗争了的。〔第505页〕

1936, 11

1937, 4, 4^[2]

[1] 亚斯姆斯，苏联哲学家。193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主要著作有《辩证唯物主义和逻辑》(1924)等。

[2] 这是毛泽东批写在书末空页背面的字。

致彭德怀、任弼时电^[1]

(1936年12月1日)

张学良承认尽力使全线停战，但又谓无法长停，似蒋介石尚不愿取长期守势。我军似须一面整理，一面准备作战，再打一仗则大局定了。十二月确定在现地区^[2]以随时准备打胡姿势，加紧休息整理。一二月后绥远、西北、全国有起较大变化的可能。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张国焘致彭德怀、任弼时电的主要内容。

[2] 指定边、盐池、环县地区。



1936年，毛泽东、朱德在陕北保安。



《战友》(中国画)

给蒋介石的信

(1936年12月1日)

介石先生台鉴：

去年八月以来，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曾屡次向先生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自此主张发表后，全国各界不分党派，一致响应。而先生始终孤行己意，先则下令“围剿”，是以有去冬直罗镇之役^[1]。今春红军东渡黄河，欲赴冀察前线，先生则又阻之于汾河流域。吾人因不愿国防力量之无谓牺牲，率师西渡，别求抗日途径，一面发表宣言，促先生之觉悟。数月来绥东情势益危，吾人方谓先生将翻然变计，派遣大军实行抗战。孰意先生仅派出汤恩伯之八个团向绥赴援，聊资点缀，而集胡宗南、关麟征、毛炳文、王均、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孙震、万耀煌、杨虎臣、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高桂滋、高双成、李仙洲等二百六十个团，其势汹汹，大有非消灭抗日红军荡平抗日苏区不可之势。吾人虽命令红军停止向先生之部队进攻，步步退让，竟不能回先生积恨之心。吾人为自卫计，为保存抗日军队与抗日根据地计，不得已而有十一月二

[1] 1935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陕西富县直罗镇全歼东北军第一〇九师和第一〇六师1个团，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这次战役称直罗镇战役。

十一日定边山城堡之役^[1]。夫全国人民对日寇进攻何等愤恨，对绥远抗日将士之援助何等热烈，而先生则集全力于自相残杀之内战。然而西北各军官佐士兵之心理如何，吾人身在战阵知之甚悉，彼等之心与吾人之心并无二致，亟欲停止自杀之内战，早赴抗日之战场。即如先生之嫡系号称劲旅者，亦难逃山城堡之惨败。所以者何，非该军果不能战，特不愿中国人打中国人，宁愿缴枪于红军耳。人心与军心之向背如此，先生何不清夜扪心一思其故耶？今者绥远形势日趋恶化，前线之守土军队为数甚微，长城抗战^[2]与上海一二八之役^[3]前车可鉴。天下汹汹，为公一人。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言而决，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与先生之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即从自相残杀之内战战场，开赴抗日阵线，绥远之国防力量，骤增数十倍。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地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

[1] 山城堡之役，指1936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四方面军一部，在第二方面军配合下，在甘肃环县山城堡击败国民党军进攻的战役。这次战役全歼国民党军主力胡宗南部1个多旅，使国民党军从此基本停止了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进攻。

[2] 长城抗战，指1933年3月驻守在喜峰口、古北口一带长城线上的宋哲元部第二十九军等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役。

[3] 一二八之役，又称淞沪抗战，指1932年1月28日起，驻守上海的蔡廷锴、蒋光鼐部等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的战役。

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

毛泽东 朱德 张国焘 周恩来
王稼蔷 彭德怀 贺龙 任弼时
林彪 刘伯承 叶剑英 张云逸
徐向前 陈昌浩 徐海东 董振堂
罗炳辉 邵式平 郭洪涛
率中国人民红军二十八万人 同上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

毛澤東朱德等致蔣介石書

毛澤東朱德等致蔣介石書
去冬八月以來共產黨軍隊與紅軍曾屢次向先生要挾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自此
至發稿之日各軍不分黨派一致聲應而先生始終堅行已意先則下令閩浙是以石
大山為禦之役今在蘇軍東漢黃河豫粵冀察前線先生則又強之於汾河洛陽吾人時
欲安寧者不無其難殊幸幸西漢別宋故日寇犯一廣靈矣當此復先生之寧我欲
敵未嘗易克吾人方謂先生得勃然變計派置大軍實行抗戰孰知先生僅派出湯恩伯
六八兩團而姑耽誤猶若南歸矣毛炳文均稱毛炳文即舊冀察城
寧馬被擒焉虎威既為燭焉步芳高桂滋為變成李先升等二百六十個團兵勢以
馳耳昔消滅抗日红军毫無平机日蘇匪不可之勢吾人雖令紅軍停止向先生之部屬往
返步退張竟不能先生續根之忠事為自衛計為保存抗日軍隊與抗日根據地計不
得已苟有十一月二十日定邊山城壁之役使全國人民對日寇進攻何等憤慨對坡走
杭日得失之種如何等熱烈而先生則集空力於自殺殘殺之內戰然而西北各軍宜知其
之種如何吾人身在戰陣熟之甚悉彼等之心與吾人之心并無二致要挾停止自殺也
與軍平上就自之戰時即始先生之燭系疏遠勤務者亦離此山城甚之參政所以名將也
該軍莫不能戰特不顧中國人打中國人客觀據於紅軍軍人心與軍心之向背如此有
生何不消滅我心一忠其故耶余者縱使形勢日趨惡化前線之守土軍隊為數甚微長城
可保我可復先生亦得為光榮之抵日英炮圍諸炮轟轟百此先生果何如而不以此
時吾人敢以至誠再一次的請求先生當機立斷允許吾人之抗國要求化敵為友共同抗
日則不惟吾人之幸實全我國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今司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擇一徘徊以
迄將為為之毀身而之敗火通國之人心遭千秋之辱吾人誠不願見天下後世之人焚
首橫目亡中國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願天下後世之人視先生為敵及時改過救國救民
之素志請勿諱敗火同仇不脅力立地成佛何去何從賴先生熟聽之茲不勝立言
上心急在再降時仰盼明教

毛澤東 朱德 張國焘 周恩來 王稼薈
彭德懷 駱賀龍 任弼時 林彪 劉伯承
董振堂 楊尚昆 雷鳴道 鄭昌浩 徐海東
邵式平 龍云平 龍云平 中華人民紅軍二十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

1936年12月1日，毛泽东、朱德等致函蒋介石，再次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扩大救亡阵线，加强抗日力量*

(1936年12月1日)

中国国民党南京政府全国各报馆各团体各党派各界各武装队伍及全国人民均鉴：

日伪匪军进攻晋绥的前哨战已经开始，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即将爆发。当此中华民族生死关头，非动员全国兵力人力财力以抗战，则战胜日寇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要求南京政府立刻实行下列处置：

(一) 调集大军增援晋绥前线，动员全中国海陆空军准备全国性的抗战。

(二) 停止进攻红军，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三) 开放人民抗日救亡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立即释放政治犯及上海各爱国领袖。

(四) 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或国防会议，商讨救国大计。

我们再一次的要求南京政府，立即放弃对日妥协政策，停止中日谈判，实行上述迫切要求。若再因循延误，坐视傅作义将军等局部抗战而不救，而仍旧专心致力于压迫人民抗日救亡运动与进攻抗日红军，则其结果不但将给民族国家以不能补救的损失，而南京当局亦将自绝于国人。

为了实现全民族的抗战，我们更号召全中国人民不分党派、不

分阶级、不分职业、更亲密的联合起来，督促南京政府实现我们的主张，克服一切困难，自动的组织各种救国团体与武装力量，如救国会、后援会、义勇军、宣传队、救护队、慰劳队、募捐队等，努力扩大救亡阵线，加强抗日力量，援助现在绥远坚决斗争着的英勇将士。抗日救亡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天职，也只有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才能逼使南京政府决心抗战，给日寇以致命的打击。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红军，一年来艰苦奋斗，东进山西，西出宁夏，无非要寻找一条抗日去路，以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然而南京当局总不见谅，一再阻拦红军抗日去路。当此晋绥危急，全国人民均愿效命疆场，为民族争生存之时，南京当局偏又调动大军向抗日红军进攻，此真令人百思不解。此次红军在山城堡消灭胡宗南军一部，实出于不得已的自卫行动，并向对外妥协，对内黩武之主持者略施警告。我们认为今日而犹继续内战，实属对民族国家之罪恶行为，实际上不啻执行日本帝国主义之使命，而遗民族国家以无穷之祸。

我们现在向全中国人民宣言：全中国主力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现已集中完毕，只要给我们以抗日去路，我们准备立刻开赴晋绥前线，担任一定的抗日战线，并愿受全体抗日军最高统率机关之指挥，以抗击日伪匪军的进攻，为保卫晋绥，保卫华北，保卫中国而血战到底。我们希望南京政府立即承认我们的要求，希望全国人民拥护与赞助我们的要求。我们对于中国人民的最后胜利是有充分信心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



1936年12月，中央军委主席团组成，毛泽东为军委主席。图为1936年的毛泽东。

致彭德怀电^[1]

(1936年12月1日)

朱、张、周已到保安^[2]，情形甚好。

你对团结与改进一、二、四方面军的方针及对许多问题的意见，我都同意，很对的。但在某些步骤上，我的意见还宜改得温和一点。两星期前批评国焘一电，昨日整顿纪律一电，原则上完全正确，但在措词上有一二句颇为刺目，在今天是不相宜的，请留意及之。

[1] 这是毛泽东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2] 朱德、张国焘、周恩来于11月30日到保安。

致刘少奇电^[1]

(1936年12月2日)

急须同晋绥当局成立友好关系，以便利红军行动。速从民族解放同盟或其他关系与晋阎、绥傅接洽，其条件为：（一）晋绥容许红军参加抗日战线，划定一定防地，帮助解决给养，弹药。（二）红军愿意服从阎氏之统一指挥，并不干涉晋绥行政。（三）红军派出代表驻在晋阎、绥傅处，以资联络。

[1] 这是毛泽东致刘少奇电的主要内容。

给冯玉祥^[1]的信

(1936年12月5日)

焕章先生：

从报纸从广播从沪宁友人得悉先生一腔抗日救亡之义愤，虽没有和先生见面，等于见了一样。

在亡国惨祸面前，不分党派信仰将同遭浩劫，因此合作救亡是天经地义。

然而蒋介石先生至今犹孤行己意，对日无抗战决心，对内则动员三百个团大举“剿共”。最近敝军略施还击，胡宗南军一旅溃败，一旅覆灭，其军心动摇已极，然夫己氏^[2]犹不悟也。

目前急务似无急于停止内战。诚得先生登高一呼，众山齐应，今日停战，明日红军与西北“剿共”各军立可开进于绥远战场。否则，长城淞沪诸役前车可鉴，日蹙国百里，虽噬脐而无及矣！泽东与先生处虽异地，心实无间，倘得不吝教悔，锡以圭针，敢不拜赐！敝方抗日救国纲领，具见八月二十五日致中国国民党书^[3]，前

[1] 冯玉祥（1882—1948），字焕章，安徽巢县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1933年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任总司令。1936年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2] 夫己氏，词意为那个人。

[3] 即1936年8月25日毛泽东起草的《致中国国民党书》。

曾遣人付上，谅承鉴察，有何评判，愿接高明。

先生老部下董振堂^[1]诸君，大有进步，堪以告慰。书不尽意。

肃颂

勋祺！

毛泽东 手启

十二月五号

[1] 董振堂（1895—1937），河北新河人，曾是冯玉祥部的师长。1931年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被蒋介石派到江西“围剿”红军，董任该部第七十三旅旅长。同年12月14日董振堂同赵博生、季振同等率部在江西宁都起义，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起义部队编为红军第五军团。1936年董任红军第五军军长。

关于联合抗日救国等问题 给杨虎城的信

(1936年12月5日)

虎臣主任总指挥阁下：

侧闻先生发表告民众书，重申十五年前革命大义，快何如之，数月来乞尊处对于敝方多所协助感级〈激〉莫名，从此双方日臻密切，统一战线之基础益固，远大之图基于此矣。蒋介石氏孤行己意，萌城山城堡两役略施教训，半月来欲前又却，垂丧之态可掬〈览〉，银样腊枪头可恨复亦可笑。

张文彬君他适，兹派李涛君来见，幸赐接洽。有数事奉商于阁下者：其一，联合救国之大计，以长安为中心之五六省区宜有一种具体合作计划。此事多仗大力出而斡旋苟利抗日救国，弟方无不乐从。蒋氏徘徊歧路，对外则力求妥协，对内仍继续内战，非举各方团结抗战之力不足迫令其走上抗日救国之途。此救亡大计之宜商酌者一也。复次，敝方三个方面军会合之后，团结巩固士气甚盛。目前方针坚决保卫苏区，有进犯者决消灭之。然部队甚大，给养困难，弹药亦待补充。叨在抗日友军之列，拟向兄处暂借三十万元。除以十万元请兄处代购弹药外，二十万元作为给养被服费。如承兄慨允，请分批拨付，部队骤增，无米难继，不得不向兄阁下作庚癸之呼，阁下交友出于至诚，谅不固拒其请。还期约明年三月，决不

失信。另备轻机关枪一百挺，如兄处需此，敬以奉赠。此款弹急需，仅以奉商者二也。复次，尔后敝军行动方向目前虽尚难确定，然不论东西南北，均与贵军唇齿相关患难与共。在未与南京订立合作以前，无论对日对蒋，均须恳求兄处协助。此项方针一俟确定即以奉告。兄高明，有何见教，密为示及，无任感幸。此双方行动之务求协助者三也。复次，空间通信再不可缓。承允即立实行幸甚，某君另有任务，兹重选一人，携带密码呼号，随李君来尊处。从十二月十五日起，重要机密均经电报交谈，此外甘肤道上抢劫案时出，竟有伤人劫车之事。有由苏区地方游击队因约束不严发生者，敝方深为抱歉。查明属实愿出抚恤赔偿费，一面已下令严禁，期于弊绝风清。有由东山土匪散兵所为者，亦请贵方派队剿办，务期维护交通毫无阻碍。此通信交通之亟宜创设或整理者四也。

上述四事或关抗日大计，或属军需紧急，或系两军行动，或为通信联络，敬以鄙意披沥奉商，务祈审察示覆。朔风加厉，为国珍摄。肃颂

公祺不贐

弟 毛泽东手启

十二月五号

给孙科的信^[1]

(1936年12月5日)

今日天下之人莫不属望国民抗日，然国民党中如不战胜其降日派与妥协派则抗日不可能，因此天下之人莫不展望于国民党中之抗日派能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向着降日妥协之辈进行坚决之斗争。进行此种斗争，非有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不可，非有领袖不可，因此天下之人又莫不属望于哲生先生。

[1] 这是毛泽东致孙科信的主要内容。孙科（1891—1973），字哲生，广东中山人，孙中山之子。

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

(1936年12月6日)

(甲) 远方^[2]可于两个半月后将货物送达安西。(乙) 你们第一步相机夺取甘州^[3]，第二步夺取肃州并调查肃州至安西道上是否便于行军，计算占领甘、肃两州包括休息补充时间在内共需多少天，并计划西路军全部包括红五军在内，在甘州地区集中训练一二星期，休息体力恢复力气。(丙) 我主力在保卫苏区、消灭胡军的任务下暂不西进。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张国焘致徐向前、陈昌浩电的主要内容。

[2] 远方，指苏联和共产国际。

[3] 甘州，今张掖。

致徐向前、陈昌浩等电^[1]

(1936年12月10日)

为纪念宁都暴动五周年，特对五军团全体英勇的指战员，致以无限的敬意，更望在董军团长领导下继续宁暴伟大的精神，坚决配合一、二、四三个方面军主力，粉碎敌人新的进攻，为创河西抗日根据地而奋斗。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等以中革军委主席团的名义致徐向前、陈昌浩、董振堂、黄超及红五军团全体指战员电的主要内容。董振堂、黄超，当时分别任红五军团军团长和政治委员。

关于国共谈判情况及我们的原则立场

致张学良电

(1936年12月10日)

李宜兄：

- (甲) 雨苍^[1]已动身，删日可抵兄处。
- (乙) 陈立夫第三次找汉年谈，红军留三万，服从南京，要我方让步。我们复称根本不同意蒋氏对外妥协、对内苛求之政策，更根本拒绝其侮辱红军之态度。红军仅可在抗日救亡之前提下承认改换抗日番号，划定抗日防地，服从抗日指挥，不能减少一兵一卒，并须扩充之。彼方如有诚意，须立即停战，并退出苏区以外，静待谈判结果。
- (丙) 我们决心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
- (丁) 因上海电台尚未建立，暂时不得不由兄转，今有一要电致汉年，祈赐转为荷。

弟 东 来
蒸申

[1] 指叶剑英。

关于和国民党谈判条件等事

致潘汉年电

(1936年12月10日)

汉年同志：

齐电悉。

甲、合作为实行抗日救亡，但至今天蒋介石似尚无抗日救亡之决心，合作谈判缺乏必要之前提，南京抗日派诸君如不能促成蒋氏此种决心，则谈判显无速成之望。

乙、根本不能同意蒋氏对外妥协对内苛求之政策，更根本拒绝其侮辱红军之态度。

丙、红军在彼方忠实的与明确的承认其参加抗日救亡之前提下，可以改换抗日番号，划定抗日防地，服从抗日指挥。在这些上面我们并不坚持形式上的平等，也不须用两个政府出面谈判，但是必须两党（不是两政府）平等的签订抗日救亡之政治军事协定，红军不能减少一兵一卒，而且须要扩充之，离开实行抗日救亡任务，无任何商量余地。

丁、彼方如有诚意，须立即停止进攻并将军队撤退于苏区以外，静〔候〕谈判之结果。

杨子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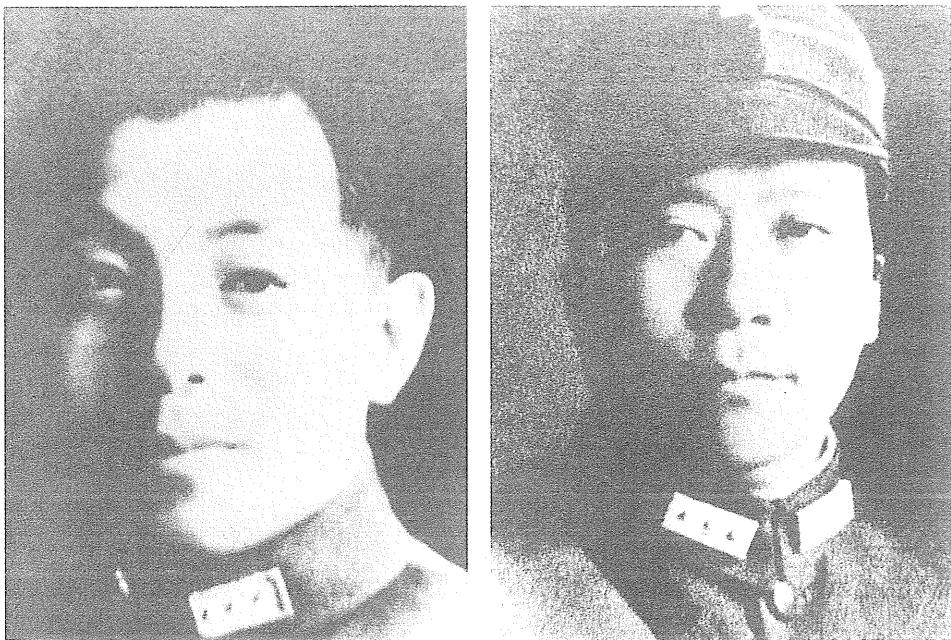
蒸西

致张学良电^[1]

(1936年12月12日)

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一线，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一线。固原、庆阳、富县、甘泉一带仅留少数红军，决不进占寸土。红军担任钳制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军。恩来拟赴兄处协商大计。

[1]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实行“兵谏”，扣留蒋介石，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当日，张学良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复张学良电的主要内容。



西安事变的发起者张学良、杨虎城。

全蜀山脈切迫要圖

張楊昨發動對蔣兵諫

推進民族團結鼓舞民族解放運動

袖領亡戮



袖領士教

張 **桂** **華** **書** **卷** **三**
藝 **文** **集** **圖** **士** **藏**

雲貴會辦民政
苗族的頭領
兩廣土庫總理
大清總理
西各部族會辦
在中
蒙古統領會辦
東北治亡、內地、
遼河以北
規定、順序於前

朱德東北總司令，張學良謀士，蔣軍易爲
乃爲力爭之，終不許。蔣軍被擊敗後方
深感痛，憂心如焚。令人要他辭去。

（一）改組南京政府，肅清各派軍閥，實行全國統一政權。（二）停止一切內戰。（三）立即開放民衆參政選舉，讓全國人民參政，一切政治自由。（四）確實進行民族團結會議，以上六項為我黨及各民主黨派一致的意願。主張：（一）廢除軍閥統治，實行全國統一政權。（二）停止一切內戰。（三）立即開放民衆參政選舉，讓全國人民參政，一切政治自由。（四）確實進行民族團結會議，以上六項為我黨及各民主黨派一致的意願。

《西北文化日报》1936年12月13日刊登的西安事变的消息。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36年12月13日)

—

这次事变是革命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它没有任何帝国主义的背景，完全是站在抗日和反对“剿匪”的立场上。它的影响很大，打破了以前完全被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蒋介石的部下分化转到西安方面来。我们对这次事变，应明白表示拥护。同时，也要估计到蒋介石的部下，如刘峙等可能进攻潼关，威胁西安，胡宗南也可能向南移动。在兰州、汉中这些战略要点，我们应即部署。我们在政治上的步骤，应使张学良、杨虎城这些人物在行动上和组织上与我们一致，要派重要的同志去做工作。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以西北为抗日前线，来影响和领导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围绕这一环，我们要向人民揭露蒋介石的罪恶，稳定黄埔系、CC派，推动元老派、欧美派以及其他杂派赞助西安事变。对英美应很好联络，使它们对西安事变在舆论上表示赞助。我们的政治口号是召集救国大会，其他口号都是附属的。中共中央暂不发表宣言，但在实际行动上应积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西安事变的一段讲话；本篇二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作结论的一部分。

极去做。

二

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新的阶段，前面摆着很多道路，也有许多困难。为了争取群众，我们对西安事变不轻易发言。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不把反蒋抗日并列。应该把抗日援绥的旗帜突出起来。

关于重兵置于潼关、凤翔、平凉 等问题致张学良电

(1936年12月13日)

李毅兄鉴：

文寅电悉。

元凶被逮，薄海同快。目前任务，在全国者已见致汉年电，昨已奉达，并祈转沪；在西北者略陈如次，敬祈酌夺。

(甲) 重兵置于潼关、凤翔、平凉、潼关尤要，严拒樊崧甫。

(乙) 号召西安及西北民众起来拥护义举，对全国亦然。弟等认为，只有将全部行动基础置于民众之上，西安起义才能确定的发展其胜利。

(丙) 宜即逮捕或驱逐部队中法西斯分子，对全军奉行广大深入的政治动员，向全体官兵宣布蒋氏卖国残民罪状，政治上团结全军，此着是最紧急任务之一。

(丁) 胡、曾、关^[1]等军向南压迫时，红军决从其侧后配合兄部坚决消灭之，如何部署，请随时电知。此外，国际方面弟等已有所布置，详容后告。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拟请派飞机赴延安来接，并求杨虎城兄电知延安驻军密为保护，如何盼复。请令

[1] 指胡宗南、曾万钟、关麟征。

电台时刻联络。

弟 东 来叩

元午

提议东北军确占兰州汉中两战略要点^[1]

(1936年12月13日)

李毅兄：

关于军事方针提出下列各点，请考虑见复：

甲、刘峙^[2]有指挥河南集团，进占潼关极大可能，似宜提起杨虎臣^[3]兄注意，以主力集中潼关而坚拒之。

乙、为确占兰州汉中两战略要点及隔离甘肃蒋军为二部起见，
提议：

(一) 于军^[4]全部巩固兰州城，严防毛炳文^[5]及西北补充旅之
进攻。

[1] 1936年12月12日，由于蒋介石顽固坚持内战，拒绝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一致要求，国民党爱国将领、东北军领导人张学良和第十七路军领导人杨虎城，在西安附近的临潼联合发动了扣押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内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调动大批军队，逼近西安，企图扩大内战。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为应付可能发生的大规模内战，就有关军事方针向张学良提出的建议。

[2] 刘峙，当时任国民党军豫皖绥靖公署主任。

[3] 杨虎臣，即杨虎城。

[4] 于军，指国民党军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

[5] 毛炳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七军军长。

(二) 兄部王董两军^[1]及骑兵军集中平凉、会宁线，将该线上之蒋军压向陇南一面，拒止胡曾关毛^[2]南下，将海原、固原防务交于红军。

(三) 红军以主力进至海、固地区，以有力一部尾随胡军于豫旺^[3]地区，配合在静宁、平凉之兄军，乘机消灭南攻之胡等。如胡等在现位置不动，则压迫之入宁夏为最好。

(四) 商刘甫澄^[4]，调川军十五团至二十团进据汉中。

以上意见是否有当，统祈见复。军事大计，祈兄主持，随时示知为盼。

弟 东 来叩

元申

[1] 王董两军，指国民党军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和第五十七军，军长分别为王以哲和董英斌。

[2]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曾，指曾万钟，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军军长。关，指关麟征，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师师长。毛，指毛炳文。

[3] 豫旺，旧县名，即今宁夏同心县。

[4] 刘甫澄，即刘湘，当时任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四川“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关于周恩来等拟十六日到延安 致张学良电

(1936年12月13日)

宜兄：

甲、电悉。稼蔷、剑英早去霍师，候车接或电霍师转送。

乙、恩来及同行人员计共二十人，拟于十六号午赶到肤施城外，请派飞机届时往接，并商虎城兄电告驻肤程团，烦其负责保护，如何，盼复。

弟 东 来

元亥

关于日本、南京情况及我们的建议 致张学良电

(1936年12月14日)

李宜兄：

甲、情况：

- (一) 日本三相会议，认为变为革命的，准备支持南京。
- (二) 南京甚慌乱，恐事变扩大，急下免职令，军队交军委直辖。
- (三) 何应钦到郑州，判断专为指挥进攻。
- (四) 樊^[1]军向潼关，万^[2]师守咸阳。

乙、建议：

- (一) 闻冯钦哉师集中西安，冯不可靠，希注意，宜以孙师集中西安、潼关间。
- (二) 胡、毛、曾、关^[3]甚恐慌，日内尚无可为，主要注意樊、万。
- (三) 东北军愈集结愈好，但兰州万不可失。
- (四) 红军准备全力增援。

弟 東來
寒子

[1] 指樊崧甫。

[2] 指万耀煌。

[3] 指胡宗南、毛炳文、曾万钟、关麟征。

关于西安事变后的形势 及我方行动方针致张学良、杨虎城电

(1936年12月14日)

汉卿、虎臣两将军勋鉴：

(甲) 文日举义，元凶就逮，抗日救亡，举国同情，弟等率领全部红军与全苏区人民坚决赞助二将军领导之革命事业，谨就所见略陈如次。

(乙) 日本决定压迫南京扩大内战，俾遂其灭亡我国之谋。南京一部分亲日分子接受日本指示，继续发展蒋氏对外和平对内战争之政策，准备向西北大举压迫。然而全国民众、国民党之大多数、各省有力军人无不渴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热烈欢迎西安之抗日起义，反对日本与中国汉奸之阴谋。

(丙) 我们行动方针似应立即进行如次各项，应急变：

(一) 立即宣布西北抗日援绥联军之组成，以张学良为西北抗日联军总司令；东北军编为西北抗日援绥联军第一集团军，张学良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十七路军编为第二集团军，杨虎臣为总司令；红军编为第三集团军，朱德为总司令。设立西北抗日援绥军事政治委员会，以三个集团军高级将领为委员，每集团军三人至五人，以张学良、杨虎臣、朱德三人为主席团，张为主席，杨、朱为副，统一军事政治领导。以上组织如荷同意，立即以三方抗日救亡联席会

议名义向全军全国宣布。此外，极力争取阎锡山先生及全国其他爱国将领加入，推阎锡山先生为全国抗日援绥联军总司令。

(二) 目前军事步骤：抗日援绥联军三部主力应集中于以西安、平凉为中心之地区，发扬士气，巩固团结，与敌决战，各个击破之。在目前三星期期内，由杨兄所部固守西安城，张兄所部及弟部担任野战。如荷同意，弟部主力可于一星期内到达西峰镇，尔后或增援西安，或增援固原，依情况决定；弟军一部则在定、盐、环钳制胡敌，另一部则在肤、甘钳制汤敌。王以哲兄部仍在固原防御胡敌，于学忠部仍守兰州。只要打得几个胜仗，即可大大开展战局，即有若干失利，亦于大局无碍。以上第一个步骤实现之后，依情况再决第二步。

(三) 目前第一要务是巩固内部，战胜敌人，提议：

(子) 在联军三部分中一致提出下列十个口号：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联合起来；抗日军队同抗日人民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召集救国会议，建立救国政府；争取人民自由；反对日本灭亡中国，反对汉奸扩大内战；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保卫中国而战，为援助绥远而战，为收复东北而战；抗日联军万岁！中华民族独立解放万岁！

(丑) 在部队中进行热烈的政治鼓动。

(寅) 肃清部队中之亲蒋分子。

(卯) 鼓动全军战斗勇气，造成至死不屈精神。

以上各项作为弟等之提议，敬祈需择，时机迫切，稍纵即逝，倘承英断采纳，合作幸甚，革命幸甚，并乞电复。

弟 毛泽东 朱 德 周恩来 张国焘 彭德怀

贺 龙 肖 克 林 彪 徐海东 徐向前同上

十二月十四日

野战军应开至西峰镇

(1936年12月14日)

彭、任^[1]:

野战军应开至西峰镇^[2]。有如下理由:

甲、南京已发动大规模内战，全力对付张杨^[3]，主力由潼关进。

乙、张杨内部有许多不稳成分，南京政策又拉杨打张，红军与之靠拢，壮其胆而振其气。

丙、靠近张杨，可应付各种事变，远离则不能。

丁、西峰镇靠近王以哲^[4]，仍可打胡^[5]。

戊、不管西安能守与否，南下有几种机动。

己、暂时出宁夏不可能，且变为单独的。张杨同时则进入隘路。

庚、在现地暂时不动，无仗可打，对张杨危急又不能救。依上理由，所以第一步到西峰镇。

毛泽东

十四日

[1] 彭、任，指彭德怀、任弼时，当时分别任红军前敌总指挥和政治委员。

[2] 西峰镇，即今甘肃西峰市。

[3] 张杨，指张学良和杨虎城。

[4] 王以哲，当时任国民党军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

[5]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

关于注意洛阳、咸阳之敌致张学良电

(1936年12月14日)

李宜兄：

十分注意洛阳、咸阳之敌，彼等有围城救蒋之企图，请将全部精力注意于集中与团结〔东〕北军及十七路军上面。

东 来

寒二十

应奉行大的战略击破敌之要害^[1]

(1936年12月15日)

彭、任：

无论军事政治方面，目前均须击破敌之要害。敌之要害不是宁夏或甘肃，而是河南与南京。敌已奉行大规模内战，我们对战争是后发，不是先发。然在敌主力向西安进时，我军应奉行大的战略，迂回并击破敌头脑之南京政府。此方针应无疑义。行动务求荫蔽，一切人不得下达。

毛

十五日二十时

[1] 这是毛泽东在西安事变后为应付国民党可能发动的大规模内战，关于红军大的战略给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和政治委员任弼时的电报。

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1]

(1936年12月15日)

南京国民党、国民政府诸先生勋鉴：

西安事变，惊传蒋氏被幽，事出意外。然此实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张杨均属党中央委员，且属“剿共”军领袖，然亦坚请停止“剿共”，一致抗日；观其宣布之八项主张^[2]，实为全国人民之所言，厉行不暇，何可厚非。今日之西安事变，不过继福建事变^[3]、两广事变之后，鼎足而三耳。三者皆属党中抗日救国之贤豪，不满蒋氏降日卖国之所为而蹶然揭出正义之旗耳。若漫不加察，一意孤行，行见同类之事变，将遍发于国中，祸患之纷乘，欲收拾而无术。夫中国国民党中爱国英贤岂得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等中共方面的军政要员为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给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的电报。

[2] 指张学良、杨虎城1936年12月13日通电全国宣布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3] 福建事变，指1933年11月20日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等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在福建发动的事变。事变后在福州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1934年1月，福建人民政府在蒋介石的军事压力和分化下失败。

谓少，然受制于蒋氏，复受制于媚外残民之亲日派，正气不伸，党义为毁，国则日蹙百里，伤破碎之河山，民则及汝偕亡，抱敷天之怨痛。窃以西安事变之发，南京当局亟宜引为反省之资，而绝不可负气横决，反而发动空前之内战，如近日电讯之所传者。语云，鹬蚌相持而渔人伺于其侧，渔人今已高举其网矣。彼日本者，自闻南京决定讨伐张杨，兴高采烈，坚甲利兵，引满待发。诚使南京诸公萃沿海长江守备之军，大兴讨伐于西北一角，姑无论西北苦寒之区，张杨勇义之众，晋绥烽火之侧，而全国鼎沸之时，胜负之数，诚未可知，借令战胜攻取，快意肆志，而日本乘机入寇，因虚而袭沪宁^[1]，取青济^[2]，华北独立，西北亦危，全国丧亡，真将万劫不复。螳螂黄雀之喻，亲痛仇快之讥，千秋万世，永难湔涤。鄙人等心所谓危，不敢不告。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国之不存，民于何有，民之泯灭，党将焉傅。是以鄙人等年余以来，不惮反复陈词，谋国共之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亦既舌敝唇焦矣。公等而果欲自别于蒋氏，复欲自别于亲日派，谓宜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放弃蒋氏爱摆之集权、统一、纲纪等等索然无味之官僚架子，老老实实与民更始，开放言论自由，启封爱国刊物，释放爱国人犯，举内战之全军，立即开赴晋绥，抗御日寇，化黑暗为光明，变不祥为大庆。若是，则鄙人等虽不敏，愿率人民红军二十万众，与贵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为自由解放之祖国而血战。否则国亡种灭，不但全国人民及贵党中爱国志士不能坐视，鄙人等亦决不能袖手旁观。

[1] 沪宁，指上海、南京。

[2] 青济，指青岛、济南。

也。临电屏营，伫候明教。

毛泽东 朱 德 周恩来 张国焘
林祖涵 徐特立 王稼穑^[1] 彭德怀
贺 龙 叶剑英 任弼时 林 虹
徐向前 陈昌浩 徐海东

删

[1] 王稼穑，即王稼祥。

关于周恩来十六日到延安请派飞机去接 致张学良电

(1936年12月15日)

李宜^[1]兄：

- (一) 已派红军一部去肤施接防，不知城内民团抗拒否。
- (二) 恩来本晨出发，明十六日晚到肤施。
- (三) 请派飞机于十六日上午到肤施机场视察，见有“天下”二字即降下接周。
- (四) 川刘、晋阎接洽如何。

泽东

十二月十五日

[1] 即张学良。

关于通过端纳活动停止南京发动内战 致张学良电

(1936年12月15日)

李毅兄：

- (一) 法国舆论颇佳，英国亦不坏。
- (二) 闻兄之前顾问英人瑞〈端〉纳有来陕说，如宜经过瑞〈端〉氏停止南京正在发动之内战，并争取英国同情，乘瑞〈端〉氏返宁派人同去接洽何应钦、孔祥熙、陈立夫三人。
- (三) 弟方本日发表正式通电：“坚主停止内战。”另有电致陈立夫。
- (四) 昨电组织抗日联军，对外请暂勿发表，惟对内似宜宣布，以一军心。上述各点统请裁夺。

弟 泽东

十二月十五日

关于国内外对西安事变的反应等情况

致张学良电

(1936年12月16日)

李宜^[1]兄：

(甲) 西安事变震动了全世界，除日、意指为赤化外，法国急进党谓：张学良已成中国第一有权威之人物；英国取调和态度。

(乙) 国内纷扰已极，江浙金融大恐慌现象。

(丙) 正面前进之敌，尚仅樊崧甫两师，黄杰师之第二旅，似向洛阳进，第十师方从汉口开动，共不过十三四团。李铁军师向南阳；王耀武等在汉中陇南；胡、毛、曾三部有向韦州、同心城集中讯；汤恩伯想回陕，尚未开动。

(丁) 望兄坚持底集结部队，提高士气，发动民众，防止反侧，胜利前途是伟大的。

毛泽东

铣酉

[1] 即张学良。

关于发动民众反对中央军进攻 致张学良、杨虎城电

(1936年12月16日)

汉卿、虎城两先生：

为了坚〔持〕决战胜利，千祈注意发动民众，主要将沿陇海路、西兰公路、西梁公路各县之民众发动起来，拥护抗日联军，拥护西安起义，反对中央军进攻，保卫抗日首都，保卫抗日根据地。是否有当，尚祈卓酌。

毛泽东

十二月十六日

关于西安事变应和平解决等事 给阎锡山的信

(1936年12月16日)

飞送山西阎百川先生勋鉴：

接彭雪峰〈枫〉转来电，知先生抗日救国义薄云天，敝方奉商各端，倘荷赞谅，感幸实深。西安事变后，时局急转直下，有数事就商于先生者：

(一) 时局应和平解决，万不宜再起内战，自速覆亡，敝方删日通电详申斯旨，先生一言九鼎，敢乞周旋宁陕之间，先停军事行动，再议时局善后。

(二) 当前急务抗日第一，抗日所急，在于援绥，谓宜举宁方西进之军改道北进，张、杨二公所部尤志切同仇，红军则久矣，愿附骥尾与国仇相见于绥察之间，共组抗日联军，推先生为统帅，各军指挥调遣惟先生之命是从，给养方面以红军言所需甚少，但能发伙食费，即可不事征发，一切地方行政社会秩序不加丝毫干涉，乞速指示以便遵循。

(三) 立即建立无线电联络，雪峰〈枫〉带去呼号密码，未知此处已否启用，敝方电台屡叫未通，幸赐注意。

毛泽东

十二月十六日

关于请接周恩来到西安 致刘鼎转张学良电

(1936年12月17日)

刘鼎转李毅兄：

- 甲、恩来昨到肤施城外，肤施民团守城不开，交涉不听。
- 乙、有何方法接恩来到西安请即示。
- 丙、可否派武装大汽车两辆到甘泉，何日可到。

弟 泽东
十七日五时

关于迂回部队突击京汉、龙海线等问题 致张学良电

(1936年12月1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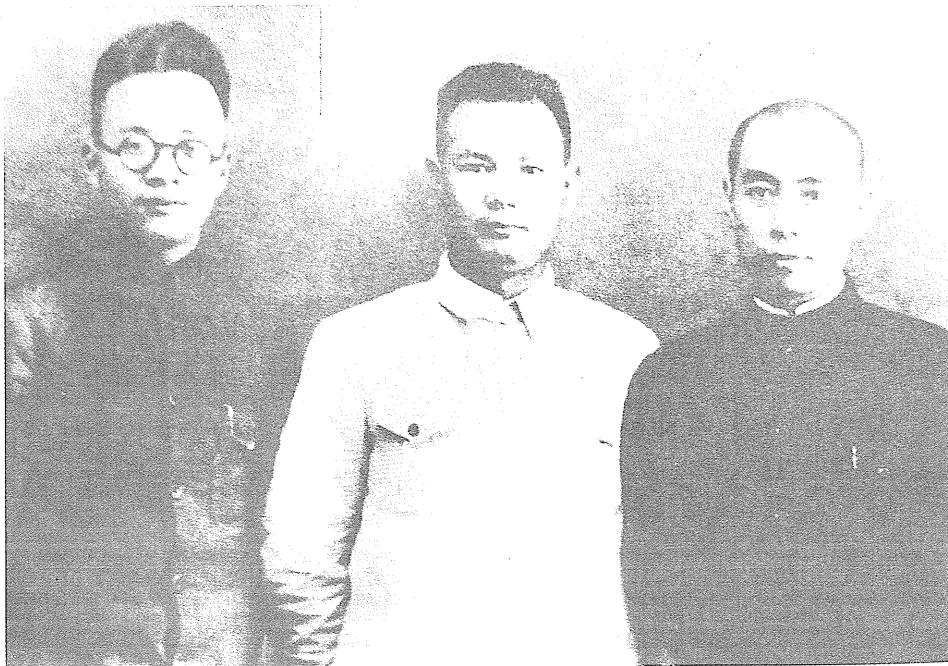
李毅兄：

筱电奉悉，集力抗战甚妥。惟对敌意见，弟认胡宗南、汤恩伯均不过一支队，各以一部钳制之可也，敌之要害在南京与京汉、陇海线，若以二三万人之战略迂回部队突击京汉、陇海取得决定胜利，则大局立起变化，此点祈考虑。我们对远方^[1]已作几个报告，尚无回报。兄令刘鼎将每日群众运动情形电告一次，若远方知此次事变及事变后之进展不是单纯军事行动，而是与民众联系的，估计当寄以同情。惟远方政府目前为应付外交，或尚不能公开赞助我们。恩来在肤施城外等候，请速饬肤施民团让出该城。如何盼复。

弟 赵东

十七日

[1] 指共产国际。



应张学良邀请，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叶剑英、博古（秦邦宪）到西安参加谈判。1936年12月17日，周恩来一行飞抵西安，立即和张学良举行会谈。

关于解决西安事变问题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

(1936年12月19日)

西安事变后南京一切注意力集中在捉蒋问题上，把张、杨一切抗日的主张都置而不论，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是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黑暗的一面。这次事变促进抗日与亲日的分化，使抗日战线更为扩大，这是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光明的一面。现在光明面被黑暗面掩盖住。我们应坚定地站在抗日的立场上，对于光明面予以发扬，对于黑暗面给以打击。西安事变有两个前途，胜利或失败。我们应争取和帮助西安方面，把阵线整理好，打击讨伐派，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夺取胜利。我们应与东北军、西北军接近，对他们的态度，不仅不与南京混同，而且与阎锡山也不同，我们对张、杨是同情的。应当根据这样的立场发表通电。西安事变是站在红军的侧面，受红军的影响很大。它要取得斗争的胜利，无疑地是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与广大群众的帮助。现在的营垒是两方面，一方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亲日派，另一方是共产党与抗日派。中间还有动摇与中立的一派，我们应争取这些中间派。要争取南京，更要争取西安，只有内战结束才能抗日。有六种力量可能使内战结束：一是红军，二是东北军，三是西安的友军，四是人民，五是南京的

内部分化，六是国际援助。应把六种反内战的力量团结起来，使内战结束，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 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1]

(1936年12月19日)

南京孔庸之，孙哲生，冯煥章，陈立夫等先生，及国民党国民政府诸先生；西安张汉卿，杨虎城，王鼎芳，孙蔚如先生，暨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诸先生勋鉴：

自西安提出抗日纲领以后，全国震动，南京的“安内而后攘外”政策，不能再续。平心而论，西安诸公爱国热心，实居诸首列，其主张是立起抗日。而南京诸公，步骤较缓。可是除亲日分子外，亦非毫无爱国者，其发动内战，当非心愿。以目前大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无非自速其亡！当此危急存亡之秋，本党本政府谨向双方提出如下建议：

一、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南京军队勿向潼关进攻，西安抗日军亦暂止陕甘境内，听候和平会议解决。

二、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并通知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选派代表参加。本党本政府亦准备派代表参加。

三、在和平会议前，由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先提出抗日救亡草

[1] 本通电于1936年12月19日还全文向全国人民及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发表，文字基本相同。

案，并讨论蒋介石先生处置问题，但基本纲领，应是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

四、会议地址暂定在南京。

上述建议，实为解决目前紧急关头之合理有效方法，南京诸公，望立即决定国策，以免值此国家混乱中日寇竟乘虚而入也！并望全国人民各党各派，立即督促当局召集和平会议，讨论一定国策，共赴国难！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

对西安事变通电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南京孔庸之，孙哲生，冯煥章，陈立夫等先生，及国民党国民政府诸先生；西安张汉卿，杨虎城，王鼎芳，孙蔚如先生，暨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诸先生勋鉴：

自西安提出抗日纲领以后，全国震动，南京的“安内而后攘外”政策，不能再续。平心而论，西安诸公爱国热心，实居诸君前列，其主张是立起抗日。而南京诸公，步骤较缓，可是除亲日分子外，亦非毫无爱国者，其发动内战，当非心愿。以目前大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无非自速其亡！

当此危急存亡之秋，本党本政府谨向双方提出如下建议：

一、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南京军队勿向潼关进攻，西安抗日军亦暂止陕甘境内，听候和平会议解决。

二、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并通知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选派代表参加，本党本政府亦准备派代表参加。

三、在和平会议前，由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先提出抗日救亡草案，并讨论蒋介石先生处置问题，但基本纲领，应是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

四、会议地址暂定在南京

上述建议，实为解决目前紧急关头之合理有效方法，南京诸公，望立即决定国策，以免值此国家混乱中日寇乘虚而入也！并望全国人民各党各派，立即督促当局召集和平会议，讨论一定国策，共赴国难！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通电。

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

(1936年12月19日)

一 西安事变产生前的形势

(一) 在绥东局部抗战开始后，在全国以及西北各大城市（如西安、太原、绥远），抗日运动突飞猛进，不但使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与绝大部分的中等资产阶级参加，即大资产阶级内部也发生着决定的分化。

(二) 南京政府正面对着这一迅速发展着的抗日运动，它被迫着很迟慢的与不坚定的改变着它过去对日退让的政策。在这转变过程中，它还是对日力求妥协，对绥远局部抗战表示不积极，对全国抗日运动，采取压抑政策，对红军不肯停止进攻。

(三) 东北军及十七路军将士，在全国与西北人民及共产党苏维埃红军的影响与推动之下，抗日情绪特别高涨，因此要求迅速停止进攻红军，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但他们的这种要求，为蒋介石所严拒。

二 西安事变的意义

(一) 这一发动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

中的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因此，这次发动是为了要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

(二) 但是因为这一发动采取了多少军事阴谋的方式，扣留了南京最高负责人蒋介石及其主要将领，以致把南京置于西安的敌对地位，而造成了对于中国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可能。因此，这一发动又妨害了全国反日力量的团结。

三 西安事变发展的两个前途及其拥护者

(一) 或者由于这一发动使内战爆发，使南京中派（民族改良派）一部或大部主观上与客观上走向亲日，削弱全国抗日力量，推迟全国抗战的发动，以致造成了日寇侵略的顺利条件。这一前途是日德意国际侵掠阵线，特别是日本，及中国亲日派所造成的。^[1]

(二) 或者由于这一发动结束了“剿共”的内战，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而得到早日的实现，使全国的抗日救亡的统一战线反而更迅速的实际建立起来。这一前途，是国际和平阵线，全国人民，全国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所竭诚拥护并要使之实现的。

[1] 《六大以来》版此处为：“特别是日本及中国亲日派所欢迎的。”

四 为实现第二个前途中共的基本方针是

(一) 坚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

(二) 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日的立场，揭破日寇及亲日派利用拥蒋的号召，发动内战的阴谋。

(三) 同情西安的发动，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军事上的与政治上的），使之彻底实现西安发动的抗日主张。

(四) 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给讨伐军以严重的打击，促其反省，这种防御战不是为了要以扩大内战的方针代替一致抗日的方针，而依然是为了促成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



西安事变发生后，红军在军事上给张学良、杨虎城部以援助，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发挥了重要作用。图为彭德怀、任弼时等红军将领和国民党东北军部分将领在陕西三原的合影。

关于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 致潘汉年电

(1936年12月19日)

汉年同志：

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

毛泽东

皓

关于张学良、杨虎城要坚持更有前途 致周恩来电

(1936年12月19日)

周：

- (甲) 端纳谈些什么。
- (乙) 有蒋鼎文释放讯何故。
- (丙) 严防于右任。
- (丁) 欢迎宋子文来西安。
- (戊) 胡、毛、曾、关^[1]准备集中天水。我意让他集中空出甘北。
- (己) 汤恩伯未动，不一定回陕。
- (庚) 张、杨要坚持，更有前途，一点不须气馁。
- (辛) 情况望详告。

毛

[1] 指胡宗南、毛炳文、曾万钟、关麟征。

关于争取十七路军抗日反内战问题 致周恩来电

(1936年12月19日)

周：

- (一) 争取十七路全部稳定于抗日、反内战立场，是当前重要一着。
- (二) 十四个政治口号，应提出于东北军、十七路军之全军中，早晚点名呼唤。

毛

配合张学良杨虎城部消灭东来之敌^[1]

(1936年12月19日)

周：

甲、时局正在发展，一方面日本军阀、中国汉奸、南京右派，极力制造内战局面；另一方面西安抗日军、红军、中国人民、中国反蒋实力派、南京左派、国际和平国家，正在结合反对内战，拥护抗日。

乙、苏维埃、共产党十九日主张召集和平会议之通电，乃为团结一切国内、国际左翼及中间势力，为反对内战、拥护抗日而斗争。

丙、西安抗日军亦应本此共同之总方针而前进。

丁、坚决消灭进攻之敌，为执行此总方针之重要手段。

戊、红军决向西安集中，配合张杨首先消灭东来之敌。

毛泽东

十九日二十三时

[1]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应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派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和叶剑英等为代表到西安与张、杨和各界爱国人士共商国是，并同蒋介石直接谈判；同时，在军事上作了以红军主力协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准备迎击“讨逆”军进攻的部署。这是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

关于坚守渭南临潼西安线 致周恩来电

(1936年12月19日)

周：

(甲) 坚守渭南、临潼、西安线，二十天红军便可赶到，一战击破东敌，则西敌不成问题矣。

(乙) 单用十七路于渭南西安线，十七路必胆怯，提议东北军、十七路集中力量守该线。

(丙) 从渭南至西安筑坚二十道至三十道，并筑碉堡死守二十天。

(丁) 敌仅二十八及七十九两个师，第二师之第二旅及第十师尚未到，其力甚薄。

毛

十九日二十三时

关于共产国际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致周恩来电

(1936年12月20日)

周：

国际来电如下：

既然发动已成事实，当然应当顾及实际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

甲、用吸收几个反日运动的代表，即赞成中国统一和独立的分子参加政府的方法来改组政府。

乙、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

丙、停止消灭红军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

丁、与同情中国人民反抗日本进攻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不要提联合苏联的口号。

毛
二十日二十时

关于和宋子文见面问题致周恩来电

(1936年12月20日)

周：

如宋子文态度同情陕变，兄可设法见他，一面提出我党调和陕变、中止内战、共同对日之主张，站在完全第三者的立场说话，痛陈时局危急，内战是死路之意旨，征求他即召集和平会议，解决国是。

毛

关于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后方问题 致周恩来电

(1936年12月20日)

周：

东北军应以洛川为后方，十七路以韩城为后方，两军辎重宜逐渐向两地迁移，准备万一放弃西安时，不至仓卒误事。但迁移宜秘密，并且是在坚守西安的决心下，才这样做的。

毛

关于同意军事计划等问题 致周恩来电

(1936年12月20日)

周：

各电均悉。

(甲) 同意军事计划。

(乙) 红军主力第一步集结庆阳，如胡宗南南下决消灭之，王以哲军应固守固原西峰。

(丙) 杨要之人正准备，并电南汉臣〈宸〉回。

(丁) 汉年有电从天津发来，邓文仪请他同飞西安说和，汉年正向各方活动和平。

毛

给彭雪枫的信^[1]

(1936年12月20日)

雨峰同志：

致百川^[2]先生信阅后即送交，并求回信。建立电台交通、吉县延长徒步交通及晋陕通商关系，务须即办，不可延缓。以后往华北交通多须通过晋境，请与阎先生妥商，得其同意。兹派宋绍林同志送信与阎并给你此信，即将回信交彼带回，以快为好。璩象咸县长如得阎许可，最好往来彼我之间，因他情形已熟悉。你在外间交接，态度务须诚恳，立场务须坚定，用费务须节省。对陕变^[3]方针，已详十九日通电^[4]，望本此作去。晋方交涉经过写一报告来。此致
敬礼！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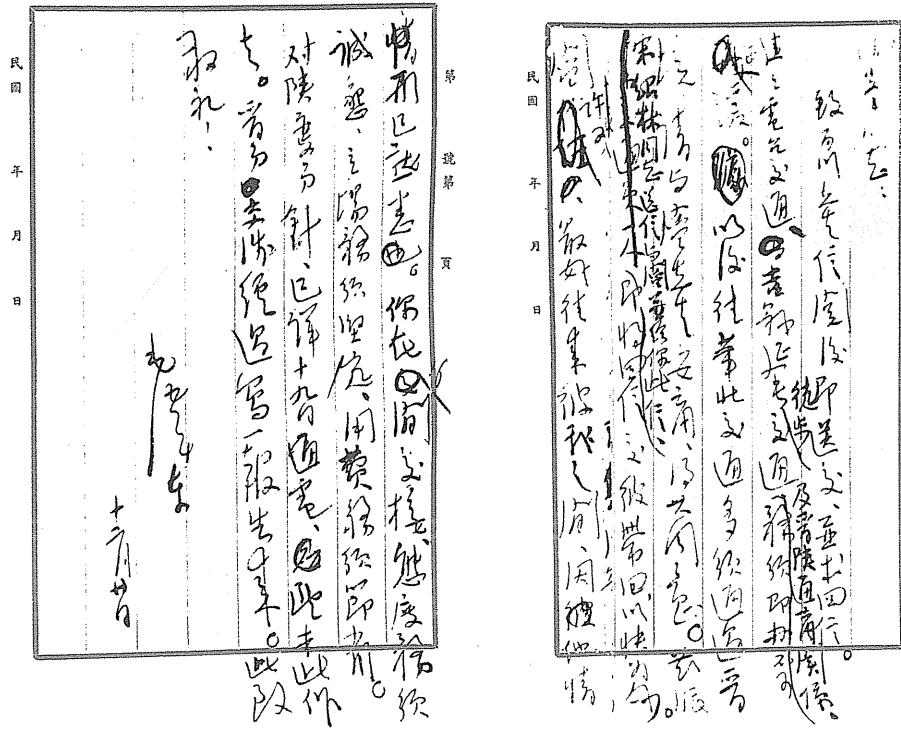
十二月廿日

[1] 彭雪枫（1907—1944），又名彭雨峰，河南镇平人，曾任中国工农红军支队长、师政治委员。1936年任中国共产党派往山西等地做统一战线工作的代表。1941年任新四军新四师师长。1944年在河南夏邑作战中牺牲。

[2] 百川，即阎锡山。

[3] 陕变，即西安事变。

[4] 指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1936年12月19日发出的提议召集和平会议解决西安事变的通电。通电呼吁停止内战，团结全国一致抗日。



毛泽东致彭雪枫信的手稿。

关于共同抗日问题 致王以哲转马鸿宾电

(1936年12月21日)

王军长鼎方兄：

转马师长鸿宾勋鉴：

承王军长介绍贵师与敝方结为抗日友军，曷胜欢迎，从此纪〈化〉敌为友，谊同一家，为抗日而誓师，为救亡而奋斗，相亲相爱，互助互援，谨电申意。

敬颂

勋祺。

弟 毛泽东

朱 德

彭德怀

实现国内和平一致抗日的五项条件^[1]

(1936年12月21日)

汉年同志：

即向陈立夫先生等提出下列要求，征其同意。

目前最大危机是日本与南京及各地亲日派成立联盟，借拥蒋旗帜，造成内乱，奴化中国。南京及各地左派应速行动起来，挽救危局，共产党愿意赞助左派，坚决主张在下列条件基础上成立国内和平，一致对付日本与亲日派。

(甲) 吸收几个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亲日派。

(乙) 停止军事行动，承认西安之地位。

(丙) 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

(丁) 保障民主权利，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成立合作关系。

(戊) 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结果如何，速以电报答复。

毛

二十一日

[1] 这是毛泽东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给当时受中国共产党委派同南京国民党当局谈判的代表潘汉年的电报。

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致周恩来电^[1]

(1936年12月21日)

恩来同志：

(甲) 目前局势是日本与南京右派联盟，企图夺取蒋系中派，造成大内乱，另方面是南京与各地左派企图调和而中派在动摇中。

(乙) 我们与西安策略，应扶助左派，争取中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

(丙) 请与张杨商量立即采取如下步骤：

(一) 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诚谈判，在下列基础上成立和平。

第一，南京政府中增加几个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排除亲日派，实行初步改组。

第二，取消何应钦等之权力，停止讨伐，讨伐军退出陕甘，承认西安之抗日军。

第三，保障民主权利。

第四，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

第五，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给周恩来的电报。

第六，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并在上述条件下赞助中国统一，一致对日。

(二) 依上述条件与阎锡山、宋子文、于右任、黄埔左派、二陈^[1]派等谈判。

(三) 对阎锡山迁蒋至山西办法应表示可以考虑。

(四) 招致一切愿意和平之人士来西安谈判。

(五) 招致英美顾问再来西安，经过他们使英美赞助和平。

(六) 巩固西安军事阵地，使尽可能持久，以待政治谈判之成功。

(七) 对陕甘之黄埔军官，如胡宗南、樊崧甫、董钊等进行接洽。

(八) 兄应以共产党代表资格，公开与蒋、陈、宋、阎、于等，基于上述条件与谈判，调停双方。

中央书记处

二十一日

[1] 指陈果夫、陈立夫。

揭破日本与何应钦派联合害蒋之阴谋^[1]

(1936年12月21日)

周：

派人去董钊、樊崧甫、王耀武、胡宗南等处，告以何应钦、何成浚等亲日派实欲置蒋于死地之阴谋，愿与谈判恢复蒋自由之条件，黄埔系不要受亲日派、阴谋派所愚，并发传单揭破日本与何应钦派联合加害蒋之阴谋。

毛

二十一日二十时

[1] 这是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

致周恩来来电^[1]

(1936年12月22日)

红军正向南急进，二十天内准可集中咸阳^[2]。罗炳辉、萧劲光、谢嵩^[3]三部钳制胡宗南，必要时宋时轮部也加入。陕北苏区均恢复，瓦窑堡、延川、延长、延安四城均入我手。

[1] 这是毛泽东关于通报红军进军和陕北苏区恢复情况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2] 周恩来12月21日致电毛泽东，提出希望红军主力十天内集中长武、彬县一线，再十天集中兴平、咸阳一线。

[3] 谢嵩，当时任红二十九军军长。

给中华民族革命同盟^[1]的信

(1936年12月22日)

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诸先生：

接到了你们的信，完全同意你们信上的意见。我们与晋绥当局之间尚缺乏必要的与诚意的联系，对于当前迫切的救亡任务是非常不利的。我们坚决申明：完全同情于晋绥当局及军队与人民真正抵抗日寇捍卫疆土的决心与行动，我们愿以全力为他们援助。今年春间红军渡河东进，原以冀察为目的地，以日寇为正面敌，不幸不见谅于阎蒋两先生，是以引军西还，静待他们之谅解。红军虽迫切愿望迅速进入抗日阵地的最前线，但必须先求得当地友军之谅解，在没有取得谅解以前，红军决不冒然开进。如果晋绥当局真心抗日，而又于他们认为必要时，红军当与之订立合作协定，在协定中规定划分防线，互相援助，保证给养补充，并统一作战指挥等事项。如果此协定能够订立，红军依据此协定进入晋绥抗战地段，则红军当唯抗战之利益是务，决不干涉当地之行政与决不对友军有任何不利的行动。来信问到红军在西北的战略企图，我们告诉你们，红军的唯一企图在保卫西北与华北，目前是集中于陕甘宁地区，首先求得

[1] 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指1933年福建事变失败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于1935年在香港建立的国民党民主派的秘密政治组织，办有《民族战线》等报刊，宣传抗日反蒋。

国民党军队的谅解，在合作基础上共同进入抗日阵地，舍此并无其他企图。我们现已向西北一切国民党军队发表申明：红军自动地停止攻击他们，仅在他们进攻时采取必需之自卫手段，在为自卫而缴获他们的人员武器，如果他们转至抗日时，一律送还，他们向抗日阵地转移时，不许红军任何人员有任何妨碍他们的举动，并须予以一切可能的援助。总之，当此国亡无日之时，我们的志愿是抗日救亡，也仅仅在于抗日救亡。各方虽尚有若干对我们怀抱疑虑的人，但悠长的岁月将证明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们所做的。你们为民族解放而奋斗，我谨代表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与我们的红军，向你们献上热烈的敬意，希望双方结成坚固的阵线，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到底，并望你们推动各方首先是晋绥当局迅速执行抗战并成立各派的联合阵线，我们亦正在向各方面这样做。专此奉复。谨致民族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二日于陕北苏区

给阎锡山的信

(1936年12月22日)

百川副委员长勋鉴：

陕变^[1]突起，事出非常。从电讯中知我公反对内战，有“共维大局”之语，至理名言，曷胜钦佩。敝方主张详删皓两电^[2]，抄陈台鉴。敝方为大局计，不主决裂，亦丝毫不求报复南京，愿与我公及全国各方调停于宁陕之间，诚以非如此则损失尽属国家，而所得则尽在日本。目前宁军攻陕甚急，愿我公出以有力之调停手段。至于红军，只要南京停止“剿共”政策，赞同统一战线，一致抗日，并划定适宜之防地，决不向南京管辖境内进攻。对我公领导之晋绥方面，前遣彭雨峰晋谒，已将鄙意奉陈。数月来我公及傅将军在绥东英勇抗敌^[3]，与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取消消防共会，尤为敬佩之

[1] 陕变，指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东北军领导人张学良和第十七路军领导人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这次事件通称西安事变。

[2] 删电，指1936年12月15日毛泽东等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电报。皓电，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1936年12月19日提议召集和平会议解决西安事变的通电。

[3] 1936年8月和11月，日本帝国主义指使伪蒙军两次进攻绥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东北地区。绥远驻军傅作义等部奋勇抗击，并于11月收复百灵庙等地。

至。惟现宁陕相持甚急，如宁方坚持进攻而无丝毫转圜之余地，则红军势难坐视。战争范围扩大，所需于我公协助之处甚多。如何使晋绥陕甘四省亲密团结，联成一气，俾对国事发言更为有力之处，敬祈锡示南针。尊处与敝处电台联络亟宜从速建立，再从吉县、延长建立徒步通信站。如荷同意，电台即从一月十五号起开始发报。徒步通信站在吉县者尊处任之，在延长者敝处任之，在平渡关两岸各备渡船一只，约定专任通信，双方武装互不过河。晋陕经济通商亦恳早日实行，恢复寻常关系。吉县县长璩象咸先生今春随军来陕，屈在敝处教育部工作者数月。璩先生诚笃君子，对敝方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知之颇悉，倘得随时往来，甚为欢迎。彭雨峰在尊处多承优遇，感荷实深，尚祈随时予以指导，使之有所遵循。一切统祈详示。敬颂

公祺！

毛泽东 敬上
十二月二十二日

致南汉宸电^[1]

(1936年12月23日)

因十七路军不巩固，极须大力进行政治工作，杨虎臣极望兄回帮助。

兄至十七路军，应坚定其军政干部抗日救国、联红联共、不怕牺牲、直干到底之决心，并发展党的组织，争取十七路军变为真正的人民抗日军。

[1] 这是毛泽东致南汉宸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胡、曾、关敌南下及我军部署 致周恩来电

(1936年12月23日)

周：

甲、胡、曾、关准备南下，判断不走海静即走固镇，但不会走庆阳。现周、孔^[1]退金积，再向中宁堡，顾祝同到宁夏后尚须与胡、关会商，判断须一星期后才能开始动作。

乙、提议作如下部署：

一、固原、平凉、西峰、镇原四点东北军位置四个师筑碉屯粮，为死守计，必要时固原、西峰再增加一个师，马洪〈鸿〉宾守黑城镇李旺堡线。

二、庆阳、合水由萧劲光占领。

三、罗炳辉为司令员，宋时轮为副司令员，宋任穷为政委，指挥二十八军、三十二军、骑一团及二十九军主力，尾敌前进威胁敌侧后。

四、准备调四方面军向兰州平凉，由兰州补充其被服弹药，如何盼复。

毛泽东

二十三日十二时

[1] 指周祥初、孔令恂。

关于时局正在变化中 张、杨不会久处孤立致周恩来电

(1936年12月23日)

周：

甲、南汉臣〈宸〉来电，王世英去沪返南京即动身，他问回陕做何事。

乙、津电二十九军高级干部开会，主张停止内战，开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事，已授意教育界出面要求宋哲元发表此主张。

丙、时间正在变化中，张、杨不会久处孤立，但应告诉张、杨及其干部，把工作放在困难点上，即使困难，奋斗到底，最后胜利是我们的。如无此种决心，则遇有挫折将不能支持，凡事向好坏两面着想，力争好的前途，同时也准备对付坏的局面。

毛泽东

二十三日二十时

致阎锡山、赵戴文^[1]

(1936年12月23日)

(一) 十分钦佩晋绥当局对日寇的英勇抗战、开放爱国运动及取消消防共组织，敝方与晋绥的基本方针已属一致，希望晋绥当局坚持此方针不变更。(二) 希望即刻实现双方的密切合作，首先停止对西北的全部内战（包括对红军的与对西安的），给南京亲日派以压力达到此目的。(三) 红军要求晋绥当局同意开赴绥察抗日，愿受阎之指挥，不干涉晋绥行政与社会秩序，晋绥发给伙食、弹药。(四) 建立晋西、陕北交通通信，恢复通商关系，从吉县、延长局部开始。(五) 不使汤恩伯回陕，并调出李仙洲、高桂滋、高双成离开陕北，此事请阎、赵大力帮忙。

[1] 这是毛泽东请山西吉县县长璩象咸代向阎锡山、赵戴文面陈的内容。赵戴文，当时任国民党山西省政府主席、自强救国同志会副会长。

致周恩来、博古电^[1]

(1936年12月24日)

对临时军政委员会名单，我们方面拟参加朱德、彭德怀、贺龙、叶剑英、徐向前五人。恩来、伯渠参加实际工作不参加名单，以便将来进行国民党工作。泽东不参加。对张、杨说明，共产党为争取全国各派，应采此种方针，对张、杨亦是有利的。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致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电的主要内容。博古是12月23日和叶剑英等一起到西安协助周恩来工作的。

关于坚守固原等处及罗炳辉等均为配合东北军作战之部队致王以哲电

(1936年12月24日)

鼎芳兄：

两电均悉，敬复如下：

一、胡军孔、周^[1]两师现由金积向同心城集中，第一师在其后，曾万钟师似在预旺城未动，毛炳文部不明。彼等均有向固原进攻讯。兄部宜在固原、镇原、西峰、平凉等处重新配备兵力，加修碉堡，屯集粮食为坚守计。

二、罗炳辉、宋时轮、萧劲光三部，红军大学第二校办，陕甘宁省所属游击队均为配合兄部作战之部队。罗、宋两部现在预旺城东侧，曾南进时彼即尾追其侧后，因相距尚远，暂时不容出击，联络由保安送克密去已来不及，有电应由弟处转令执行。肖劲光率独立师在预旺堡三岔线，红大第二校不日进驻庆阳，请令西峰周师与之联络，由陕甘宁省委负责。李富春在曲子镇，周师亦可出击联络。

毛 朱 彭
敬午

[1] 指孔令恂、周祥初。

关于东北军、西北军以西安 为中心建立后方致周恩来电

(1936年12月25日)

周：

提议东北军、西北军均以富县、甘泉、延安、牛武镇、羊泉镇、张村驿为总后方，再以庆阳、曲子、环县为第二后方。立即开始输送，先搬最重要物品。为避飞机，主要不置于城市，而置于乡村，靠近苏区万无一失。但此决不动摇以西安为中心持久作战奋斗到底之决心。

毛泽东
二十五日十二时

对张学良杨虎城击破东敌部署的提议

(1936年12月25日)

周、博^[1]:

甲、据本日情报：何应钦^[2]以主力周暑黄杰^[3]两纵队共二十团用于渭北，李默庵^[4]纵队大概八个团用于洛南，正面仅置樊松甫^[5]纵队八个团起吸引与钳制作用。

乙、敌之部署甚便于红军主力到达咸阳后从蓝田击破李默庵纵队，突击陇海线，断其归路，开展战局。提议速作如下部署：

- 一、立即派人秘密解决冯钦哉^[6]，巩固大荔于我手中。
- 二、巩固孝义镇^[7]沿河，迟滞敌之渡河。
- 三、以东北军两个师秘密输送于富平，巩固该重点于我手中。

[1] 周、博，指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当时是中共中央派往西安的代表。

[2] 何应钦，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国民党军“讨逆”军总司令。

[3] 周暑，当时任国民党军“讨逆”军东路集团军第六师师长。黄杰，当时任国民党军潼关警备司令。

[4] 李默庵，当时任国民党军“讨逆”军东路集团军第十师师长。

[5] 樊松甫，即樊嵩甫，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军军长。

[6] 冯钦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第七军军长兼第四十二师师长，西安事变后不久背叛杨虎城投靠蒋介石。

[7] 孝义镇，位于陕西省渭南市东北。

四、三原、高陵、康桥镇^[1]各置一个师。为坚守计，渭南、临潼间及临潼、西安间各架桥一座，并多准备船，以便红军必要时转向北岸作战。

五、置一个师于蓝田，出一个团于厚子镇^[2]，另置一部于保安镇^[3]，再于商县置一旅，均坚工死守，保证后方，便红军突击陇海路。

六、渭南、临潼正面置两个师。

七、西安暂时置一个师足矣，其余集中于机动位置。以上建议速向张杨^[4]提出。

毛泽东

二十五日三时

[1] 康桥镇，位于陕西省临潼县北部。

[2] 厚子镇，今名厚镇，位于陕西省蓝田县东北。

[3] 保安镇，位于陕西省洛南县西北。

[4] 张杨，指张学良和杨虎城。

关于争取陈诚、朱绍良、 邵力子诸人致周恩来电

(1936年12月25日)

周：

向陈诚、朱绍良、邵力子、陈继承、曾扩情诸人解释我们的方针，争取他们。

毛泽东

二十五日二十四时

关于在五个条件下恢复蒋之自由 致彭德怀、任弼时电

(1936年12月25日)

彭、任：

在五个条件下，恢复蒋之自由，以转变整个局势的方针，是我们提出的。谈判结果，蒋与南京左派代表完全承认。昨晚电恩来，待先决条件履行及局势发展到蒋出后不再动摇才释放。但他们今日已经释放蒋介石，宋子文、张学良、宋美龄今日同机飞洛。依情势看，放蒋是有利的，是否达成有利，当待证实后告。

野战军仍速开咸阳集中。

毛泽东

二十五日

和军委电台部分同志的谈话^[1]

(1936年12月25日)

革命嘛，总是难免走点弯路，总是要吃点苦的。如果有人因为吃了点苦，就不愿意在四方面军工作，那就不对了，四方面军也是党领导的军队嘛！我们干革命，就得听党的话，就要服从革命的需要，哪里需要我们，就到哪里去，革命事业嘛，总得有个分工，分到哪里，就在哪里战斗，不能挑挑拣拣。如果，认为革命工作有高低贵贱之分的话，那是不对的。

[1] 在长征的路上被分配去左路军工作的军委电台的部分同志来到保安。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他们走了许多冤枉路，吃了不少苦，觉得心里委屈，工作上不安心。毛泽东得知后便去驻地看望他们，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这是毛泽东等和他们谈话的部分内容。

致彭德怀、任弼时电^[1]

(1936年12月26日)

为督促南京撤兵，为准备万一变化，为便利扩大补充野战军，仍应执行原计划，惟不驻咸阳，而照一、二、四方面军次序，驻兴平、武功、扶风、凤翔线，处在南京军天水集团与潼关集团^[2]之间，对东北军、西北军则处在其外侧。

西安已有五万元向庆阳运送。一切购买，不打土豪。驻乡村不驻县城。

[1] 这是毛泽东致彭德怀、任弼时电的主要内容。

[2] 天水集团，指何应钦组织的“讨逆军”的西集团，由顾祝同指挥，集结于天水等地。潼关集团为其东集团，由刘峙指挥，集结于潼关等地。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36年12月27日)

我们过去估计西安事变带有革命性是对的，如果它没有革命性便不会有这样好的结果。西安事变给国民党以大的刺激，成为它转变的关键，逼着它结束十年的错误政策，结束十年内战，而内战的结束也就是抗战的开始。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合作，是划时代的转变，是新阶段的开始。蒋介石释放后，他的动摇是否最后结束？现在还只能说是结束的开始，我们要动员一切力量结束他的动摇。西安事变使蒋介石的地位降低了，而我们的地位提高了。我们在西安事变中实际地取得了领导地位，应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开展全国局面，把红军扩大起来，与张、杨更加团结，成为抗日的核心，这是我们当前的任务。我们的具体策略是推动左派，争取中派，打击右派。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作关于西安事变问题的报告的一部分；本篇二是毛泽东在大会上所作结论的一部分。

二

巩固西北根据地，扩大红军和苏区，改造东北军和西北军。做好全国群众工作，把群众组织起来，这是工作的重心。加强对国民党的工作，特别要作好左派、中派和军队的工作，重视宣传工作，党报应办起来。培养干部，要办党校和红军学校，造就群众的、军事的、党的、政治的四种人材。应督促国民党三个月后召开救国会议。

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

(1936年12月27日)

蒋介石的接受抗日主张与蒋介石的释放，是全国结束内战一致抗日之新阶段的开始。但要彻底地实现抗日任务，还须要一个克服许多困难的斗争过程。这个过程的实际，即是中国抗日派与中国亲日派的剧烈斗争，也即是世界和平阵线与世界侵略阵线的斗争之一部分，并在斗争中推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间派最后结束他们的动摇地位，而坚决走上改革内政、对外抗战的道路。这个过程的快慢，首先决定于抗日派力量的壮大。因此，我们目前必须：

(一) 宣传此次和平解决的胜利及日寇与亲日派挑拨内战阴谋的失败，号召全国人民与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亲密地联合起来，实行改革国内政治与对日抗战。

(二) 继续督促与逼迫蒋介石实现他自己许诺的条件，即停止内战，改组国民政府，改组国民党，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停止剿共政策，联合共产党，召开救国会议，联合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与实行对日抗战等条件。

(三) 巩固西安发动的胜利，巩固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的团结，赞助张杨改造东北军、西北军成为最好的抗日军队，发动与组织西北民众，联合西北少数民族，扩大与巩固红军，使陕甘两省首先成为抗日根据地与策源地。

(四) 继续推动各地实力派参加对日抗战、对内民主的运动，同西北民主抗日力量实行合作，以促进南京的改革与抗战的发动。在南京政府中，推动左派，争取中派，反对右派，实行改组南京政府。

(五) 努力扩大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吸收广大的下层群众到运动中来，消灭严重存在着的缺乏组织性的弱点。

(六) 在原有基础上发展与巩固共产党的组织。

(七) 党应准备实现一切政治上与组织上的必要的改变，以适合于全国统一战线建立后的新环境。

给韩复榘的信^[1]

(1936年12月27日)

西安事变，西北抗日局面成立，先生主张和平解决，今已达到目的。惟蒋氏难免又受群小包围，延缓抗日发动亦意中事。今后如何改组国防政府，如何组织全国之抗日联军，如何确定救亡大计，均愿与先生及鲁军方面切实合作。

[1] 这是毛泽东致韩复榘信的主要内容。

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报告^[1]

(1936年12月27日)

现在蒋介石出于无奈，已经承认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但并没有签字。对于这个问题，蒋介石签字当然好，但签了字这个人也会赖着不执行啊，就是不签字，迫于形势，他也有可能执行。究竟执行不执行呢？这就要全国人民进一步努力，逼迫蒋介石执行。世界上很多事情不可能都是顺利的，都要有一定的压力才能成功。

[1] 这是毛泽东在红军大学所作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报告的一部分。

与教堂订立的协定^[1]

(1936年12月28日)

(甲) 教堂承认苏维埃红军之抗日救国及反军阀卖国贼之主张，苏维埃红军承认教堂之存在。(乙) 拒绝一切国民党军阀之军队、民团、侦探进入教堂区域，一切教民均为苏维埃公民，服从苏维埃法律，苏维埃红军承认宣教与信教的自由。(丙) 教堂之财产不没收，由教堂自动捐助抗日救国经费。(丁) 经济通商不加阻碍。(戊) 其他事项随时协商办理。

[1] 为争取教堂与苏维埃红军建立和平友好关系，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提出与各教堂订立协定。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的主要内容。

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

(1936年12月28日)

蒋介石氏在西安接受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和西北人民的抗日的要求^[1]，首先命令进行内战的军队撤离陕甘两省，这是蒋介石氏转变其十年错误政策的开始。这对于指挥内战、制造分裂、并欲在这次事变中置蒋氏于死地的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2]的阴谋，给了一个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的失望，已显而易见。蒋氏此种觉悟的表示，可以看作国民党愿意结束其十年错误政策的一种表示。

蒋介石氏十二月二十六日在洛阳发表了一个声明，即所谓《对张杨的训词》，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实为中国政治文献中一篇

[1] 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因受中国红军和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蒋加以拒绝，而且更加倒行逆施，积极布置“剿共”军事，下令镇压西安学生的抗日爱国运动。1936年12月12日，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坚决支持张、杨的爱国行动，同时主张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这次事变。12月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随后被释放回南京。

[2] 指西安事变时南京国民政府内部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的亲日派。这些人以汪精卫、何应钦为首，借西安事变准备发动大规模内战，以便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并乘机夺取蒋介石的统治地位。

有趣的文章。蒋氏果欲从这次事变获得深刻的教训，而为建立国民党的新生命有所努力，结束其传统的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错误政策，将国民党引导到和人民愿望不相违背的地位，那末，他就应该有一篇在政治上痛悔已往开辟将来的更好些的文章，以表现其诚意。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声明，是不能满足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的。

蒋氏声明中有一段是值得赞扬的，即他所说“言必信，行必果”的那一段。意思是说他在西安对于张杨所提出的条件没有签字，但是愿意采纳那些有利于国家民族的要求，不会因为未签字而不守信用。我们将在蒋氏撤兵后看他是否确守信义，是否实行他所允诺的条件。这些条件是：（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1]，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这些条件的实行，首先需要确守信义，并且需要一些勇气。我们将于蒋氏今后的行动表现中考察之。

然而蒋氏声明中又有西安事变系受“反动派”包围的话。可惜蒋氏没有说明他所谓“反动派”究系些什么人物，也不知道蒋氏字典中的“反动派”三字作何解释。但是西安事变的发动，确系受下列数种势力的影响：（一）张杨部队及西北革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二）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三）国民党左派势力的

[1] 上海爱国领袖，指当时在上海领导抗日爱国运动的全国救国会负责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他们在1936年11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到1937年7月才被释放。

发展；（四）各省实力派的抗日救国的要求；（五）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六）世界和平阵线的发展。这些都是无可讳言的事实。蒋氏所说的“反动派”，不是别的，就是这些势力，不过人们叫作革命派，蒋氏则叫作“反动派”罢了。蒋氏在西安曾说了将要认真抗日的话，当不至一出西安又肆力攻击革命势力，因为不但信义问题关系蒋氏及其一派的政治生命，而且在实际的政治道路上，在蒋氏及其一派面前横着一种已经膨胀起来而不利于他们的势力，这就是在西安事变中欲置蒋氏于死地的所谓讨伐派。因此，我们劝蒋氏将其政治字典修改一下，将“反动派”三字改为革命派三字，改得名副其实，较为妥当。

蒋氏应当记忆，他之所以能够安然离开西安，除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张杨二将军之外，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和平解决，并为此而作了种种努力，全系由民族生存的观点出发。设使内战扩大，张杨长期禁锢蒋氏，则事变的进展徒然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在这种情形下，共产党坚决揭破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汪精卫^[1]、何应钦^[2]等的阴谋，坚决主张

[1] 汪精卫是当时国民党中央亲日派的首领。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他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贯主张妥协。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国外通电主张对张学良、杨虎城“大张挞伐，迅予围剿”；同时立即从德国动身回国，企图夺取南京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他继续散布降日言论，反对国共合作抗日。

[2] 何应钦（1890—1987），贵州兴义人。当时是国民党中央亲日派的另一首领。西安事变发生后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推任为“讨逆总司令”。他积极筹谋掀起内战，部署国民党军队沿陇海路进逼陕西，调派空军轰炸渭南等地，并计划轰炸西安，炸死蒋介石，以便取蒋介石的地位而代之。

和平解决这次事变，这和张杨二将军及宋子文^[1]氏等国民党人的主张可谓不谋而合。这就是全国人民的主张，因为现在的内战是人民所痛恶的。

蒋氏已因接受西安条件而恢复自由了。今后的问题是蒋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实行他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将全部救亡条件切实兑现。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语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蒋氏及其一派必须深切注意。

蒋氏倘能一洗国民党十年反动政策的污垢，彻底地改变他的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基本错误，而立即走上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的战线，军事上政治上俱能实际采取救国步骤，则共产党自当给他以赞助。共产党早已于八月二十五日致国民党书中将此种赞助的诺言许给蒋氏和国民党了。共产党的“言必信，行必果”，十五年来全国人民早已承认。全国人民信任共产党的言行，实高出信任何国内任何党派的言行。

[1] 宋子文为亲美派。由于当时美日两帝国主义在远东争霸的矛盾，他根据美国的利益，对于西安事变，也主张和平解决。

致周恩来、博古电^[1]

(1936年12月31日)

中央十日内迁移延安，南面甘泉、北面瓦窑堡两城不能不交给
我们，否则殊为不便。请与杨商交出甘泉，并请杨电高桂滋交出瓦
窑堡，陕西红军可不进攻清、绥^[2]，野战军可不进占旬邑、淳化、
耀州为交换条件。^[3]

[1] 这是毛泽东关于要求周恩来等和杨虎城商谈中共中央迁移延安后红
军驻地问题，致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电的主要内容。

[2] 清、绥，指清涧、绥德。

[3] 12月30日，周恩来与杨虎城商谈红军驻地问题，杨提出红军不要
进入太逼迫西兰公路的旬邑、淳化、耀州（耀县）。

致周恩来、博古电^[1]

(1936年12月31日)

西路军已放弃永昌、山丹，向甘、肃两州进，但二马^[2]追击甚紧。请商杨虎城电马步芳，停止向西攻击，红军亦不向凉州。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电的主要内容。

[2] 二马，指马步芳、马步青。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9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 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 7 号兴力工业中心 5 楼 09 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 16 开

页 面：532 面

版 次：2013 年 10 月 1 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 年 10 月 1 日 第一次印刷

2013 年 11 月 1 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 套

全集字数：2015 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 卷 港币 \$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

